

YANAN ZHENGFEENG SHILU

延安整风实录

高新民 张树军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整风实录/高新民,张树军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7(2000.8重印)(2000.8重印)

ISBN 7-213-01943-0

I.延… II.①高… ②张… III.延安整风运动-史料 IV.D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3055号

延安整风实录

高新民 张树军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 责任编辑 杨淑英
- 封面设计 顾 页
- 责任校对 李育智 朱晓阳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 激光照排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 开 本 850×1168 1/32
- 印 张 14.375
- 字 数 32万
- 插 页 6
- 印 数 9001-15000
- 版 次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3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1943-0/D·276
- 定 价 27.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毛泽东在1943年说过：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图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陕北。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举行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由苏联回到延安。图为毛泽东等到机场欢迎王明等时的合影。前排右1为王明，右3为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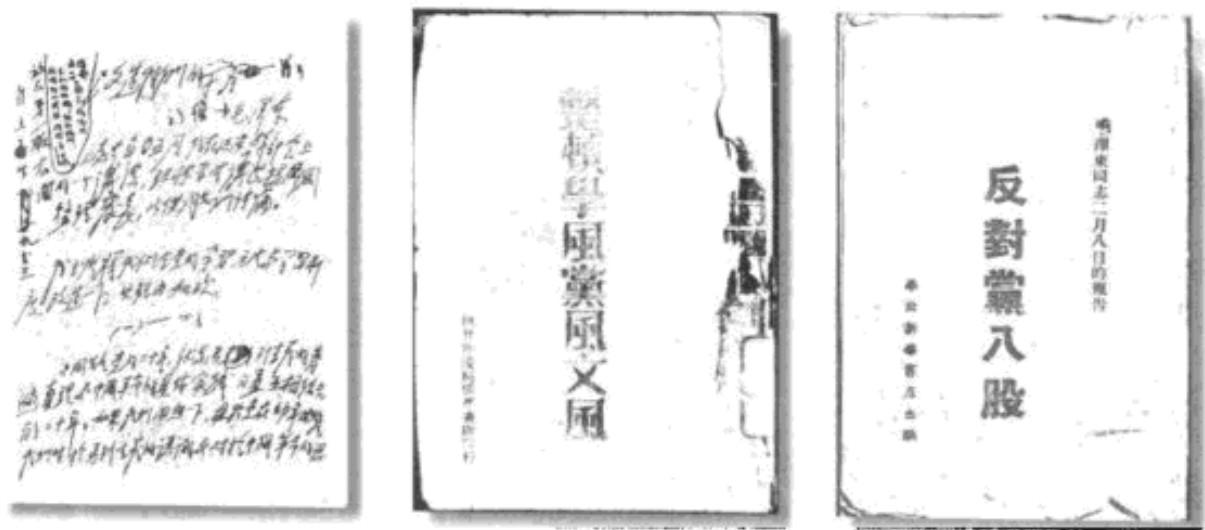
向来以“左”著称的王明回国后，却以另一番形象出现在全党面前，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右的主张。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图为与会者的合影。前排右3为王明，后排右1为毛泽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图为与会者的合影。第三排左7为王明，第四排右1为毛泽东。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错误，确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图为全会主席团的合影。前排右1为王明，右5为毛泽东。



毛泽东号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图为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当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手稿和文本。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战斗间隙，陆续开展了整风。图为八路军某部战士在学习整风文件。



延安各机关、学校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学习整风文件的热潮。图为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在讨论整风文件。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各系统的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整风运动。图为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整风学习。

康生同志：七月一日
 在延安整风运动上，请登载下列路线
 为盼！ 七月一日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群众
 广泛相结合，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
 研究，分清是非轻重，首长负责，提高群众
 觉悟。
 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我们应当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
 路线。

1942年底，延安一些机关、学校先后开始审查干部工作。1943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出现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同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指出在审干工作中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路线。图为毛泽东致康生信的手稿。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春风也吹到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图为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工作者座谈会的场景，中间站立作报告者为邓小平。



在整风运动中，调查研究蔚然成风。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调查团深入陕甘宁边区和山西兴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图为1942年9月16日张闻天同“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成员在神府彩林村的合影。右4为张闻天，右6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



延安文艺界整风众说纷纭 1942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和工农兵相结合。图为毛泽东等同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合影。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在整风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全会最后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和策略，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图为七大会场。



知 PDG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图为“五大书记”分别在七大上。



目 录

- 1 第一章 前 缘
- 1 一、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
- 27 二、毛泽东初理“左”倾错误，但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是“孤立”的
- 45 第二章 切入主题
- 45 一、六中全会号召学习理论，毛泽东告诫：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 60 二、毛泽东揭示整风主题，但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
- 68 第三章 史无前例的政治局整风
- 68 一、毛泽东编辑党史文献，“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
- 74 二、中央政治局初理两条路线，党史争议未作结论
- 88 三、毛泽东毕生珍爱的没有完全公开的手稿
- 111 四、毛泽东说：“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125 第四章 启 蒙

- 125 一、毛泽东号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
- 136 二、毛泽东呼吁：“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
- 144 三、整风动员造成“一河大水”，冲向各个部门

156 第五章 整顿学风高潮迭起

- 156 一、毛泽东说：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 169 二、从延安到各根据地，学风学习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217 第六章 文艺界整风独辟蹊径

- 217 一、毛泽东分管文艺界整风，密切关注着这支“鲁总司令”的队伍
- 232 二、文艺座谈会上众说纷纭，毛泽东要求必须实现两个“结合”
- 252 三、毛泽东满意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263 第七章 整顿党风文风紧锣密鼓

- 263 一、毛泽东号召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一元化领导体制随之建立
- 302 二、西北局高干会旨在“七整”，毛泽东说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是圣经而不是教条
- 329 三、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倡导“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344 第八章 整风运动一波三折

- 344 一、王实味事件影响甚大，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

- 了目标了”
- 365 二、“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毛泽东说：我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 389 第九章 历史的结论
- 389 一、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再议两条路线，毛泽东说王明是错误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
- 428 二、毛泽东七次修改“历史决议”，七中全会作出最终的结论
- 436 三、中共七大——整风运动逻辑发展的结果
- 448 最后的话
- 449 主要参考书目
- 453 后 记



第一章

前 缘

一、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

山，重峦叠嶂，林木莽莽。

山，险峰傲立，刺破青天。

云贵川交界地区，到处可见这样的山。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坐落着著名的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一群几经浴血奋战、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汇集到了这里。红军入城时，群众的欢呼声、锣鼓声，还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震撼着红军战士的心，震撼着红军将领和随军行动的中央领导人的心。这声音，这场景曾是那么熟悉！仅在数月前，在中央苏区，这标语，这口号几乎可以天天见到天天听到！

然而，曾几何时，有过的一切几乎都丧失了。

自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红军所到之处，都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都经历着硝烟战火。红军苦战数月，损失惨重。特别是在湘江岸畔，那是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天上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炮声轰鸣，炸弹落入江中，掀起巨大的水柱。数万红军拥挤在湘江渡口，掩护着中央纵

队和军委纵队在狭长的通道上缓慢前进。笨重的机器、行李、辎重随处可见。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之久，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仅此一战，红军损失减员即达 3.05 万余人。载渡红军过湘江的舟桥，是用生命之躯铸成的。

此时，红军已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剩下 3 万多人了。

据说，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在湘江渡口拿着手枪对着自己痛苦地比划着。聂荣臻劝他冷静点，防止手枪走火。

红军何去何从？中国革命前途如何？革命的危机如何扭转？

遵义城是那些数月来风餐露宿、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的喘息之地。

遵义城是那些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创造历史之地。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杨柳街子尹路 80 号召开。那地方有一座精致的小洋楼，是国民党军队一个师长的公馆。二楼的东厢房里，正中的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屋内燃着一个火盆，在寒冷的天气中带来些许温暖。20 位在中国革命的漩涡中叱咤风云、影响中国命运的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围坐在一张板栗色的香木方桌四周。他们是：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作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首先提出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是有责任的。然后他分析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国民党布置了 100 万大军，其中 50 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了外国军事顾问，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突出地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原因，而对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则讲得很少。他还反复说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政治上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

博古讲了一个多钟头。他讲话条理分明，文字清晰。

接着是周恩来的副报告。他侧重于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上的主观原因。他认为这次战争我们没有取胜，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两个报告过后，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默。与会者大多对博古的报告深感不满。

是的，第五次反“围剿”的确是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失利的。但是，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敌强我弱是一种长期的态势。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是 30 万，我军是 3 万，双方比例是 10：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是 50 万，我军是 4 万多（未计地方武装），双方比例也是 10：1。但两次反“围剿”的结果却迥然不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红军取得了胜利，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范围扩展到

28个县境，拥有21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而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却是中央苏区的丧失和红军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有着这样的现实对比，绝大多数人对过分强调客观因素的报告是无法接受的。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人的创造必须尊重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不尊重实际、违背客观规律必然会受到惩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便是这样一种惩罚。

这段历史的源头，似乎得从同样影响革命历史命运的一次会议说起。只是那一次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

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房6号（现武定路930弄4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总党团、共青团中央、江苏省委、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共37人。其中王明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到会人数的45%。

此次会议之前，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已经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王明宗派集团却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帜，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违反党的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和他观点相同的人，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后，明确支持王明。

六届四中全会是由米夫一手操纵的。会前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人员名单。他采取组织手段来控制会议，甚至违反组织原则，让15位列席代表享有与中央委员

同等的权利，不但有发言权，而且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对于不同意他们观点的某些候补中央委员，则设法阻挠他们参加会议。

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根据米夫的提议，王明等9人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年仅26岁的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虽仍由向忠发担任，但实际上中央的领导大权却由王明为代表的少数“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操纵。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王明能够上台，原因是复杂的。自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的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都不足。当王明等人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而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上台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来，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早已宣布不再派全权代表驻中国，但为支持王明上台，却又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种由一个国际中心直接控制别国党和直接指挥各国革命运动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严重后果。

王明等人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而是“右倾”。王明在代表了他的观点的纲领性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写到：“目前我们还没

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分”，因而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①他们要求继续打击中间营垒，强调“进攻路线”。这些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理论装饰更多，危害更大。

任何一种政治主张的推行，都离不开组织手段的保障，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党内缺少威信、缺少实际经验的王明等人，为着将自己的政治路线推行下去，也走了一条排斥异己的组织路线。

四中全会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召集四中全会上曾不同意王明等人当选的一些人开会。会上，米夫说王明是中国党内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就是体现国际路线的。米夫宣布，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你们都应该受处分。

米夫曾是王明的老师。在老师的教诲下，在排斥异己、培植亲信方面，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明利用他兼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职权，首先对上海开刀（当时江苏省委机关设在上海）。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说：

王明直接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由省委使用。事先，陈昌浩、李竹声在王明家里和王明密商人选，后来向中央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616页。

点名要这些干部。这些人到省委后，王明就将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作了一番调整，不听话的撤职、调动，由这些人接任，如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采曦到法南区委。原来的区委书记或调动或担任区委委员。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去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生活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①

对于像瞿秋白、何孟雄、邓中夏等党的重要干部，王明同样使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甚至在何孟雄牺牲后，还要进行彻底清算，打击与分化支持何孟雄的人。对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不仅进行政治打击和组织处理，还在经济上减发生活费，每月象征性地发给 16 或 17 元钱（当时上海工人的最高工资是每月 50 到 90 元，中等工资是 20 到 30 元，最低工资是 8 到 15 元）。这对当时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来说，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生活需要。

排斥异己仅仅是有系统地改造党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钦差大臣满天飞”。

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央就通过了《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指出要最高限度地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为此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的中央成分，必须即刻改正在经济的、土地的、组织的政策上所犯的错误。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 14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2 页。

不久便派出中央代表前往各地，如夏曦被派往湘鄂西，任中央分局书记；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被派往中央苏区；张国焘、陈昌浩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中央授予被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以极大的权力，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还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的代表大会产生的”。这种权力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与此同时，中央还专门设立了巡视员制度。1931年5月1日，中央颁布了《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的身份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对中央负绝对的责任。巡视员具有很大的权力：遇到新的事变时，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解决之后再报告中央处理变动的详情；可以检查、教育和提拔干部，改造地方党部；其行使权力的范围并不只限于党组织，而是包括党领导的一切群众组织。

建立这种领导体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保证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

中央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巡视员，并非全部都是宗派主义者，但在这种体制之下，必然要为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服务。有相当一部分人给所在地区的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于1931年4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5月正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他一到鄂豫皖，就大力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对党组织、苏维埃以及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改造”。他全面否定了鄂豫皖苏区在以曾中生为书记的鄂豫皖特委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指责过去的领导“执行富农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不同意张国焘意见的曾中生等人都被扣上了“右派小组织分子”、“反对工人斗争”等帽子,受到严厉批评,有的甚至被开除党籍。后来,张国焘借故撤销了曾中生担任的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担任。张国焘还下令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严刑逼供,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制定“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反革命中心组织”。红四军中有不少师级、旅级、团级干部和党的骨干分子,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分子而惨遭杀害。仅到1931年11月,被杀害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即达2600多人。在地方各县也有大批干部被杀。

同样作为中央代表的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也大力推行“左”的错误政策。他对党组织的“改造”是极为“彻底”的。红三军过去每个连队都有党支部,但由于大批党员被无辜打成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最后,部队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都被取消了,全军只剩下四名党员,即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本人。在极左路线下强行发动的“肃反”,更是伤害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和骨干分子。就连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也遭杀害。贺龙曾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说:洪湖的县区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1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来不及杀才活下来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围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是他们曾在段德昌领导的机关里刻过油印。^①

^① 参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如此行为,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1931年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4月17日即召开了会议,作出《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其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断言“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会议还决定对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配土地,只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耕种。“左”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

这种领导体制、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作风,是和当时党中央各类决议中普遍存在的夸夸其谈的作风相匹配的。

1931年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被国民党处死。王明成为党的负责人。9月,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行前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组成常委会,由博古负总责。在王明的精心安排下,除卢福坦和陈云外,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竟有四位不是中央委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如此动作,只是为了能够保证对“进攻路线”的贯彻无误,保证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忠心耿耿。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深刻的民族危机导致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党的策略本应随之有所变化,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进了一步”。临时中央不以中国的现实变化为分析事物的依据,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与其说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倒不如说

是伤害群众的感情。对于国内阶级的变动，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看不到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①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被临时中央视为两个阶级之间决死斗争的到来。他们在那个后来被当作“左”倾错误路线经典之作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形势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②

伴随着这样的形势判断，必然是冒险的行动策略。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提出“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的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组织工人斗争。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

在作出这样武断的规定之后，临时中央又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地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豪迈的语言与夸夸其谈的分界只在于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当这种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指示违背了实际情况而变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06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15页。

为夸夸其谈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重要干部，如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和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等的抵制。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在群众工作中长期地积聚和发展力量。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刘少奇等人的意见被视为“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他们的职务也被撤销。

在中央苏区，“左”的错误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毛泽东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本本主义倾向而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在这个会议上被中央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不重视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被称之为“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当时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中回忆说：

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的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的指示和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①

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都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很多教条。^②

①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

② 任弼时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毛泽东根据在长期的农村革命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土地分配中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却被指责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错误”。^①会议把红军迫于敌强我弱的局面而无固定作战线的情况称之为“游击主义”，毛泽东在长期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一系列作战原则，被说成是农民落后思想的产物。那些在过去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主张成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总之，“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②尽管这些指责并未点名，但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同他意见一致的中央根据地领导人的。

即使如此，临时中央政治局仍不满意，认为派去的中央代表没有完全彻底地贯彻中央的路线。临时中央的机关报《斗争》曾发表洛甫（即张闻天）执笔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该文洋洋洒洒两万余字，对苏区中央局的指责即达七八处之多。文章给苏区的工作扣上了一系列大帽子，如指责把巩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有“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指责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只有最坚决、无情地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相隔十几

^③ 《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48页。

^④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70、483页。

天之后，临时中央又给中央局发出指示电，再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苏区中央局在压力之下，于1932年五六月间连续作出两个决议，一方面对“左”得还不够彻底作出自我批评，如对“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的倾向”上纲上线不够，应指出这种倾向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并且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掩盖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等；一方面继续批评毛泽东，并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

这两个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并未闻其事。他后来说：6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开。知道采取的是缺席审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于这些“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立场上”的决议，毛泽东虽对此不满，但心领神会地说：这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①

其时，恰是蒋介石开始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对于如何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与前方的成员发生了分歧。为着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10月上旬，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赶到宁都前线，与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会议接受了临时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和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在会议过程中“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后方的同志批评前方的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

^①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

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火力,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指责,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后方成员还提出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的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他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①加之1932年9月24日周恩来曾给中央局写信,说过去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前方组织既不是集中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短”,“因有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种情况“令人无所适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汇集在一起,大多数人同意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390页。

方案。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的全权信任，也坚决不同意第二种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此后，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由周恩来兼任。

事后，周恩来在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里说：会议集中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全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②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则于1932年11月12日联名向临时中央报告说：周恩来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的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至此，毛泽东的党权军权都失去和被剥夺了。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

1933年初，由于“左”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不得已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

由于临时中央所推行的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符，遭到了一部分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抵制。为了排除障碍，“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以宗派主义手段打击、排斥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对他们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罗明路线”是当时

^② 《周恩来向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之简情》，1932年11月12日。

这一斗争的“代表作”之一。

罗明曾在 1933 年间任闽粤赣代理省委书记，他对当时中央不顾苏区的具体情况，限期要江西、福建完成扩军任务提了一些意见，并给省委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的精神实质是说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和边缘地区情况不同，党的政策也应当有所不同。在一封给省委的信中，罗明说：“要在岩、永、杭敌占区或接近敌区扩大主力红军，莫说我们无办法，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来此也是无办法的，甚至请斯大林同志来此也同样无办法。”^①

省委将罗明的意见转给临时中央，以博古为首的中央认定罗明出言不逊，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的、消极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1933 年 2 月 15 日，临时中央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出“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省委大多数同志对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性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坚决地站在党中央和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斗争到底，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与不坚定。《决定》号召“在党内立刻开展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随后，博古、张闻天等或作报告，或写文章，批判“罗明路线”。张闻天同罗明谈话，进行批评。罗明不服，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自己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游击战争的。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在边缘区县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才能打破敌人的“围

^①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5 页。

剿”；而扩军的问题更不能硬性统一要求，应区分具体情况，在边缘区县只有分批扩大红军才对。他认为这些都是在实际斗争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引用了列宁的话：“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本来，动不动就引用马列的词句来给人戴大帽子，是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专利”，此时罗明用列宁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免引起了对方的强烈不满。博古得知张闻天与罗明谈话的内容后十分恼怒。他当面批评罗明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如果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要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博古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要罗明回到福建在省代会上作检查。^①

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相当一批干部受到打击。张鼎丞回忆说：

总之，当时“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凡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王明的“进攻路线”的，就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凡由后方调到前方，不能完成扩军任务的，也称之为“罗明路线”。斗来斗去，一直斗到红军长征了，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由于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遭到严重摧残，被斗得一塌糊涂，在“肃反”之后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

^① 罗明：《关于罗明路线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

的一些老干部，都被打击或排挤。因此造成了党内的恐惧心理和社会的不安现象，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之间严重脱节的现象。由此可见，反“罗明路线”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带给党和人民的损失是重大的。^①

在江西，则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邓、毛、谢、古四人是江西苏区党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代表人物，因而被说成是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退却逃跑，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将他们调往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并将这一斗争扩展到全省。

后来，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说：这个斗争“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干部”。^②张闻天也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因此时任弼时对单纯军事进攻和命令主义提出了批评）。^③

事实上，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主观片面地对待干部问题，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随着主观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又反过来维护主观主义领导的统治，助长主观主义的发展。二者是互为条件、同时并存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他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

①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68页。

②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③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1943年11月21日。

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

此时,对红军反“围剿”负有实际上的最高指挥权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由于不懂军事问题,便求助于共产国际,于是李德就来帮助博古主持军事工作。顾问本应只有建议权,无决定权和指挥权。但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而对共产国际是应当绝对服从的,因而博古放手让李德充分行使军事指挥权。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的住处,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过李德批阅提出相应的意见后,再由翻译将李德的批语译成中文连同电报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再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作相应的处理。后来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这一问题作过这样的评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①

^①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李德权力甚大，但他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这使他在行使权力时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加上中国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也就更大。他和博古等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之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战争进行中，曾出现过对红军粉碎“围剿”有利的机会。当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于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红军本可利用这个时机打开一个突破口，但博古等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的建议，认为第十九路军的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致使坐失良机。蒋介石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了顶点的会议。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结果是扩大了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如此发

展的恶果,只能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死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18天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广昌失守。

此战之前,彭德怀曾当面指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从一开始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就是错误的。广昌一役失利,更多的人对军事路线表示怀疑,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领导人也开始不满。张闻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说,广昌之战同敌人死打硬拼,只能使红军白白遭受损失,这种蛮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博古立即回答说:洛甫同志的意见,重演了一起历史往事,一段国际共运中的内部斗争。那就是1905年俄国工人起义失败后,机会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指导方针横加指责,说什么起义是“不合时宜的”,“失败是不难预料的”,是“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等等。……我相信,历史也会证明,在当前的斗争中,正确的将是李德同志和我们坚决贯彻的共产国际路线,而不是你洛甫同志。

战争的失利,使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当然,博古同样希望战争胜利。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他更清楚如果失败自己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他在如此紧要关头仍忘不了引经据典,仍抱着对共产国际甚至对李德的迷信,其教条主义态度可见一斑。这正像毛泽东数年后所评论的那样,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长征。

这一段前缘往事，是参加遵义会议的每一个人所亲历过的。第五次反“围剿”何以会失败？长征以来何以会损失那么惨重？大家心里都明白。博古的报告理所当然地引起大家的不满。

短暂的沉默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并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提纲的内容是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谈过多次的，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他批评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主力进行抗击，而且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第十九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皇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等等。张闻天的发言后来被称之为“反报告”。

张闻天与博古共事多年，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推行“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张闻天可以说为临时中央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残酷无情的事实面前，他终于摈弃了过去一贯的主张，改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的发言是出乎博古意料之外的。博古宣布上午休会，下午继续进行。

下午开会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指出，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辩护。他认为，“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

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时间很长，大约用了一个小时，但并未留下记录。后来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反映了当时发言的基本观点。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与博古是莫斯科时期的同学，他们曾观点一致地反对李立三，并为此受过处分。但当他被派到苏区之后，与毛泽东的接触逐渐增多，深感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在宁都会议上他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撤销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这一关键时刻，他再次投了支持毛泽东的一票。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此事。

朱德一向谦逊稳重，现在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批评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领导人都作了发言。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都作了严厉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批评。

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当时他是指挥红军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因而他的发言举足轻重。他赞同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会后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

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又称华夫)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①

凯丰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在会前他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其在会上支持博古。当他听到毛泽东提出要检讨军事路线时,说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此事。1962年,他对日本朋友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②

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最后作出决议,认为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负责,其中李德和博古应当负主要责任。

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当选为常委。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②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2月。

(二)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博古虽然在会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他没有压制不同意见，而是让大家把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他虽然在思想上没有完全彻底地想通，但服从了会议的决议。

会后不久，中央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象征着中央最高负责人权力的两只铁皮公文箱，从博古那里移到了张闻天处。

毛泽东在 1943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是希望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人们用血的代价塑成的。

1945 年 4 月 20 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

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①

历史将记住这个会议。

二、毛泽东初理“左”倾错误，但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是“孤立”的

陕北的山，与峻峭挺拔、林木葱葱的南方的山迥然不同。

这里的山，山顶是平的，不像是平地上挺起的山脉，倒像原本是平地，只是历经沧桑，风风雨雨把它冲刷出千沟万壑，平地反倒成了山脉。当地人把这些山叫做“峁”。

在这些峁之间，有一座历史名城——延安。

1937年11月29日，一架飞机在延安的简易机场降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偕同康生等人缓步走下飞机。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人在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据张国焘回忆说，当时彼此握手拥抱，一堂所叙，都是高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970页。

兴的事。

毛泽东对王明的归来,并不持有排斥的心理。他相信,对于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即使是共产国际,也应当予以肯定。

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两年多来对“左”的错误的清理批判,以及中央的新策略在实践中有了重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遵义会议时,由于军情紧迫,只是纠正了当时对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在陕北落脚之后,毛泽东开始逐一清理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左”的错误。毛泽东后来说,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

这个准备,是先从政治路线开始的。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讨论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他概括了总的阶级关系特征,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

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指出其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问题。

对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等等这些“左”的政治路线的主要错误观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批驳。他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

“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①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用大约 4500 多字阐述了中国各阶级关系的变动状况，又用了将近 3000 字概述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批驳了关门主义策略。这是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左”的错误政治路线所作的最全面的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情绪激动地提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的问题，不是路线的问题。相反，过去中央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博古同志来到苏区后，对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统统加以拒绝，被排斥在外的竟有 24 人之多，这完全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错误，这是不够的。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以讨论当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为主题的，因此，当博古部分地承认了错误，张闻天又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后，毛泽东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何时再谈，只待合适的时机。

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再次对政治策略问题作了阐述。他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5 页。

权问题,并就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党的政治纲领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异同,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党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等问题作了说明。而要执行党的这一切策略,必须一方面同“左”的关门主义作斗争,一方面同尾巴主义作斗争。他说:

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①

应该说,毛泽东这个报告不仅深化了对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批判,而且提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用以克服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左”和右两种倾向的要求。这是要求全党学习理论的先声。

对于军事路线上的争论,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孰是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非，遵义会议也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对于这场争论还需要有一个理论总结，以便真正统一全党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探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高度出发，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原则，批驳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做法。在列举了一系列正确的作战原则后，毛泽东说，从1932年1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销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

毛泽东以辛辣嘲讽的语气说：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

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 and 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①

毛泽东把两种不同的军事路线的基本点全部列了出来，加以对比，如同对政治路线问题的分析一样，最后也归结为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归结为主观主义。

既然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都与主观主义有关，那么，清理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为达此目的，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演，其矛头所向，主要指向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针对党内曾长期存在的只知道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用来吓唬人们的现象，突出地强调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性。他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206页。

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①他又强调真理是发展的，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和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他认为，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他把人的认识对于实践的关系概述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

据此，毛泽东提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是思想落后于实际，而“左”翼空谈主义的实质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这是对党内出现“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认识根源的深刻分析。

为了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强调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他说有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相互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他还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①

这是对教条主义一针见血的批评，其锋芒所向，切中要害。其论述的影响，已经超越单纯地清算王明“左”倾错误本身，具有深远的意义。

应当承认，这些对“左”的错误的批判，有些如军事上的错误和某些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由于其效果是直观的表象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因此易于为大家所认同,也易于纠正。而思想上的根源,由于属表象之后的深层次的问题,而全党的理论水平又不平衡,因而不易为大家所察觉,所认同,纠正这种问题所需时日也是长期的。在数年之后进行的延安整风,乃是对这种“左”的错误清理的延续。

这种思想上的清理,奠定了在抗日战争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的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抗日高潮。

但是,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国民党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继续他们的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须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共产党则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之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这两条路线表明,国共合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国共之间的合作必将是有斗争的和曲折的。共产党以其弱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恰在这时,在与国民党联合问题上,出

现了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相反的右的倾向。

1937年8月下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党的集体领导削弱了，出现了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有的共产党员主张参加国民政府，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在救亡工作中，有些人同意章乃器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意见。9月，湘赣边区有的负责人在谈判游击队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遣副司令、军需主任等条件（中央发现后制止）。10月，西安地方党组织受国民党市党部欺骗，将西北救国会组织无原则解散。同月，华北军分会发出了一个指示，过低地估计了日军的进攻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否认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主张运动游击战，放松了以共产党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进行长期艰苦战争的精神准备。

为了教育全党同志克服右倾情绪的滋长，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党要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实现共产党领导抗战，当前的具体任务就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路线上来，决不能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的路线上去。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保持党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①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出现的这种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倾向。他措辞严厉地说：“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①

从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起，党内有右倾倾向的人一直反对这个报告。

王明回国，正处于这个关键的时刻。

向来以“左”著称的王明，却以另一番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

1937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写的题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提出红军改编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要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9月1日，他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中又说，必须要建立包括有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和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很明显，王明已经一反常态，从“左”的一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姿态，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

王明回国不久，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陈云、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康生、张国焘等政治局委员和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共13人参加会议。

作为刚从共产国际回来、掌握了共产国际新精神的代表，颇有钦差大臣风格的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无疑，王明对于应当坚持抗战、坚持国共合作这个大前提与党中央并无二致。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的争论恰如他的报告题目所说：如何进行抗战，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明在会上所讲的主要不同意见是：第一，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阶级集团，极力夸大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进步性。他说，国民党在抗战中是有进步的，南京政府开始走向统一的政府，开始实行国防的任务，中国政治制度已经走上了民主自由，救国运动已在各地发展。对于CC系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现在应当公开纠正过来，法西斯是侵略殖民地的，复兴社是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化的。第二，否认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抬高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我们不能够提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第三，提出与中央精神相背的方针政策。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今天不是组织群众狭小的团体，而是利用现在合法的团体，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现在我们不是反对党，而是政府党。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使他们害怕，现在要提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武装广大人民来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在抗战的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我们一定要取得合法，到国民党中去立案。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旧政权，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加入国民政府。我们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军队。目前中国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

争不能战胜日本。第四，说中央在洛川会议到十二月会议期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并把这个错误归结为七条：对抗战后的国民党基本估计不足；把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没有抓住国共合作为重心；没有强调发动群众也须经过统一战线这个主要环节；没有提出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

王明的这些主张，是比较系统的右倾观点，他所极力反对的，是洛川会议以来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基本观点。

同王明一起回国的康生，在会议上极力支持王明的主张，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提法，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提法，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提法。

王明的右倾主张固然是错误的，但更使人奇怪的是，王明这样一个以“左”著称的人怎么会从“左”一下子转变到右倾的呢？这与共产国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共产国际对当时的形势却估计为日军向中国进攻是为了进行反苏战争，故尔要求各国党服从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作为反侵略斗争中的领导者还是弱的，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还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还很难说。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抗战寄托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要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蒋介石的军队,去打阵地战,以便牢牢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

王明回国前夕,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的队伍中工人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亦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难于做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还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战线”、“一切经过人民战线”的经验,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做到共同领导,进行阵地战。

王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无切身体会,但他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使他毫不犹豫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而当时党内尚未克服的右的倾向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基础。

毛泽东对王明的意见是无法赞同的。他于12月11日、12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使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走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

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分。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毛泽东的意见与王明的意见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但是,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出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支持王明的主张,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写进了会议传达大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并向下面传达。这样,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不可避免地成了少数派。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①

这样一个结局,毛泽东在欢迎王明回国时是难以预料的。

十二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不久,王明去武汉。12月23日,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便利起见,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七人组成。周恩来将书记一职让给了王明。王明成为长江局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后来周恩来曾说:长江局书记,本来是我,我错误地推给你。

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继续推行自己的主张。1937年12月25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7日,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公开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了他自己拟订的关于抗战的六条纲领。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这个会议上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右倾投降主张。由于王明的干扰,致使某些地方党组织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乡村工作也很薄弱。在城市工作中,王明也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王明的错误,在于从根本上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企图通过单纯的让步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认持久战,把抗日战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不重视中共领导的人民敌后武装斗争。归根结底,是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毛泽东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建议: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是,到会过半数的同志仍然同意让他去。

毛泽东的提议没有获得通过,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问题

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王明提出了右倾投降的方针政策，而且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的意见。“左”的错误被批判了，如果再提出如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那种“左”的政策，无疑会遭到大家的反对，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右的主张面前又何以使人看不清事情的本质呢？回溯党的历史，大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过陈独秀的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问题上又出现了否认联合只要斗争的错误；而抗战初期又出现了如同大革命时期类似的错误。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左”与右的错误？说到底，“左”与右两个看似极端的東西，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的，这个条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況缺乏统一的理解，就是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未能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是遵义会议前的党了，党的领导集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了。

但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同于解决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它需要一种新的形式。由此，一个伟大的创举开始酝酿了。



第二章

切入主题

一、六中全会号召学习理论，毛泽东告诫：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9月的延安，绿色尚未褪去，凉爽的秋风已然拂面而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凉爽宜人的季节召开了。

与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1938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迥然不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充满了自信。这与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不无关系。他后来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说：六中全会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鉴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意见的分歧，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向王稼祥介绍了国内的情况以及王明提出的一

些主张。

1938年4月1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等五个问题。5月17日,任弼时又对上述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待持久战的方针是动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具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陈旧而不整齐,但是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讨论这个报告时,王稼祥作了发言。他着重补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并指出它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特点,即是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充分的讨论后,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充分肯定、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如果说,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中共

能否正确实行统一战线有所怀疑，对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认识的话，那么，任弼时的报告对于扭转共产国际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中共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只是为了取得相互之间的沟通的话，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这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王稼祥回忆说：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这结果的确是事先没有想到的。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共产国际多年，而共产国际却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这在王明自己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这一切又在情理之中。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以来的全部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毛泽东说的带回了很好的条件，当是指中共在政治上、路线上、组织上都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王稼祥回国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央于9月14日至27日先期举行了政治局会议。

9月14日，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的讲话共分五个部分：（一）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二）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问题；（三）关于国际援华运动；（四）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五）关于党内团结问题。

王稼祥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

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给予的崇高评价。

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的肯定及援华、七大等问题的指示后,王稼祥又说明:

在季米特洛夫与我的谈话中有下列各点:

(1) 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党在公开活动中是可能影响国民党的。

(2) 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的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如制造什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冲突等。

(3) 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①

王稼祥的传达,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必须

^①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重视的。因此，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开好这次政治局会议以及六届六中全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9月24日的会上作了发言，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9月26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我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朱德在发言中说，党内团结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持对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刘少奇在发言中批评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国际批准党的政治路线，更能增进我们的自信心。

9月27日，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

这次会议确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是：（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后正式召开。

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正式人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12人；中央委员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罗迈（即李维汉）等5人；各方面负责人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潘汉年、徐特立等36人，共计53人。

张闻天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他说：五中全会至现在，是

中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五年。这次全会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此，要讨论：（一）一年三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二）目前抗战的形势；（三）如何使共产党成为抗战的核心与领导者；（四）七大的准备。接着，王稼祥在会上作《国际指示报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在随后的几天里，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贺龙、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彭真分别作了有关地方的工作报告。康生作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充满喜悦和信心地宣布说：“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决议，9月8日《新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1月5日至6日，毛泽东作全会的总结，就会议的成功，

武汉、广州失陷后的形势，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战争与战略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讲话。毛泽东在讲到干部问题时还特地强调：“过去干部政策上所作的错误，我同意予以平反。”

毛泽东的报告和总结，系统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局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阐述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基本政策，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

尤需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大敌当前，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刻，以很大的篇幅大谈学习的重要性。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

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①

毛泽东再三地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毛泽东的讲话，既是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根本性的总结，又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既是对遵义会议以来清理“左”的错误的总结，又是准备在全党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教育运动的起点，其意义是深远的。

清算“左”的错误的历史的发展，到此转入整风的准备阶段。

在全会上，张闻天在作讨论抗日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工作问题的结论时，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十七年，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从抽象的教条的了解，到更具体更深刻更生动的了解马列主义，这是十七年革命实践所得的结果。在哪些地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呢？他指出：（1）懂得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分析当时当地的情况，对马列主义边学边用。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并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2）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把握阶级斗争规律，依靠这些来规定我们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针。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生命。现在我们不要怕抛弃马列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原则。（3）我们党今天更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战略、策略口号。（4）客观情况，一次是认识不清的，不能一次就完全认识，我们必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补充我们的认识。因此，在决定了方针策略后，应在实践中考验与审查其是否正确，在实践中补充与发展，错的改正，蛮干不能建立党的威信。马列主义指导实践，而实践又会发展马列主义。

徐特立在发言中 also 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我

们的理论要从具体实际情形得来,我们的决策,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人们终于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必须抛弃教条主义的态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支持在全会上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张闻天在会上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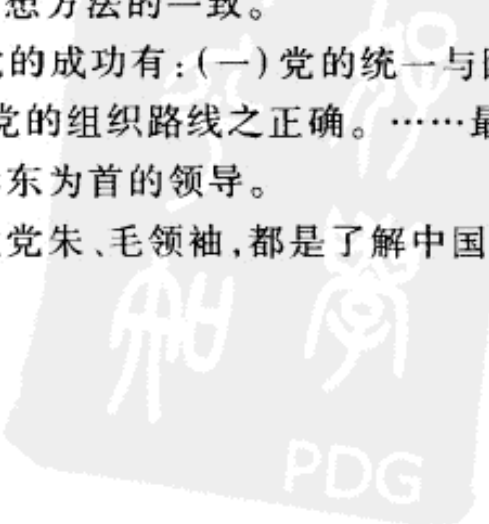
彭德怀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

刘少奇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而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

陈云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党的团结,首先应要思想上的一致,要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看问题方法差不多,研究思想方法的一致。

李富春说:党的成功有:(一)党的统一与团结;(二)保存广泛干部;(三)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

谢觉哉说:我党朱、毛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



毛泽东的事实上的领袖地位的确立，对于在全党进一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有整风形式的运动。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肯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新阶段的方针政策，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认识，已经出现了一个飞跃，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开始向自由王国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一个标志。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时隔七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说：中国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

这也许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往往出现在党的会议上。

远离中国政治生活的人们也许不会理解，在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环境中，在战争是决定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主要因素的情况下，何以还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运动。

但是，深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明白，六届六中全会后掀起的学习运动，是直接为整风运动做准备的，是直接关系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系到能否在政治上、军事上实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

毛泽东以他惯有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开始发动普遍的学习运动。

但是，毛泽东所说的学习，绝非指单纯的学习书本，他要求的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发展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

1938年8月5日，他在对抗大第四期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时就说：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是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空前而不绝后”几个字，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那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来说，不啻于一声惊雷。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学习理论的基本态度。

六中全会号召的学习竞赛在全党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1938年11月3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在会上提议，关于抗大、陕公、党校等各学校的教育工作应进行一次专门讨论，规定教育行政、教材、教员、经费各方面的统一；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会议对他的建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由书记处发一检查工作的通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

12月13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延安党政军机关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机关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指出，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毛泽东最近在各种会议上号召边区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努力学习文化。社论还说，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领导干部要学习高深的革命理论，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下，能决定自己的工作

方针，正确地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一般干部和群众必须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准，以建立学习理论的必要基础。

1939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议设立干部教育部，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同月，干部教育部正式成立，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包括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而最主要的是在职干部教育。

在忙于战争和日常工作的环境中坚持学习，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部分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学习马列理论也有实际困难。针对这种情况，5月20日，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讲演。他说：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作骨干，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高潮。他还说，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的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是从学堂里来的。进学校只是进一个门，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研究。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要学习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张闻天、李维汉在会上都讲了话。他们指出，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具体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们强调在职干部学习必须有持久性和恒心。

毛泽东的报告使大家深受鼓舞，学习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党中央对学习的内容也作了精心安排。1939年3月，干部教育部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计划》把学习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主要为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他们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为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他们以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为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他们同时学习文化课与党的建设。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课程的设置，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原则，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类课程。初级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游击战争（包括军事常识）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级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布）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和军事理论。规定指出，以上课程，干部学校可依次分期举行，在职干部可参照学习研究其中一种，最多两种。同时，提出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为了推动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又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

在1940年这一年内，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办法。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延安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达到

4000多人。其中甲类837人,乙类2255人,丙类968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都带头成立了学习小组。陈云领导的组织部学哲学小组坚持了五年,影响很大。

当时,在职干部学习主要靠自学,同时给以适当的辅导。辅导的办法,一是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学习。为了提高指导员或教员的水平,又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问题等各类研究会,各单位教员一律参加。二是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指导,解答疑难问题。三是请党中央领导和各地负责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毛泽东多次为延安的干部作报告。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1939年7月8日和12日在马列学院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干部教育部组织的。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专门给《解放》杂志编辑部写信,说刘少奇同志这部著作,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当赶快发表。类似的报告,从1939年5月的动员大会之后,到1940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举行了八次。

经过一年的学习,各类干部基本上学了一门课。据1940年6月6日对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总结,学习的成效是相当大的。许多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都比以前提高了一步。许多同志对于党和党的工作的观点比以前不同了,自觉性提高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和无原则的现象大大减少了。有些同志自觉寻找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并力求克服它们。许多同志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因而工作效率提高了。

在职干部教育运动开展起来后,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干部学校也由短期轮训转到正规化,延长学制,一般为一年、

两年甚至三年,确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比较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全党整风开展起来后,毛泽东曾经这样谈到学习问题:这次学习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这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的中肯估计。

二、毛泽东揭示整风主题,但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

在党的领导层中,虽然经六中全会制止和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的认识始终没有统一。1940年,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并在第三版的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还说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些材料的帮助。

特别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以及其他一些政策上,“左”或右的倾向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轮流交错出现。由此又引起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某些争论。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

的形势。毛泽东首先作长篇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毛泽东说，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毛泽东还说：在过去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

毛泽东还联系抗战以来的实际，指出，在建立政权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的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各项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

事实上，毛泽东在1940年下半年已经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要总结和清算苏维埃时期的错误。他的建议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响应。这年11月博古从重庆回延安后，王明很快就向博古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不愿承认过去全部错误的不满态度。这使博古不能不认真看待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严

重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大多数领导人都同意就江西苏维埃时期所犯错误的领导责任进行一次历史性总结，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给全党一个交代。因而，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上，博古表示希望有机会检讨自己的错误，对当时的错误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而张闻天在会上表示：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由此可见当时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并不是批评博古一个人所能解决问题的。

在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之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到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解决。毛泽东还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要分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过去也是错误的。他提出，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不

善于区别对待的片面观点和过左过右的摇摆。这个指示从策略原则上分析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综述和重申了党的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保护人民权利的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

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政治局内一次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作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

1941年1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这次事变带来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了“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同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既然“左”与右的错误都源于思想方法问题，源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那么，毛泽东便要采取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

1941年3月17日和4月19日，毛泽东在1937年10月就已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上分别加写了“序”和“跋”。毛泽东

在“序”中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而怎样才能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呢？“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①毛泽东还突出地强调调查研究对于实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发言权的。”^②毛泽东重新出版过去的调查文集，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是要大家去记那些具体的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面情况的办法，帮助大家找到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毛泽东在全党学习理论之际大谈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指出了一种解决具体工作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在于提出了一种如何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途径。当时延安的报刊杂志，把调查研究称之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而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调查研究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序”和“跋”的发表，实际上为整风作了舆论准备。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在此前后，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组在学习内容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一般地学习马列著作，转为以学习思想方法论为主。

经过长时间准备之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个报告，被认为是整风的动员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显然，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升到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风运动大方向的规定。

毛泽东紧接着又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三个方面，谈到了党内存在的缺点。他指出，党内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在历史研究方面，毛泽东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在学习国际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①

在当时，究竟是谁言必称希腊？锋芒所向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在上述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态度：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第二种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把这种态度概括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即对实事求是作了崭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毛泽东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毛泽东根据党内存在的问题，向全党建议要系统地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改进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

毛泽东的报告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超出对整风运动的指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导范围，它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对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报告在参加听讲的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胡乔木曾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①

其实，辛辣也罢，激动也罢，无非是想唤起更多人的重视，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以便对历史上的错误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

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教育的同志没有理解这个报告的深刻含义，因而没有大力宣传报道这个报告。只是在将近一年后，才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报告。所以，毛泽东在1943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毛泽东对有关部门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这个报告的精神还是流传开来并得到了贯彻。因此，有人把《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开始的一个标志。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第三章

史无前例的政治局整风

一、毛泽东编辑党史文献，“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

人们长期形成的思想方法、观念，不可能在旦夕之间便改变，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否则，整风运动就不可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不久，1941年7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这个通知公布了中央调查研究局的组织机构和各级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等机构。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负责调查研究局的工作，由此可见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

8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文件首先指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对于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与无知，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然后指出，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

基础。这个文件号召大家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中央要求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都设置了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

与此同时,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对上述文件的补充,使各级调查研究机关的任务更加明确。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风气逐渐兴起。

思想方法论的学习,调查研究的开展,无疑有助于人们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问题。但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间,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究竟是不是路线错误,还需要有历史文件的辅助,来唤醒人们的记忆,用新的思想方法来分析那一段不可割断的历史。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称之为“党书”的编辑工作。

所谓编党书,是指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三部历史文献,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对于编辑《六大以来》这套书的情况,当时参与此事的胡乔木有详尽的回忆。^①

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是在1941年八九月间,实际上此书资料收集工作,在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但当时收集资料主要是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因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而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

准备材料的工作最初交给了任弼时,预定1940年10月

^① 有关编辑《六大以来》的资料主要出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底印出准备的各种材料，其中包括六大以来的党的历史文献。但是，六大以来文献的收集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到10月份，找到的文件还很不完全。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邓发等人分头负责收集，其中陈云负责组织问题和青年问题方面的材料，王明负责妇女问题方面的材料，张闻天负责宣传问题方面的材料，邓发负责职工问题方面的材料，限定在11月底完成。由于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很多，根本没有精力去收集历史资料，上述分工实际上不大可行。于是中央不久又决定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收集工作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胡乔木回忆说：

毛主席接手后，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央秘书处指定裴桐同志专门承担文献收集工作，他每收集到一份，便由王首道同志（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转交毛主席审核。毛主席审核完毕，再交王首道同志送印刷厂排印。以后王首道同志不再经手这件事，而由裴桐同志直接同毛主席的秘书联系，直到这时，仍然只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在为七大准备材料，而没有听说还要把这些材料汇编成一本书。

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是在1941年8、9月份，毛主席为准备“九月会议”，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

是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主席的这一建议。

收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是一项既费时又艰苦的工作，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除了从六大召开的1928年至1941年，时间隔达13年之久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此期间中央机关几经长途转移，特别是1934年被迫从中央苏区撤退到陕北，许多文件已经销毁或散失。当时收集资料的主要途径是：一、中央从苏区带到延安的。这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二、毛主席自己保存的，它们主要是毛主席本人的文稿，如井冈山决议（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给林彪的信等，这部分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三、从党的报刊中查找，这条途径查找到的资料也很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的报刊主要在江南、上海一带，长征到达陕北后，查找这些报刊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的决议、命令、指示、通告等在报刊上登载的很少。四、从国民党的报刊书籍中查找，国民党出于其反共需要在三十年代编辑了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有五六本，收集了我党历史上大量的文

件资料。这成了当时收集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主要途径。但从这个途径查找到的文献,特别是党的重要决议、命令、指示等,要看有没有被篡改,这个工作由毛主席亲自审核。尽管通过这么多途径查找,还是有一部分文件在延安找不到。就连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当时也没有找到。为此,中央曾致电南方局,希望上海党组织帮助查找。那时,中央在上海有一个“秘密文库”(即中央从上海迁移到中央苏区后在上海存放文件的秘密地点)。上海地下党从这个文库中找到了一些文件,但没有赶上付印。^①

毛泽东对此书的编辑是极为重视的,他亲自安排分类编辑工作。他是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排的,即首先将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八个专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然后将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毛泽东编排好后,便交印刷厂排印。在排印过程中,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文献。毛泽东将这部分文献分别放在相应的分类专题之后,在目录中则以“补遗”或“拾遗”标明。

《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这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等,共约280多万字。该书内容丰富,工程浩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不易。

《六大以来》的出版,使大家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确曾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177页。

存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原来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同志,在大量的史实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很多党员干部由此产生了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有些同志要求中央像编辑《六大以来》那样,编辑一本六大之前的资料,以供大家研究党的历史使用。于是,毛泽东又于1942年初开始编辑《六大以前》。

《六大以来》的主要材料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占了全部篇幅的90%以上。而《六大以前》的主要内容是党的早期领导人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约占60%以上,因此收集资料的工作相对容易些。毛泽东曾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去电,请他们帮助查找资料。

由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篇幅浩大,一些干部并不一定能有时间完全阅读,因此,在编辑上述两本书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43年又编辑了《两条路线》。虽然材料都是从上述两本书中选出的,但由于只挑选最能代表各个时期党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适合在范围更广一些的干部中阅读。所以,《两条路线》不仅在延安的高级干部每人一套,而且各个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也几乎人手一套。

这些资料书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毛泽东很看重这几本书的影响,他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毛泽东所说“党书”即指《六大以来》。其实,这几套书均可称为“党书”,它成为几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文献。

二、中央政治局初理两条路线,党史争议未作结论

尽管毛泽东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所产生的效应不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整风的准备。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通过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都是从不同角度为整风做准备。

毛泽东始终把整风运动的重点放在高级干部身上。在通过各种准备之后,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解决过去毛泽东数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起但又未能继续的话题,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九月会议”。其实九月会议并不只是在9月间召开,而是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到会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会上首先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一开始便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

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建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

(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16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

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①

毛泽东还宣读了王稼祥拟就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16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

毛泽东的报告和王稼祥所拟的研究题目，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定下了基调。

在政治局的五次会议上共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两次发言，有同志甚至作了三次发言，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

张闻天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在当天的会议上就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明显流露出来的不满，张闻天是心有所悟的，他曾为此感到苦闷，1941年六七月间甚至当面找毛泽东谈心。他愿意承认、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把自己的癞痢头给人家看。”“过去国际把我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26—327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3—194页。

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9月29日的会上，张闻天作了进一步检查。他说：

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极有帮助。必须把自己个人问题弄清楚，才更好讨论。

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自己虽是对这个问题说得、写得都很多，但了解并不清楚。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的了解问题，而不是很具体清楚了解后再提出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真正自己动手做得不够，因而不能深刻了解和处理问题，在实际工作上纠正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错误也不可能。

对于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开始，便已经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这样有力的发展。

我过去处境顺利，自视太高，钉子碰得太少，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应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不能希望一下做得很好，但是要向这个方向坚定去做。^①

张闻天的检讨是诚挚深刻的。事实上，他在九月会议结束不久，便去了农村，以自己的行动“补课”去了。

博古也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布）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在会上检查自己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便参加四中全会的反立三路线斗争，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在9月10日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党内主观主义的根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314页。

源。他说：中国党过去的思想方法论是：（一）机械唯物论——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组织上是家长制度。（二）主观主义——德波林的哲学思想。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三）唯物辩证法——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他指出：“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的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①

李维汉这时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在立三路线时期和中央苏区时都在中央担负过领导工作。这两个时期的错误，他都较为积极地贯彻过。虽然大家在会上对他批评较重，说他检讨不好，有的同志用词还很尖刻，但他还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林伯渠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1936年9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人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他以儒学中汉学与宋学来比喻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指出汉学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检讨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上，都

^① 《王稼祥选集》，第326页。

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①

任弼时发言说：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唯心主义，表现在政治上是“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是更高明的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充分发展。主观主义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必须要宗派主义在组织上来维持。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不愿与群众接近，自己规定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以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而当革命危机时，表现为悲观动摇。他还说：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便是真正的理论。理论与实际联系统一，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如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的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创造。

任弼时还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说他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在反“围剿”斗争中主张诱敌深入，在苏区内部击敌的方针，认识上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但在南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特别是“当时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②

与会者都是在党内外有很高名望的领导人。但他们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精神，坦然承认自己的过错，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胸怀。

九月会议是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对于后来整风运动

^① 参见《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470页。

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胡乔木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后来的历史决议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时，吸收了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的观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关系的思想也写进了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据此，陈云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第二天，任弼时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康生在29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他当时反对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的影响，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九月会议上陈云等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也成为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观点。

九月会议的与会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还有别的同志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不少人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也持批评态度。

有的说，四中全会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有的说，四中全会的中央是书生式的领导。有的则说：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克服了某些明显的“左”倾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尚未克服，以致使白区工作完全垮台。有的还认为，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在党的历史上有其意义，如停止了暴动方针，恢复了中共与国际的正常关系等，都是正确方面；但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思想上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另一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造成以后既反立三路线，又与立三路线合作的基础。^①这种状况表明，在1941年之时，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时机尚不成熟。

在九月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也发了言。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够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中存在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研究实际问题，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②

^①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8—199页。

^②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页。

9月12日，王明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甚至揭发说，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张闻天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博古、张闻天到苏区后却不提此事。^①他还抓住李维汉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会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大讲“他这次轻松愉快，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也就是“还没有认识错误”等等。^②他在发言中还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却不谈自己的错误。

为了对王明进行帮助，10月7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他主张反帝、反封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十二月会议前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7—128页。

^②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王明的态度突然变得如此强硬,是因为10月初季米特洛夫发来一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共中央回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態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它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等等。王明自以为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所以将自己的观点全盘端了出来。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和胡乔木列席会议。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讲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党与国民党发展关系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现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同我们的关系都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第三党与我们关系较好外,其他党派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应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弄得更好些;我党虽在国共摩擦斗争中仍能执行统战政策,仍然拥护蒋介石,但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火,如冀中、苏北等地政策过左,这是妨碍统一战线的。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王明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

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

王明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凯丰、陈云等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不是和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王稼祥、任弼时则以见证人的身份谈了共产国际的看法。

王稼祥说:我没有听到共产国际说过中国党路线不正确的话;相反,王明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国去要与国内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王明的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这个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

任弼时说:曼努伊尔斯基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以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任弼时又说: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明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突出个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毛泽东发言介绍了7日晚上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今晚所说的与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指出，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认识。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为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说，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中央原定10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毛泽东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

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毛泽东也指出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①

但是,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便于10月12日突然声称有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了“大纲”没能讲。自此以后,王明一直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整风解决了认识上的前提。

九月会议还确立了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的组织形式。9月26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1—202页。

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通知规定，高级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中央学习组即思想方法学习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由于参加高级学习组成员们的革命经历和文化水平很不一样，11月2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建议各地根据高级组成员的实际情况，把高级学习组组员分为政治组和理论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各地在接到中央通知后，即开始积极筹备。

毛泽东很重视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活动。在九月会议后，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其进行安排和指导。对于中央学习组，他强调重点放在中共党史的学习，要求将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通读一遍，进一步明确对过去路线的认识。在毛泽东的精心布置下，各地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先于全党其他党员干部开展起来。

三、毛泽东毕生珍爱的没有完全公开的手稿

毛泽东有许多手稿没有公开发表，几乎所有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及一切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人，对这些手稿都十分感兴趣。

在这些手稿中，有两个在延安整风中草成的、十分重要

的而又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的手稿，一是后来更名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一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后一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被吸收进《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而前一篇文章始终没有全文发表过，从而使人们始终有一种“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感觉，也因此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持有一种强烈的好奇欲望。

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性文件就有了深刻的认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过去错误的揭发批判，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反思。在此前后，毛泽东写下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体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①的文章。这九个文件包含当时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指导性文章，以及当时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这些文件、文章发表的时间，是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这些文件集中反映了当时在路线和策略问题上的错误，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

^① 九个文件是：1.《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2.《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3.《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4.《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5.《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6.《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7.《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8.《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14日）；9.《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

毛泽东这篇批判文章写于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但他本人对这篇文章的具体写作年代记不太清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1964年胡乔木从档案馆找到这几篇文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记起确曾写过此文。1965年1月2日他写信给一中央领导人，请他们传看此文并提出修改意见，信中说：可能是在1941年春季写的，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5月12日在修改此文时又写到：此文究竟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但是，胡乔木考证说，应完成于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因为文中有几处提到九月会议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况，而这些情况在1940年或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是不可能知道的。

应该说，胡乔木的考证是有道理的。毛泽东自己回忆说写于1940年或1941年上半年，尽管并不确切，但说明在选编《六大以来》过程中，在审核那些中央文件、指示、文章的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这篇文章了。而经过九月会议，又了解了更多的情况，那么完成于九月会议以后便是更可信的了。

毛泽东对此文倾注了很大心血。胡乔木回忆说，初稿完成后他请人帮助誊写一份。在这份誊写稿上，他前后作了好几次修改，仅标题就改了三次。初始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也作了一些较大的修改。胡乔木说，毛泽东原打算连同尚在起草的《草案》一并发给在延安的中央委员讨论，但事实上，在延安时，这篇批判文章只送给了刘少奇、任弼时两位同志看过。1965年5月毛泽

东又看过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到：“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①1965年5月的修改比较重要，带有“定稿”性质。毛泽东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原标题成了副标题，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他还把改好的稿子送给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传阅过，但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此文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应该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是极其珍爱的。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

“九篇文章”（因毛泽东所写的批判文章分九个部分，胡乔木为叙述方便将此文简称为“九篇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51页。

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它难以为犯错误的同志所接受，也是可以预计的。

1964年春天，找出“九篇文章”的原稿送毛主席确认时，毛主席最初并没有发表的打算。他在1965年1月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中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在听取其他同志意见后，在5月修改此文时才有了重新发表此文的念头。他认为，由于年深月久，那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人们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①

至此，这篇文章为何不发表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从思想、政治、组织和策略等方面，批判了王明“左”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他的批判文章根据九个文件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既相互联为一个整体，又可独自成篇。

从目前披露的材料来看，这篇文章的重要观点大致如下：

首先，毛泽东在批判“左”的错误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4页。

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反映。最后,毛泽东指责说:

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
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①

毛泽东所表述的是最基本的、与主观主义对立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在表述中又反驳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当年对正确观点的批判，使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其次，关于革命策略问题，毛泽东同样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批判错误的革命斗争策略中表述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他指出，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与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

1931年至1935年1月间的“左”倾中央忽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致使白区工作受到惨重损失，毛泽东痛感于此，指出：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①

胡乔木所说的“辛辣”、“尖刻”、“挖苦”,在这里已经可以体会到了。

第三,在土地革命的路线上,毛泽东当年备受指责,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制订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分配土地的政策被视为“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在这篇批判文章中,毛泽东以反问的形式,强烈地表达出对临时中央从书斋里发掘出来的“左”倾政策的蔑视。他说: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①

毛泽东指出，六大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一类人多地少的情况。但六大认为这一政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策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制度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毛泽东最后说: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第四,对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的表现、产生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与农民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工人较之于农民是先进的与领导的阶级,它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发布了纲领、口号,并且还派遣了自己的先锋队战士领导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并不等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事实。我们说工人先进于农民,是就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说的,是就工人经过共产党从政治上与组织上领导农民斗争说的。我们说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是就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说的,是就工人还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大规模的公开的工人运动(如像1927年那样)去领导农民说的。毛泽东还分析了中国革命不平衡的原因,指出,这首先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说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微弱的资本主

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是因为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是因为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等等。其次也在于主观努力的不够，或是说没有正确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发展革命运动。要改变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必须首先认清不平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然后按照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并适当地运用这些条件去解决。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有一个主观愿望，或是消极等待客观条件的变化，忽视主观努力，都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只能到处碰壁。

第五，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产生的原因、方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观点，发展了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毛泽东首先说明为什么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指出，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其次，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再次，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毛泽东以中国革命为例，

说明怎样才能正确分析两条战线的斗争。他说：例如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以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例如要认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 200 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地主阶级之后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下允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以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作出正确的结论，就不能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最后，毛泽东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称之为“乱斗法”，说这种乱斗法，没有可能将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

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是不可能的。必须正确区分和使用对待敌人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不同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过去并没有特别指出王明是“左”的路线的创始人,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杨奎松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大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

这个决议(指《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较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者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①

毛泽东对那些当年曾嘲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人反过来嘲讽说:

^① 《炎黄春秋》1978年第7期,第21页。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政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一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①

毛泽东在此处从反面说明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无非就是批判照搬照抄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把这个同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联系起来说：

^① 《炎黄春秋》1978年第7期，第21页。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①

从中，读者可以再次领略到毛泽东的激愤之情。

这篇文章有着相当高的理论价值。毛泽东的理论观点，蕴含在犀利的、否定式的批判词汇中间。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情绪化的色彩，平心静气地品味这篇文章，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要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规律，而且还要研究人作

^① 《炎黄春秋》1978年第7期，第21页。

为主体怎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的精髓,把中国革命实践看成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而连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环节的“中介”就是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革命实践,从而达到改造世界之目的。毛泽东无论是对中国革命的斗争策略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的分析,还是对阶级关系、党内斗争等问题的分析,无不渗透着这一精神。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以前也有论述,但不如此文阐述得那样深入、透彻。这说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它仍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其一,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使我们看到延安整风对于清算历史上错误的思想、路线的作用,表明当时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已经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与此相关的是,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几次提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问题,而经过九月会议,毛泽东不仅指出当时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且进一步指出这条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对政治层面的揭发批判,到思想方法论的学习,再发展到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批判与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并指出“左”倾错误“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①从对“左”的路线主要推行者的批评,发展到对这条路线的“创始者与支持者”的批判。而唯有这种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才能把整风所要解决的实质性的问题揭示出来,才能搞好整风。其二,毛泽东在文中的批判固然是针对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6页。

王明的,所谈的具体错误也都是那个时期所特有的,但对其犯错误的根源的分析,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分析,却是在到目前为止的任何时期都起作用的,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它对后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

有人把毛泽东为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封皮上题写了“历史草案”四字),称之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姊妹篇。这篇文章同样没有公开发表,但命运有些许不同。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以《草案》为蓝本起草的,《草案》的主要思想已经被吸收到那个历史性的文件里。即使《草案》没有公开发表,它也已经达到了它被起草时的目的。这种“命运”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写作的动机、方式等不同造成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的个人笔记,是对个人思路的梳理,用胡乔木的话来说是他长期被压抑的郁闷心情的大宣泄,其动机最初只是为了给自己及极少数人看。因此写作用词比较尖锐、随意,也无需考虑他人心理是否能承受得了。而《草案》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给大多数人看,是把个人的认识成果转化为党内共同认识成果,必须适合大多数人认识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因此不能不考虑他人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认识,是否能通过这个《草案》。这就使毛泽东在写作上比较慎重,遣词造句上抹去了那种犀利、嘲讽的味道,从而也就使这个手稿的精神实质能够在党的决议中体现出来。

延安时期,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对《草案》有详细的了解。他回忆说,这个手稿共有16个问题,近2万字,从现存档案看是由江青抄清,用16开纸横写,有36页,毛泽东编号时多算了一页误写为37页。上面还有胡乔木在正文

旁边十多处批注的意见，毛泽东改稿时还将几处的意见划去了。

胡乔木对《草案》的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①

毛泽东论列了四中全会有五条错误：（一）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水火不相容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二）没有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作出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没有具体指出中国革命特点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因而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苏区和白区的策略任务。他们只是抽象地了解立三路线、而不能反对其具体的错误策略，并认为白区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应当继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类的盲动策略，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政治根源。（三）在组织路线方面犯了类似立三路线“压迫政策”的错误，打击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关向应，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等，这些同志在本质上都是好的，这就埋伏了后来的“左”倾路线采取宗派立场的根源。在组织政策上的宗派立场还表现为，不相信苏区党与红军的原有领导，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去取而代之。所谓“钦差大臣”制度自此始。（四）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这对反罗章龙来说是对的，但对全党来说是错的。当时党内情绪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为多，四中全会没有指出党内“左”倾危险的严重性，并强调反对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在全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五）四中全会“全靠共产国际”，只克服了当做政治形态（其主要部分）的

^① 以下《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的引文均出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立三路线,不能克服当做思想形态的立三路线,这是后来形成新的立三路线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谓“富农路线”,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影响中农利益的严重局面。

《草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列举了反映这一时期路线错误的三十多个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文章、讲话,包括前述他所专门批判过的那九个文件。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他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这些都发挥了他在九月会议上的讲话和《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长文中的观点。在作了这个总的评论之后,毛泽东便逐一地对这条错误路线的具体内容、表现特点和形成根源进行了阐述。

(一)在思想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按其性质来说,它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

毛泽东指出,王明、博古路线把反唯物论的主观主义与反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而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这就是他们思想领导的全部。当然,说他们反对辩证唯物论,不是说在字面上、口头上,而是说在实质上、工作上,他们是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说:“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

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态，是比较陈独秀、李立三两个错误时期还要更加发展的，其流毒也最广泛，甚至现在在党内也没有肃清。

（二）在政治形态方面，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否认日本军队的入侵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会产生影响，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时又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不满 10 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及 200 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等等；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建立上海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混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以及对于革命转变问题和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了解等等。所有这些，不但是立三路线的复活，而且发展了它。

（三）在军事形态方面，王明、博古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在 1931 年至 1933 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 1934 年冬以后的长征中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四）在组织形态方面，“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 1931 年 5 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发生了“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

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了在白区和苏区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彻底执行了“钦差大臣”制度；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苏区的党与非党的许多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或逮捕或杀害；在长征前夜，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至于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则是宗派主义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草案》指出，这条路线的第一个特点是形态完备，“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第二个特点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第三个特点是后果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只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几个据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据此，毛泽东指出：“所以我们说，‘左’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路线尽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没有绝对化，仍然指出：说“左”倾路线是错误的，“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并以中央苏区为

例，指出如在打赣州一役失败后，随即纠正错误，执行正确方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实际指挥红军行动的同志接受了正确的意见，取得粉碎这次“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个别的战役作战中，改变了上面的死板的命令，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及在形式上发布停战抗日宣言和与十九路军订立同盟等。此外，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因此，也就可能作出一部分成绩。

毛泽东还论述了同王明、博古错误路线开展的斗争和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路线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在三年四个月的长时期中，王明、博古路线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党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而才能在错误路线统治的长时期内，仍能坚持同国民党作英勇的残酷的斗争，并在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以后，通过事实的教育，使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和红军中的所有将领在遵义会议上反对了错误的博古路线，恢复了原来正确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的决议，虽然在形式上只反对了错误的军事路线、领导方式与干部政策诸方面，还承认过去的政治路线是不错的，但由于这些方面是最主要的东西，又搬掉了博古的领导，因而“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克服了它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一切主要的与重要的东西”。

对于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毛泽东没有展开详细论述，只是概括地列举几项主要的工作。这就是：（一）在惊

涛骇浪之中，完成了中央与红军的长征，保存了干部，奠定了党的复兴的基础；（二）克服了张国焘的路线，汇合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坚持与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使得党的阵地更加巩固起来；（三）建立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合作与全民族的合作，支持了四年多的伟大的民族抗战，扩大与巩固了党的组织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与坚持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四）打退了国内两次反共高潮，训练了干部，克服了统一战线中党内各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右倾与“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强调说，由于遵义会议的路线转变和领导机关的革新，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做了上述工作，使得我党在国内与国际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

从胡乔木转述的《草案》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的确在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甚至在“左”的错误的表现形态方面，在罗列顺序上也是有相同之处的。

胡乔木还把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作了比较，说前一篇尖锐、泼辣，毛泽东个人的喜、怒、嘲、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这个《草案》则是理性的升华。毛泽东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对“九篇文章”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科学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件基础。胡乔木还介绍说，本来这个“历史草案”是准备拿到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通过的。后来，毛泽东取消了这个想法，划掉了原先写在题目下面的“1941年11月×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行字。

毛泽东所以改变想法，主要是因为他的观点在当时还不可能成为全党的共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政治

局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拥护毛泽东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判，对1931年9月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的认识也趋于统一，但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本身的评价还不一致。党的中央领导层尚且如此，全党的认识就更难以一致。胡乔木评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局着手讨论和通过这样带有历史决议性质的文件，对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作出正式结论，显然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此外，几个比较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对这样事关重大的问题，毛主席采取了慎重态度。1942年2月21日，他致周恩来的电报，可作为一个佐证。该电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通过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①

《草案》被搁置起来了，但全党整风随即开展起来了。

四、毛泽东说：“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毛泽东在1941年12月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②

据说，在延安整风中，王明曾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5—23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49页。

来从莫斯科治伤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其实,毛泽东对于理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超乎于党内任何人。这在他被人攻击为“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时就已深刻地认识到、体验到了。但是,他所重视的,决不是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理论和理论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前所未有的事业,革命的特殊性、复杂性、长期性,既给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带来挑战,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机遇。中国革命需要有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由于中国是一个客观革命形势成熟的国家,党一成立就以全部力量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使党内长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缺乏统一理解、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发出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都说明毛泽东比任何人更深地体会到掌握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恰恰是因为痛感于这种理论家的缺乏,痛感于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所以他作出了一个与“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断言,说:“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毛泽东的话是有很大影响的。九月会议前后,在毛泽东的倡导及中央决定的推动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在延安,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纷纷派出考察团、调查团下去作调查研究。这是走出书斋,走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的一步。

1941年8月13日,高克林就运盐问题向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调查后写了一篇题为

《鲁忠才长征记》的调查报告，具体记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各站的情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等。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十分高兴，在报告上写了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①9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的按语。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他说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第二种方法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23—324页。

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篇幅虽不太长,但有很大意义。它补充了以往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指导了当时方兴未艾的调查研究之风。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妇女生活调查团经过实地调查,写出了《沙滩坪调查》《沙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报告。

当时规模比较大、比较早地下到基层调查研究的,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的考察团。考察团由高岗担任团长,成员有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30多人。调查的对象为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等地,西北局边区问题研究室的人员全部参加了这次考察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深入了解了绥德、米脂一带的政治、经济、党务等方面的情况。考察团还先后赴米东、义合、印斗、双湖峪等乡,带回了大量的谈话记录、调查统计等材料,还有一些典型户与典型人物的单行材料和人物传记。1941年9月,柴树藩、于光远、彭平三人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研究,编写出版了《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一书。此书详细介绍了绥、米两个地区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变革历史,土地分配状况,土地租典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和农村阶级关系。全书通过大量翔实生动的材料和40种统计表格,全面地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状况,经过土地革命和未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区别,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变化等情况。这个调查不仅为中央和西北局的决策提供了借鉴和依据,而且成为如何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典范,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年已花甲,仍率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41年冬,他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

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出行前,他们没有通知县政府。12月20日,林伯渠与其他同志一起,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他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检查县里的工作后,便到农村去了。他把随行的20多人分成若干小组,分散到他亲自选择的三个区、两个乡中去,既参与基层的行政工作,又进行农村调查,全面了解农村情况。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农民对政策、对公粮问题的反映,还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在甘泉调查半月之后,林伯渠又去富县调查。他在富县召开了有县参议员和士绅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当时运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还有人就公粮征收办法提出批评和建议。林伯渠对大家所提意见和建议均表示欢迎。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拦马告状之类的事情经常发生。林伯渠在此逗留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事情达40多起。林伯渠对此十分重视,这些案子后来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林伯渠回延安后,在边区政府召开的政务会议上,报告了此行的观感,对三三制政权问题、县参议会的问题、租佃关系问题、人权保障问题、行政机构问题以及干部问题作了详尽的汇报讲话。他还建议要加强下层的工作,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律宣传等等。

军队系统也加入到调查研究的行列中来。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组成考察团,深入部队了解具体情况。考察团由朱德、王稼祥领导,叶剑英、谭政、傅钟、萧劲光等参加,萧劲光任团长,负责调查研究的具体指导工作。考察团分成

组进行考察,历时两个月。考察内容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生产、供给、卫生等,特别是考察各部队对于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执行的情况,对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学习情况,以及执行命令的情况,帮助部队解决实际问题,转变工作作风。

在众多的调查中,最著名的并且后来常被人提起的是张闻天长达一年多的社会调查。

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党内负责宣传及干部教育工作。他曾是推行“左”的错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在遵义会议后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特别是六中全会后,在干部教育工作中力图贯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1940年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经中央讨论通过,得到毛泽东同意。可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在干部教育中,确实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干部教育工作提出了强烈批评,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799页。

毛泽东的批评使张闻天受到很大震动。对于这些批评，张闻天是接受的，并竭力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进。1941年6月张闻天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文件《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多少有些委屈的感觉。他在写于1943年的“整风笔记”^①中叙述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的思想状况时说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确经中央看过，而且特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但是，张闻天后来还是“下了决心找毛主席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张闻天记载，“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毛泽东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他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一阵。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毛泽东的这些批评，跟毛泽东过去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很委屈。事实上，从中央苏区后期，到长征路上，直至抗战初期，他对博古、李德，甚至对张国焘，对王明，都进行了坚决的、尖锐的斗

^① 下述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的主要内容均出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481页。

争。他拥戴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领袖，自己甘当“配角”，使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主张畅通无阻，还一次又一次主动让权。他跟着毛泽东，和全党同志在一起，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开创了历史新局面。这几个字的评语，从何说起呢？不过，毛在报告和谈话中对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所犯“左”倾错误的分析，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深刻的。张闻天服从真理，顾全大局，对毛泽东的那些过火批评，“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没有去辩解，仍然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从九月政治局会议起，张闻天停止了自己的实际工作，集中研究了党的许多历史文件及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的历史中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自己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他痛下决心，要到实践中去补课。

九月会议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他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于是中央从几个部门抽调了九名干部（包括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由张闻天担任团长，前往农村调查。

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率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送行至道旁。

调查团在张闻天的率领下，用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并在兴县黑峪口、绥德等城镇，作了较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在调查中，张闻天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及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他们采用了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基层

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

调查团到达绥德时，驻守在这里的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对张闻天很敬重。当时住房条件差，王震把自己住的窑洞让给他，他执意不肯。经再三劝说，他才勉强答应，还笑着吟诵《诗经》上的两句诗说，这才真是“唯鹊有巢，唯鸠居之”了。张闻天一行在这里住了三天。他同王震、袁任远、苏进等推心置腹地交谈。谈及自己30年代初所犯错误，毫不隐讳，也没有一点消沉之意。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党的政策法规。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深入到自然村。关于调查的对象和重心，张闻天认为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此而及上层建筑。

在神府县，调查团分为四个小组，调查了八个自然村：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阎家山、尚家庄、西山上、路家南坝、崔家峁。张闻天亲自去贺家川，调查很深入，统计非常具体。如关于生产力的情况，了解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粱产量低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蒜头，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张闻天还带调查团的同志在贺家川赶了一次集，看到有专养公驴拉到集市上来配种的，配种一次收三斗黑豆；而养公驴这行当则被视为“贱业”。张闻天告诉县里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种驴的人多了，收费自然就会降低。

在调查过程中，各组同志将通过调查整理出的调查材料，

汇集到张闻天那里,张闻天综合研究后亲自写成调查报告,并送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在1943年10月公开出版,全文约5万字,分41节,附统计表格38张,用确凿的材料叙述了贺家川等八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以此为基础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

在晋西北的兴县,张闻天原想只调查几个村子,但晋西北区党委表示想派一部分同志参加调查团,请张闻天负责指导,一起进行调查。于是,晋西北区党、政、群干部有40多人加入到调查团队中来,调查的范围也扩大到14个自然村。

这次调查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定实施方案。他在出发前召开全体调查人员大会,作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的报告。兴县调查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以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为基本方法。张闻天在兴县的调查中去了任家湾和碧村,就土地占有变化和租佃关系作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

在兴县,张闻天还写了《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对这一地区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的变化、借贷关系等问题作了分析,探讨了租佃关系的变化和执行政策的情况,提出了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在这种调查的基础上,张闻天写了题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文章,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经济落后的农村,必须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论证了党关于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的政策是正确的。

张闻天在兴县期间,正是敌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之际。调查团根据敌情的变化,在黄河两岸来回奔

波。张闻天在这种环境中没有放松调查研究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仅留有记录的就有七次。他还在报告会上正式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研究》和《村政权及其他》的两次报告。

在米脂县杨家沟,张闻天对地主经济作了细致的调查。他借阅了该村一户最大的马姓地主家中保存的近百年的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日常生活收支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账簿,研究了几十天。张闻天还打趣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中的“账本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写出了一份详尽的关于杨家沟地主经济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这户地主兼并土地、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商业活动等情况,统计出该地主30年来收支情况,还参照其他材料统计出近50年来杨家沟一带的年成。这份材料是一篇关于中国地主经济,特别是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民进行剥削压榨,从而得以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翔实报告。该报告在材料的典型性、充实性和可靠性方面,都是同类调查报告中少有的,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闻天经常听取各调查小组的汇报,审阅和修改了几十份调查报告,写出了一批有研究、有对策的调查报告。

张闻天调查期间,正是全党整风普遍展开的阶段。曾有人怀疑张闻天下去调查是为了“躲风”。实际上,张闻天出于两种动机,一是“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已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所以决心出发,考察一时期”。二是“以为我好好的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接触群众,也

就等于整风了”。^①他在调查研究中将调查与整风联系起来，注意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角度来认识问题。他还在晋西北区党委座谈整顿三风的会上发言，结合实际来谈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具体表现，主张从实际工作中学习和研究整风文件，了解其精神实质，根据精神实质来解决实际问题。

张闻天调查回延安后，向中央写了一篇报告，这就是后来十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这篇文章分为十个部分，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调查的心得。他在简要地回顾了调查的过程后，发自内心地说道：

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

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我想，这也许比一切关于这类辞句的空谈的作用，要大得多！

我想，我这次所走的途径，或许是改造像我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吧。这就是说，首先应该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如关于“知识分子”与“理论家”之类的错误思想，然后使他们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

^① 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转引自《张闻天传》，第488页。

确，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的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第一步，没有第二步，第一步的了解是不会深刻的。^①

这是张闻天真实思想的流露，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他到农村去调查的动机。

通过调查，使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我过去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承认了马列主义关于唯物论的一切原则，我当然是唯物论者无疑了。然而一年来的经过，使我对于我过去是否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这一点，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作风。相反的，这正是主观主义唯心论者的特点。所以我的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开始。他还说：许多问题的争论不决，闹不清楚，许多事情的办不好，归根到底，还不是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研究，因而找不到共同承认的真理而造成的吗！

张闻天在实际调查中得出一个结论：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指出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他提出不仅领导者需要调查，而且被领导者也需要调查，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上级的决定必须估计到各地区的不同特点，使之带有原则性；而下级执行上级的决定必须估计到本地的特点，使之带有具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上级的原则决定，在各种不同地区得到具体执行，而使领

^① 《张闻天选集》，第317—318页。

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够步调一致。

张闻天强调,调查研究工作是没有止境的,要长期坚持下去。他还把自己的体会归纳为这样几点:

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像我在上边所说的。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

所以,我并不惭愧,因为我原是一个初学射箭的人。我也并不着慌,因为我还准备长期的从容不迫的射下去。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①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用射箭——“矢”与“的”的关系来比喻,把那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学习称之为“无的放矢”。在此,张闻天坦然地说自己是初学射箭者,显然是对毛泽东的批评所作的谦逊而诚挚的应答,其真诚、无私、坦荡之心令人感慨不已。

毛泽东从30年代就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终于在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得到了全党的认同,调查研究之风终于在全党兴起。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活力。

^① 《张闻天选集》,第341页。

第四章

启 蒙

一、毛泽东号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

在理论界,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现代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在封建文化专制的罗网中冲开了一个缺口,透进民主与科学的光线;二是延安整风,它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状态中解放出来;三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使人们从长期的“左”的错误造成的思想僵化、迷信盲从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这种评价和比较是有道理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①报告时曾说,我们许多同志受了主观主义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

^① 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

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①

毛泽东的讲话总是深入浅出、十分形象而富有鼓动性。事实上,作为一种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这种号召性的讲话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在1941年的高干整风中,这种思想解放的态势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如果只有高级干部的整风,而无广大党员的思想解放,延安整风还是不可能称之为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只有当它触及到广大党员的时候,这个思想解放的威力才能显示出最佳状态。因此,在1941年九月会议初步统一了高级领导人的思想后,在1942年开展了全党的大整风。

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宣部宣传要点》,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点指出:

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①

一句“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表明毛泽东对当时的整风运动的进展并不十分满意。但若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就得更加广泛地动员全党,引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这也是全党整风高潮即将来临的一个标志。

毛泽东认为,没有引起全党深刻注意的原因,或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一时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或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

为着说明那些自以为没有犯错误的同志也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因素,毛泽东列举了主观主义的诸种错误表现,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替政策,对于敌、我、友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而宗派主义的表现则分为党内和党外两种,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页。

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毛泽东还不留情面地指出: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毛泽东提醒大家:在党内与党外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毛泽东所起草的这段话,批评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分量也是相当重的,既表明了他对现状的不满,又表明了整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必要的。

毛泽东起草的要点在列举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①

这个文件表明,毛泽东已明确提出要进行全党的动员。整风从少数高干向全党铺开了。

一般认为,全党整风的标志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页。

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肯定了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然后又指出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由此决定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分别说明了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两种表现形态，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的存在，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中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对于经验主义，毛泽东指出，从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毛泽东通过对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得出结论，这两种主观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

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在宗派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公开发表了自开展整风以来最为全面具体的讲话。他说:由于20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毛泽东列举了党内宗派主义残余的几种表现。首先是闹独立性。毛泽东指出,这种闹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其次表现在干部关系上。毛泽东列举了宗派主义残余在干部队伍中的种种影响,如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等。他说这些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说:“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该同时并进。”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义的指导方针。他说,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

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他详细解释了“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在整风中所包含的内涵，并指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这一方针是针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过火的党内斗争而提出来的，它不仅在当时对于指导延安整风顺利进行有很大的意义，并且成为以后历次党内政治运动、党内政治生活应当遵循的方针。

从这个报告开始，直到4月初，是全党整风的动员阶段。在动员阶段，毛泽东十分忙碌，他作了大量讲话、批示，力图使整风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又不失正确方向。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①毛泽东在演说中罗列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强调要反对党八股，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的演说生动活泼，用通俗的民族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是声讨党八股的范文。

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时，他说：过去的在职干部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页。

育存在以下四个缺点，应加以改正。（一）没有着重本身业务的学习，今后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二）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今后应注重时事与政策的教育，对下级干部特别要着重当地政治情况及具体政策的教育；（三）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四）无组织无目的地进行理论学习，今后应学习实用的革命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并指出，应根据这四点意见，重新起草决定，提交下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这次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资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

九天后，即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电报还说：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

2月2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问题，复电周恩来，指出：政治局去年10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

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一周之后,即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在职干部教育时,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常。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毛泽东还在会上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

3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的会议上,谈了党的创立至六大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白区工作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

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

3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毛泽东大量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毛泽东发言说：我党在过去三个时期中，大革命时期更生动活泼，十年内战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党内党外都是一切打倒，造成自己孤立，直到现在坏的传统仍然存在。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藏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员只是百分之一，我们要听百分之九十九人士的意见。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这是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党外表现的批评。

毛泽东根据中央学习组的学习进展情况，于3月27日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鉴于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讨论党史问题，所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又作了一个《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毛泽东

指出,现在大家研究党史,“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研究党史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即古今中外法。毛泽东揭示说,就是弄清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把党史分成大革命、内战、抗日三个时期,认为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来讲,都说得通。最后他强调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作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

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于在延安讨论中央上年7月1日《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作了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讨论整顿三风及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他在谈了新老干部要相互批评、相互了解与团结,以及批评的态度问题后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毛泽东的指示与会议的决定,不仅对纠正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是一种遏制,而且还对下一阶段的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有指导意义。

经过这一系列的发动工作，毛泽东的整风指示已在全党传播开来。但是，把整风从高级干部转向全党，还要有一个普遍的动员。

二、毛泽东呼吁：“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

毛泽东的动员，得到了全党的相应。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有所不同，毛泽东所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反对党八股》的讲演，都很快刊登在党的刊物上，并得到了有组织地反响。延安《解放日报》对毛泽东的演说都作了报道，并在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报告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介绍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阐述普遍开展整风的伟大意义。仅在整风动员阶段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日报》就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加强地方在职干部教育》《宣布党八股的死刑》《展开宣传工作的新阵容》《培植地方干部》《教条和裤子》《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发扬民主作风》《到什么地方学习》等与整风直接有关的重要社论，刊登了大量的介绍整风学习情况的文章，还发表了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写的有关整风的文章。《解放日报》此时迅速敏捷的反映与一年前是大不相同的。发生这种变化，当然与一年来的高级干部整风有关，也与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解放日报》的改版有关。

《解放日报》的改版，从长远来说，是为了适应党的宣传工作的需要。从现实来说，是为了适应全党整风的需要，同时也是《解放日报》自身整风的一部分。

《解放日报》是1941年3月由党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

和《今日新闻》合并,改为现名的。博古担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上明确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通知》要求各地注意接受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从这个通知可以看出《解放日报》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党中央对这个报纸给予了很大希望。事实上,在改版前,《解放日报》在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国内外形势,指导党的各项工作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毛泽东、中央认为报纸还不能完全适应党的需要,主要存在着党性和群众性不强的问题。

1942年初,中央办公厅的师哲对《解放日报》把主要精力放在报道国际新闻方面,而对国内、特别是边区的情况报道太少有些意见,便写了一个报告给毛泽东,希望能在政治局会议上提一下,以便提高党报的质量。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工作早有看法,于是在政治局会议让人念了一下师哲的报告。此事成为导致《解放日报》改版的直接导火线。但是,如果没有师哲的报告,《解放日报》存在的弱点,也会在整风中被人提起,只是时间早晚罢了。比如,有的读者来信反映说,把贵报各版读过以后,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立论空泛,和我们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还有的反映报纸刊登的异常丰富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联系很少。许多人建议能够多反映党政军民的生活,特别是民间疾苦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应该讲,这些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并且,《解放日报》对配合当时的整风运动也确

实不甚得力。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解放日报》也只是在第三版的右下角发了一个消息。

1月24日,即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动员报告开始前一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时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还谈了广播、宣传部的工作、干部教育等问题。

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时对该报提出了批评,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的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过去《红色中华》是以苏区建设为中心,《新华日报》受了限制。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即博古)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之前,先进行改良。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字,这是针对《解放日报》的问题提出的今后努力方向。

3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造《解放日报》的方案。毛泽东发言说:我们党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

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的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毛泽东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

五天之后,中宣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和以大量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通知》明确了改版方向,要求必须将党报的主要力量放在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当前革命斗争与边区建设进行舆论导向,这样才能发挥党报的战斗作用,而不应大篇幅刊登国内外通讯社登载的与我们关系不大的消息,因为这不仅脱离了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也不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通知》还指出,要使党报的质量有所提高,就必须采用整风的精神来检查和改进党报工作。

3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宣传委员会议,检查《解放日报》边区栏和边区《群众报》。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指出,《解放日报》边区栏的内容还是相当贫乏,公报性的多,教育性和批评性的少;本市新闻多,外县新闻少。李卓然在总结中

说,报纸的组织作用和推动作用弱,宣传部门也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一武器,报社本身和通讯员的联系也很差。同时,报纸对整风的反映很差,没有具体的从各方面揭发工作缺点,配合党的当前政治任务。

对来自中央和群众的批评,博古和报纸编委会成员十分重视。博古在办报方针上,开始时确有一种办成大报的想法,认为要面向全世界,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第二是国内新闻,第三是边区新闻,第四是本地新闻。这种想法恰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说的,写文章作报告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是一种不看实际情况,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毛泽东的批评使博古受到很大震动。特别是经过1941年的高干整风和1942年春全党整风动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清算王明“左”的路线错误之后,博古作为这条路线的主要推行者和执行者,内心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认真清理了自己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观点,检讨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与自己的办报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一方面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承担起改版的领导工作。3月17日,《解放日报》召开了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博古在会上检查了办报十个月以来的主要缺点,即贯彻党性和群众性不够,联系实际不够,缺乏党报应有的战斗性。他提出了今后办报的方针是贯彻党的路线,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情况,报道国内外动向和整顿三风,并且提出了改版的初步方案。

《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人和作家开座谈会,谈《解放日报》改版问

题。博古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认为报纸办得不尽如人意,报纸没有能够尽到它应尽的责任,没有完成党组织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自己应负主要的责任。他还列举了报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办好《解放日报》。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骤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毛泽东提议,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能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最后,毛泽东还提议,这样的座谈会以后要经常举行。

在博古和解放日报社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毛泽东的意图得到了实现。4月1日,改版后的第一张报纸与群众见面了。这天的报纸头版头条还发表了“致读者”的社论。社论说: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姿态呈献在读者面前,我们愿趁此机会总结一下过去十个月来的工作及提出今后本报的方向。社论提出了几个问题:什么是党报?报纸如何才能成为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集体组织者呢?究竟怎样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的武器呢?社论回答说:第一,要有坚强的党性。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要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的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第三,洋溢着战斗性。第四,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提倡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地帮助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

斗争。社论根据这四条检查了过去四个月的工作。社论还强调，报社的工作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真正成为党的机关报。社论还提出希望广大群众批评和监督。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整个版面有了很大变化。过去第一版是国际新闻，现改为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都有，而以国内新闻为主。国内新闻中主要是报道边区军民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报道边区英雄模范的事迹，以便树立典型，指明方向，鼓舞斗志。第一版的社论也以此为重点展开。第二版过去也是国际版，现改为边区版，详细报道边区军民战斗、生产的消息。第三版改为国际版，报道一些国内外、敌占区情况动态。第四版原来是边区、副刊各占一半，现全部改为副刊，使文艺为现实斗争和建设服务。

《解放日报》改版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仅就社论而言，从4月1日改版到9月30日，共刊登145篇，其中有关国内的社论21篇，有关边区及根据地的社论69篇，有关整风运动的26篇，而有关国际的社论只有29篇，这就大大改变了过去重国际、轻边区的倾向。

在《解放日报》开始改版后，中央为了加强《解放日报》的领导，调陆定一任总编辑。9月5日，陆定一在新华社编委会举行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具体意见。大意是，毛泽东认为《解放日报》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七七”宣言以后的社论、印度问题、参议会、自卫军等几篇社论有错误，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报纸仍未和中央息息相关，虽然总的方向是对的。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自由主义在报社内不能存在。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需与中央商量。

陆定一的传达在与会者中引起了震动，报纸不能有独立性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重的批评，尽管这个批评是从总体上针对宣传工作而言的。

博古对毛泽东的批评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在编委会上说，《解放日报》没有成为“完全”的党报，主要指的是我，责任完全在我。他认真作了检查，说自己决没有向中央闹独立性的想法，但在客观上还缺乏及时请示报告，因此有些问题便不可能不出政治差错，这主要是组织纪律性不强所造成的后果。

对于毛泽东的新的批评，博古竭力改正。他和陆定一一起，多次召开编委会，讨论如何正确对待中央的批评，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今后如何增强党性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如何更好更有利地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等问题。报社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制度，以制约报社工作、报社工作人员能够符合党的需要，真正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9月15日，毛泽东和博古谈话。博古汇报了编委会讨论的情况和制定的一些制度，毛泽东表示满意。当天，毛泽东致信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即凯丰）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①

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报纸是党的喉舌，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按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党报不仅要忠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社论还说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有恭谨勤劳的态度。这表明,《解放日报》在党性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

《解放日报》副刊曾经刊登过一些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有许多是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但也有些作品,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整风中受到严厉批评。报社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加强了对副刊的改革力度,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使副刊的文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更加大众化、通俗化,更符合群众的要求和口味。为了解决副刊的稿源问题,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并亲自替副刊约稿,甚至在枣园设宴邀请了16位撰稿人。

在毛泽东的督促、帮助下,《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终于完成。《解放日报》解决了群众性与党性两大问题,在成为真正的党报的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思想问题,使自身的整风顺利开展起来。《解放日报》在动员全党整风、介绍整风工作的经验、指导整风工作的具体进行方面,起到了它的职责范围内应起的作用。

三、整风动员造成“一河大水”,冲向各个部门

毛泽东很希望能够通过整风,“形成一种风气、一河大水”,冲刷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弊病,使党的面貌

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但这种风气的形成,要靠全党的努力,一河大水的形成,更要靠涓涓细流汇集而成。于是,就有了各部门、各单位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在《解放日报》改版整风的同时,延安的各部门各机关也开始了整风动员。

中央党校和中宣部是整风的重点单位。

毛泽东在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曾说,1941年的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作整风报告的。毛泽东的话固然是极而言之,但也说明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工作并不满意。

中央党校在抗战中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干部,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党校在整风前也的确存在着主观主义的影响,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讲课都是理论条文,由远到近,由国外到国内。多数教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有的教员讲第一次国共合作,学员提出讲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个对比,但是教员却讲不了。有的教员讲《资本论》,学员提出边币同法币、伪币斗争问题,教员也说不清楚。有的教员讲《联共(布)党史》,一次讲两章,学员不仅理解不了,有的甚至讲到哪一页了都不知道。学员反映,有的课是“讲课讲条条,考试考条条,学员背条条”。中央党校成为整风的重点单位也就在所难免。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开展学习竞赛,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央就已调整了中央党校的领导班子,由邓发任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这个时期,开始注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组织学员和工作人员组成实习团,到边区的县、区、乡,一边工作,一边调查研究。实习团最长的一次调查研究达半年之久。这期间,毛泽东为中

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匾额，镶嵌在中央党校新落成的大礼堂前。中央党校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从整风的精神来看，中央党校还有待于进一步改正自己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提出调整中央党校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2月28日通过《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决定》，决定对党校组织进行调整，规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负责政治上的指导，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取消了原有的党校管理委员会。邓发仍任校长并主持教务会议，彭真任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原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入党校。对于党校教育方针，决定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学习党的路线，并出版《学习报》，由彭真主编，陆定一副之。党校的整风由彭真具体负责。这次改组的目的，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适应毛泽东提出的整风精神。

在中央的指示下，彭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党校整风学习的计划，经过酝酿、准备，在中宣部发布整顿三风指示之后，就开始整风学习。

中央宣传部长长期主管宣传教育工作，干部教育部成立之前，所辖工作范围更广。而在宣传教育工作中，主观主义的影响也是严重存在的。1942年3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对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的具体执行办法。总政治部、中央直属党委、西北局都派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过去在职干部教育工作进行了检讨，指出：（一）过去教育方针和目的不明确，只提出了在职干部应受教育，但如何去教育，受怎样的教育，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就考虑和研

究不够,使在职干部教育一般化,理论和现实分离,学和用不联系,搬用教条公式,其结果就造成空谈抽象理论,越学越不安心工作。(二)领导教育工作的机关,工作和研究不具体不深入。(三)不懂得所谓“业务学习”,一般认为业务学习不是教育,也不是理论,结果造成有些同志感到业务上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四)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了解到党内许多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足,怎样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不懂得不提高文化,就不能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五)中国问题的实际材料、书籍以及中级干部学习课本供给不够。

针对存在的问题,会议指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干部教育方针已经确定,在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与可能的教育,以提高其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教育的目的,是使干部能达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会议指出,在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种教育中,今后首先从业务和文化教育着手。学习业务者同时学习时事政治,但业务教育和时事政治教育孰为主孰为辅,由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学习文化的,确定以文化教育为主,时事政治教育为辅。关于干部的业务教育,决定由罗迈负责筹划,由宣传科搜集党成立以来的宣传文件,出版《党的宣传资料》,作为宣传工作经验的总结,作为宣传政策研究之用。对于在职干部文化教育问题,中央直属机关决定将杨家岭划为文化教育实验区,以便总结和研究工作经验,供各机关参考。此外,还准备成立文化教育研究会。文化教育书籍的出版,由徐特立负责,编辑史地数理等教科书,预计3月底完成。在职干部教育的测验、考试制度,中央决定宣传部成立考试委员会,由徐特立负责。会议还决定,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党内生活专栏,加强干部教育。

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延安各机关学校检

查工作的决定》。《决定》指示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各单位均须根据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方针,检查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各单位的工作,并写成总结决议草案,交中央审阅后,由各单位总结会议通过。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具体分析与研究各个问题,着重检查领导工作方面的缺点,彻底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并造成新的工作作风。

几天之后,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一个《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的通知》。《通知》指出,1941年8月1日颁布的调查研究决定是反主观主义的重要指示。中央书记处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详细询问各地对于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的情况,要求各根据地对《通知》中提出的各项问题加以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经验作出总结,上报中央。

这两个文件下达后,各单位迅速掀起了检查整风学习、工作情况的热潮,成为全党进入整顿三风门槛的一个直接的台阶。

延安大学则根据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决定把中国政治、中国经济、根据地情况和政策、敌伪研究、中国通史、国际问题、三民主义、思想方法论、国文等列为一般必修课程。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延安大学各院系的学生参加了普查团,深入区乡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学校的教材和实际联系起来,力求实用。在学术研究上,将开设各种讲座,各派不同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3月26日,延安大学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全体党员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大胆批评的精神,对学校的领导工作缺乏民主、不团结现象进行了批评。在会场紧张热烈的气氛下,有的领导当场承认错误,作了检讨,表示决心改正过去的缺点错误。当然,也有个别人认识不足,缺乏公开

承认错误的精神。前者得到了全体党员的尊重，后者仍为大家所不满意。到会党员深感这次大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大家大胆发言，使每个党员真正做到了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批评精神。大会对即将开始的检查工作起了动员作用。延安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决定将检查运动从上层发展到下层，扩展到各部门各支部。对于在大会上没有解决的具体问题，总支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检查委员会，予以调查解决。

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在全院进行工作大检查，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在听了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后，结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对自己的思想、行动作一番深刻的检查。中央研究院还决定成立检查委员会来领导和计划检查工作，副院长范文澜和各研究室研究员等21人为检查委员。1942年3月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于学风、党风、文风的大检查。检查委员会为了推动这一检查工作，出版了名为《矢与的》的墙报。后来，《矢与的》墙报成为延安整风中十分著名但有很大争议的墙报。

根据中央的精神，鲁迅艺术学院^①召开扩大的院务会议，布置整风和检查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这次检查要真正根据整风的精神，检查各部门工作，传递清查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使艺术活动、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能够有实际的改进。检查的步骤，首先是根据本院的特点，传达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报

^① 鲁迅艺术学院创办于1938年2月，1940年春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年5月，毛泽东题写校名为“鲁迅艺术学院”。本书统称“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告,搜集有关三风的材料,如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工作条例、艺术作品、党的文件等,加以深入研究。时间定为三个星期,课程照常进行。接着,停课一周,检查全院工作。最后,由检查委员会根据各部门的检查材料,作出结论,提交全院大会讨论。

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在院整风壁上著文号召大家大胆发言,认真检讨。他写信给院党总支委员会,提出检查工作的方针是:“检查领导,检查整个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却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①根据他的这些意见,自然科学学院行政和党组织决定召开全院大会,会后一周内作为搜集材料准备意见的时间。全院人员可以自由联合,商讨意见,以便在总检查大会上能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进行公开批评。院部还召开干部大会,对院领导的工作、教学方法等作了检查。中央关于整风的号召,也引起科学院党外人士的注意,他们说,不仅党内要实行“脱裤子”^②检查,我们党外的同志,也要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进行检查。4月4日,自然科学学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会上民主选出整风委员会,推举了17人为执委。为了便利整风,有三位党员退出了执委会,让给非党同志。执委会总共有四位非党人士。在整风委员会下设三个组:政治组专门检查党务、政治教育和干部教育;行政组检查日常事务、行政方面的工作;教育组检查学校教育计划、方针、教学方法。每组中设立宣传员,专门负责搜集整风中的各种材料,进行宣传工作。会上,大家一致提出,科学院的整风,不仅在整顿自己,而且要开展到全延安的科学界中去。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② 在整风运动中,“脱裤子”一词用来形容坦白、暴露自己的缺点。

启蒙的“大水”从延安向设在各地的重要机关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组织涌去。

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就五五学习节问题向各分局、区党委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今年的学习节应该成为认真地具体地总结华北地区几年来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节日；应该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干部中的残余；应该将三年来在各地不同环境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所创造和积累的教育方式和学习方法，具体总结出来。通知还说，从1941年7月和8月，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华北党的教育工作，还没有引起大的转变。今年2月28日，中央根据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精神，又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华北根据地党组织要根据中央这些决定，彻底检查和改造自己的在职干部教育工作，使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精神，首先从干部教育中生动地、具体地体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还规定了详细的办法。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整风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就开始准备了。1941年夏，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南方局还学习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学习过程中，周恩来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剖析，指出他们在政治上自由行动，搞两面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思想意识上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恩来要求大家联系思想实际，通过学习增强党性。1941年10月初，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成立高级学习组开展学习的决定，南方局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共25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组。学习组以学习思想方法论和党史为主，学习时间为半年。这次学习，由周恩来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

时期的党史，总共讲了十多次。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时，周恩来总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使大家深受教育。1942年3月中旬，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开展了整风改版活动。年初时，党外人士张申府曾给《新华日报》写祝辞：“新华、新华，我看你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祝辞”。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此文，毛泽东读后致电周恩来，说张申府的文章表示了对我党的满腔热情，“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他还说要改进《新华日报》，“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①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传达，对整风改版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得到了报社全体人员的积极响应。《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三篇重要的整风文献。4月26日又发表了《怎样办党报》的文章，还刊登了列宁论党报等。报社还专门发表社论，呼吁广大读者给报社提意见，并连续刊登了《本报特别启事》，征求读者的批评。报社还多次召集大型座谈会，邀请当时云集在重庆的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征求各方批评。《群众》杂志也发出通告恳请读者批评。南方局报刊这种以整风精神办报的做法，不仅是报刊改版的必要步骤，也为南方局全面整风作了舆论准备。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位置比较特殊，它设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但管辖范围却是西北地区，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在1942年3月召开了宣传委员会议，检查《解放日报》和《群众报》的情况。《群众报》是边区发行面最广的报纸，读者主要是区乡干部，报纸的内容侧重于帮助区乡干部的业务、政治学习，经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过干部灌输给群众。主编胡绩伟说明《群众报》改版后的内容,应着重刊载工作问题及具体知识,帮助区乡干部学习。

军队系统的整风学习、检查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42年3月,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组成考察团,深入到各部队进行检查。各部队加紧开始整风教育和各项工作。留守兵团政治部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关于干部教育以本身工作为主,文化、政治为辅的精神,拟定了干部教育方针,确定部队教育以学习军事、学习各部门本身的工作为主。各部门的最高行政首长负责干部“本身工作”教育,其他教育由宣传部门负责。干部教育按文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四类,设置不同的课程内容。教育方式采取注入和启发并重。留守兵团政治部指出,文化知识的提高为全军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应从营团以上负责干部做起。战士教育仍按照军事第一,文化第二,政治第三的原则进行。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942年3月23日在太行召开宣传教育会议,检查过去全军干部教育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宣传上的党八股作风和战士、事务人员中的形式主义。会议对战士教育、干部教育、教育行政、宣传工作等都作了深刻的检查,并提出今后改进工作的意见。在教育方面,会议提出了六条意见:学习的内容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三种;彻底实施业务教育,学习时事;明确规定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同学习分量;业务教育的领导由各该业务机关负责,各种教育都确立定期考试制度;教材的编订根据初、中、高级班不同情况分别由军区师各战略单位编订或购买;教员问题由各战略单位负责。关于宣传工作方面,提出要争取对敌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克服过去枯燥的教条口号,制造生动活泼有力的宣传品,适合群众心

理,利用民间形式,组织民间宣传,加强对敌宣传政策和宣传品的研究。大会为了使宣传干部对敌我宣传有切实的了解,特辟一个宣传品展览室,陈列宣传品 900 多种,用敌我宣传对比的办法,来研究改进自己的宣传工作。

这次会议开了 18 天,到 4 月 9 日闭幕。罗荣桓在总结中说,在职干部教育,过去虽有成绩,而最大的缺点,即在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祟,使干部教育未能收到更多的成果。根据中央指示,今后干部教育为教育工作的第一位,战士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主,基本教育为辅,逐步做到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合一。今后应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尽量吸收他们参加一些会议,丰富教员的政治生活。关于目前的宣传方针,应该主动地向敌人进行政治攻势,揭破敌伪欺骗宣传,研究宣传技术,提高政治上的敏锐性。要抓住每一具体事实作宣传,由党的小组起,号召连队进行近处宣传,关心群众利益,驳斥一切恶意的造谣污蔑。大会号召太行区全军,从 5 月 1 日至 7 日,召开宣传会议,检讨工作,进行整风,使全体指战员在思想上有新的转变。

八路军总政治部于 1942 年 4 月 2 日召开各部部长会议,研究如何布置讨论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会议决定,指定专人负责重新传达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并责成各单位慎重进行讨论。会议拟定了检查提纲:(一)行政间领导方式、态度、工作关系等。(二)工作检查(包括各部门)。(三)关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意见。(四)对支部优缺点的检讨。(五)党性。总政治部准备在讨论前作广泛动员,务使深入。每星期讨论一次,一个半月讨论完毕。

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各地都以空前自觉、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次学习、讨论和检查。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

立以来,虽经过无数大的风浪,但以如此之大的力量来掀起一个学习党的文件,触及人的思想,解决工作问题的浪潮,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在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上都找不到先例的思想解放运动。当然,运动才刚刚开始,它的效果,要到后来才能看出来。

各根据地由于处在被敌包围、相对分散、相互联络不甚通畅的状态中,因而整风运动开展的具体时间略有不同。有的地方已进入整顿三风阶段了,有的地方才开始整风动员。整风的具体内容上也有侧重点的不同。但是,从总体上说,在1942年4月3日中央颁布整顿三风的指示前,大部分地区已进行了整风学习的动员。因此,一般把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至1942年4月3日中央颁布整风文件作为全党普遍整风的动员阶段,以区别于这之前的高干整风和之后的深入整顿学风党风阶段。

经过如此广泛深入动员之后,整风转入下一阶段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一河大水”,已形成波涛汹涌之势。



第五章

整顿学风高潮迭起

一、毛泽东说：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令常人感到不可想象。但是，毛泽东却把整风当作一种克服困难、走出艰难阶段的手段。他认为，在1942年开展全党的普遍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这种必要性是由于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造成的。

自全面抗战以来，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一方面因日本的进攻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所以要抵抗日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又不时表现出妥协的意向，这种状态已经表明单靠国民党的抵抗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是历史与客观现实所赋予的。党的发展壮大是实现这种领导责任的前提。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限制。从客观上来看，有两个反对共产党发展的因素：

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竭力要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1940年以来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1940年以后受到很大损害。

二是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一直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一直存有戒心，力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曾两次发动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封锁边区，使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从主观上来看，也存在着使党的发展受到限制的因素：

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全党仅有党员 4 万人左右。经过几年大规模发展，到 1942 年初，全国已有党员 80 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游击队）有 50 万人。但是，另一方面，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党员队伍的和党的干部队伍的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在民族浪潮高涨时加入革命的。在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 90%。他们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统一的理解。许多人对共产主义不甚了解，不懂得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这就需要全面提高这部分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二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党内曾盛行多年，虽然毛泽东从 1935 年遵义会议以后就在不断地为肃清教条主义的遗毒而努力，但是，在全党，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有的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三是抗战以后成千上万的青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形成了一股革命潮流，在这潮流中难免有泥沙裹挟进来，因而某些组织不纯的现象也是难免的。

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自己的领导责任，走出困境，就必先战胜自我，使自己更坚强，更壮大；必先克服影响自身发展的

主观因素，才能更有力地击破来自其他方面的限制和反对因素。因此，除了在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政权建设上实行精兵减政、三三制等政策以外，在党内就是开展整风运动，以便实现党的作风的根本转变，使广大党员、干部适应形势的变化，振作精神，迎接未来。毛泽东本人对整风寄予了厚望，他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作风的发言时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我们这些学习好了的干部可以反对黑暗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都是全国性的”。这是对整风的必要性的最好概括。

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也是可能的。虽然日军总是想削弱、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中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其军事力量还不可能全部用于消灭共产党。在国民党方面，自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有所减少，两党的政治关系有所松动。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不能不有某种变化，总的趋势有利于国内局势的缓和，新的反共高潮在短时间内发动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上避免刺激国民党，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巩固内部。这样，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整风运动就带着势所必然的力量在全党铺开了。

毛泽东领导整风的思路很清楚，即从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联系历史和现实，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的对象先是高级干部，后是一般党员群众。整风的

主要内容由高级干部讨论党史为主转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作风为主。因而，在全党整风阶段，又可分为思想整风（整顿党的学风党风）和审干运动。思想整风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又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每个小阶段大致四个月，至1943年3月中旬结束，前后共计一年。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的。《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不只是揭发和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和巩固成绩和正确的方面，并要估计到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哪一方面是次要的。如此，方能运用中央文件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个决定因其是全党整风正式开展的标志，后来被称作“四三决定”。

《决定》还规定了 18 个必读的文件,即: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红四军九大论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宣传指南》,“四三决定”和康生的两个报告。

在讨论通过这个决定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负责领导:中央直属机关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军事院校除外)由何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

不久,1942年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通知,增加了四个学习文件:《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这样,中宣部的两个文件先后规定了 22 个文件为整风必读材料。中宣部还要求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的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还要求大家逐件精读,写出笔记,深思熟虑,反省自己。

“四三决定”发布以后,整顿学风的运动首先开始了。这是第一个小阶段,大约持续到 8 月初。

学风学习阶段,着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在延安参加这一阶段整风学习的干部有 1 万多人。

毛泽东以其惯有的一抓到底的精神推动着整风学习的进展。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报告首先阐明了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毛泽东从三个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一是从迎接形势的转变来考虑问题。他指出:“今明两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①二是从历史对比的角度来阐述整风学习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三是从延安的地位来加以说明,指出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做全国性的工作的。二来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到这里来了,这些干部本来是全国各地的,他们之所以到延安来,或者是因为在原来地方立不住脚了,或者是因为有事情要到延安来办,或者是到延安来学习

^① 此段引文和以下出自同一篇文章的引文,均引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的。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

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不正之风。中央各个部委除了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个工作。毛泽东还说，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况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22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学校规定用两个月，机关规定用三个月。学校两个月如果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下这样一个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对于整风的准备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说：

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再来一个三个月的突击，在突击以后，就要转为经常的工作了。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决心肃清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是沉淀心头多年的心愿，而整风运动不过是被毛泽东认为最适合清除主观主义作风、进行思想革命的一种形式罢了。但这种形式既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适用的，那么就必须要

动搞好，搞彻底。这也是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重点。他甚至这样说：

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

毛泽东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主观主义的毒害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还提出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这毛病如果不经过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 22 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

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中什么是实际的问题作了解释，说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他还强调，这次整顿三风，重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他详细讲了写笔记的问题，说我们的“紧箍咒”里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他号召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

毛泽东还就搜集最好的和最坏的两种典型材料问题、鼓

励大家发言问题、行政首长负责问题作了指示，内容之广泛，指示之具体，都是不多见的。而目的就是“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于我们理解延安整风的意义，理解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有很大的帮助。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发动整风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措。这种举措的出发点，首先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这是由于过去很少对整个干部队伍进行这种教育，现在要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就必须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毛泽东谈到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可见其用心良苦。其次是从长远出发，考虑到对将来、对整个革命的领导责任，实际上也是从对历史的反思而得出的结论。第三是从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出发，主要是为了渡过最困难的这两年，争取抗战形势的好转。

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在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再次体现出来：

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①

毛泽东在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提议，在学习与检查工作时期内，编辑“学习”专刊，在《解放日报》第四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7页。

上发表,每三日出刊一次,组织陆定一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后来,“学习”专刊在1942年5月13日正式刊出,到1943年1月16日止,共刊载24期。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到整风问题时认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热潮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必须加强领导。会议决定:(一)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起延长到9月20日共五个月,学校由4月20日起延长到8月20日共四个月。(二)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三)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领导。(四)改进学习方法。

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了时局问题、整风问题和延安文艺界问题。他在谈到整风时说:一个月来整顿三风有很多成绩,党内党外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很多人改变了态度,改变了面貌,但是也有一些偏向,例如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着重学习和领会文件,轻视整风,害怕整风,学习、领导、工作都缺乏计划性等等。现在是深入学习的问题。

为了便于领导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按照中央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日常工作由康生具体负责。总学委下按各系统设分区学委会,领导延安各系统的整风学习。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委举行第一次会议,对总学委巡视团的工作作了规定,同意李富春所提出的巡视团中各巡视员的分工,规定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的各同志都可参加。会议决定加强“学习”专刊编辑委员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康生领导编委会工作。还规定总学委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总学委可以抽阅延安

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总学委还要轮流抽阅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笔记(由总学委通知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

五天之后,总学委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了几项事关整风大局的事宜:(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先行讨论《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和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十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小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调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在整风学习中,各系统所属之重要机关学校,应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四)由中宣部通知全国各地党委,按照延安精神,暂停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和党的历史研究,集中精力研究整风文件和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开展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整风文件。(五)中央总学委建立秘书组,处理日常工作,由康生负责。(六)杨尚昆、柯庆施参加中央直属系统学委常委工作。

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央总学委就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中央学习组的同志按照新的规定学习文件,但同时指出各机关学校仍按原定计划学习。

根据会议精神,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整风学习从4月10日在延安进行以来,已收到很大成绩。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的思想改造和工作的改进都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因此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指示》要求各地参考延安的经验和

中宣部4月3日的决定,进行整风学习。

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不仅自己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学习,并且密切注视着延安的动向,如对王实味问题、文艺界问题,他都及时地发表了讲话,拨正整风的方向。他对各地也不时发出指示,或介绍延安整风的经验,或提出各地应注意的问题。如1942年6月16日、6月26日连续致电周恩来,都谈到整风问题。在6月16日的电报中说:22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在6月26日的电报中再次谈到延安整风学习及参加学习人数的情况。

聂荣臻写了一篇题为《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的文章,准备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前先由毛泽东审阅。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说:

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

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①

刘少奇在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途中在山东停留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给他去电时,同时告诉他:学习22个文件在延安收到极大效果(延安有1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繁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的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在学风学习渐入尾声的时候,7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央学习组学习此次规定文件的问题作出决定: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在学习中联党的历史来研究,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少联系到个人;除十八条外^②,另制定一些学习参考材料;应作笔记,真正写出心得和自己的反省。

8月3日,毛泽东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议,暂行停止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十八条的计划,待22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同时为准备将来的学习,重新指定43人编成9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会议还决定,为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1—392页。

^② 指《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

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可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五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8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中央学习组学习计划的决定,并按工作关系重新决定由48人编成9个小组,继续研究十八条。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三人编为第一组。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整风的各种指示、建议,对整风运动的进展有极大的影响,而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学习组的活动,在全党又起到了示范、指导的作用。

二、从延安到各根据地,学风学习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1942年4月中下旬期间,西北高原普降春雨。据说榆林一带,多少年没有遇到这样好的雨水了。

好雨知时节。马克思主义的春雨,将会哺育新老两代干部的成长。

在党中央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各系统各单位的整风学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整风学习是最早开展起来的,并且整个操作过程比较规范。

1942年4月13日,中央直属机关为了统一研究中宣部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组成了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委员会对中央各直属机关研究整风文件的学习组织和领导、学习计划、时间分配、课程编制、研究讨论的方法等,都作了初步的讨论。委员会推举康生、李富春、曾固、徐以新、曹轶欧等五人为常委。16日,常委会拟定了具体学习计划,报中央书记处批

准后公布。学习计划规定三个月完成,在这个时期内,各部门其他政治业务教育都停止,以研究整风文件为中心。会议还决定日常工作可能减少者都应酌量减少,以便集中精力深入整风学习。几天之后,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通过了中直系统四个月研究整风文件的计划。计划规定从4月20日起,阅读全部文件,为粗读阶段。5月20日至9月20日为精读阶段。计划把整风学习分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综合研究四个部分,对每部分所阅读的文件和时间都作了具体安排。计划还规定从9月21日至9月30日为考试和总结学习经验作准备的时间。

4月1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在八路军大礼堂联合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王稼祥、康生出席大会。王稼祥对时局作了分析,指出我们正处在抗战困难时期,大家应该好好研究中央文件,改造工作作风,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康生对于怎样研究中宣部“四三决定”作了报告,并就中直机关学习计划作了说明。

随后,各单位按照统一部署进入了学风学习阶段。

中央宣传部为了使干部充分掌握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关于整风报告的精神和实质,并能在工作中正确运用,除发出“四三决定”外,又把这个决定和规定的文件铅印了1万份,以便使各单位有充分的材料深入研究。文件按总政、西北局和中央直属党委三个系统分发。

《解放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在全党整风开始前的改版工作中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在全党轰轰烈烈地开展整风之际,也掀起了学习的高潮。报社的工作人员,对于规定的阅读文件已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以自学为原则的甲级学习组,除阅读、作笔记以外,还召开了小型的漫谈会。由指导员

来辅导学习的乙级学习组的同志,到处虚心询问着如何反省,如何写笔记。有待讲授的丙级学习组,文化教员忙于准备参考教材,筹划开课。墙报《春风》已成为交流学习体会的园地,各学习小组确定了通讯员,经常向墙报写稿反映本小组的学习情况、疑问和经验。大家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学习委员会随时都作了解答。

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办了一个很著名的墙报——《轻骑队》。在整风学习初期,《轻骑队》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党内的某些同志、某些现象进行批评,在延安名声大噪。在整风运动中,这个墙报与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齐名。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四三决定”后,《轻骑队》编辑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号召检查一年来的编辑工作,认为过去的编辑方针有错误,主要表现为没有能够坚持以照顾全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的精神来进行批评,使批评往往成为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对立,因此不但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而且在实际上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有些甚至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编辑委员会检查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

在中央整顿三风的精神指导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在4月上旬成立了检查委员会,并拟定研究整风文件的步骤。学习委员会规定,每篇文件讨论后,每个同志必须重新写一篇三五百字的短文,扼要说明自己对文件的了解和读后的心得,作为考试成绩的试卷,不另行测验。每周由学习委员会检查一次,评定优劣,公布名单,以示奖惩。

1942年5月,中央直属系统学习总委员会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总结第一个月的学习。康生在会上作了学习的初步总结报告。报告指出:这次学习在延安已掀起空前的热潮,为延

安历来所未有，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伟大的学习运动。现在高级干部既忙于自己的学习，又要领导学习；中级干部在散步时，闲谈时，吃饭时都是谈论学习问题；初级干部也不甘落后，积极性很高。党外同志也自动参加。康生举例说，有一个党外同志在自己笔记上写道：整风不仅是共产党的事情，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整风，把风整好了，对办事、处事都有好处。

康生在报告中还指出学习中存在的缺点，主要是研究文件还不够深入，质量还不高；学习制度不够周密；有的只读文件不反省自己，有的人只讲反省自己而忽视对文件的钻研；个别机关的行政负责同志，对学习抓得不紧，有的计划订得不具体；个别同志还有轻视整风的现象，有极少数的同志，还有逃避整风的表示。他还提出 12 项改进办法，包括各机关的学习延长两个月，加强中心组的学习、发挥其自学和领导作用，中央直属系统的学习总委员会实行密切分工、加强对各单位的领导、到各机关巡视等等。

随后，李富春作了补充发言，特别强调了加强领导的问题。他说，延长学习时间是为了使运动进行得更好，因此，各学习分会的领导应抓得更紧，人数较多的机关，应有几个脱离生产的同志，专门做学习委员会的工作。有些机关学习小组的成分要调整，一个小组内，大家的程度不能相差太远。5 月 20 日以后的小圆周学习计划一律停止，开始研究个别文件。研究文件的次序和时间分配，总学习委员会即将有统一的规定，交各单位统一采用。各单位应保证充足的学习时间，不能停止或减少工作的单位，应使工作更有计划，更有组织，建立必要的学习制度。

中央党校在前一阶段整风动员的基础上，于 1942 年 5 月 1 日对整风学习计划作了补充规定：要求分三步把所有整风

文件学完，逐件作笔记，深入研讨，并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和工作；第四步进行检查和自我批评，并作出本学期总结。根据党校整风经验，彭真于5月14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指出所谓精神与实质，就是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和贯通文件中的精神和实质的标准就是实践。文章还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了说明。

按照计划，中央党校的学风学习到6月22日完成。6月23日至7月4日举行第一次考试。考试题目是：（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对于过去党内的教育或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在考试之前，教务处布置各支部，每个学员按照季米特洛夫所提出的挑选干部的标准，写成反省笔记，这项笔记也作为这次考核成绩之一。在考试期间，学校谢绝参观，除周日外，停止会客。

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研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什么没有在遵义会议以前提出来？在这个决定发出以前，

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的锻炼？针对这些问题，任弼时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

任弼时在报告中阐述了《决定》的中心思想。他说，《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他认为这个决定的意义首先是总结了党20年来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巩固党的团结。其次是对全党起了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一些像过去那样政治上随便发表意见同党的主张对立的现象，最近是没有看到了。在组织上那些闹独立主义倾向的情形比较少了，能够把局部利益服从于党的整个利益，这表现了党的进步，表现党比过去更加统一巩固一些。第三是对这次整风的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

任弼时在报告中对什么是宗派主义也作了说明。他说：“究竟什么叫宗派主义？替宗派主义下个完满的定义很困难，一般地说，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拿来去服从局部的少数人的利益，这大体上就是一种宗派主义。换句话说，把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只注意个人的和局部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形就可能形成宗派主义或者宗派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在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①他列举了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指出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是中国半封建社会里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同时我们党内对于党员的教育和锻炼不够，也是一个原因。他提出“怎样克

^①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呢？”他认为，从加强党内教育方面来说，除了思想理论教育外，主要的是进行党的组织原则教育和纪律教育。首先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其次摆正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要摆正上下级的关系。他强调指出：“我们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在思想上还要树立一个明确的观念：党的组织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许多闹独立性、闹宗派主义的人对此常常不清楚。”^①

任弼时的报告，对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对澄清整风中暴露出的一些糊涂认识也有很大帮助。

中央党校在整风学习第一阶段初步告一段落时，还组成了参观团，由邓发率领前往军事学院参观，参加各连队讨论会，并进行个别谈话，看笔记，参加该院指导员联席会，交换意见。双方从这种参观学习中互有心得。

194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对各单位互相参观问题、墙报问题、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各部委的巡视问题作了统一规定，并通过了中央学习组成员名单。会议对进一步规范整风运动的展开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统一的整风学习中，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具体的学习计划、学习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是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从整风学习一开始，就体现出它的成果来了。

7月30日，中央直属机关学习总委员会召开会议，总结学风阶段的学习情况，布置下一阶段的党风学习。李富春代

^① 《任弼时选集》，第254页。

表常委会作怎样总结学风学习和开始党风学习的报告。报告指出,中直机关约有 2200 人参加学风学习,学习了三个月,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进行总结的目的:第一,是要看学习中是否真正懂得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是否还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存在。第二,是要看保障学习的组织方式是否适当,是否只重形式而忘记了实际需要。8月1日至8月10日为学风总结的时间。党风学习决定从8月11日起至9月底止,包括学习测验和总结的时间在内。

军事系统的学风学习同样各有特点,色彩斑斓。

1942年4月12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风运动周的指示》。指示指出,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一种改造运动,全军应以极大力量进行,以彻底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恶劣倾向的残余。指示要求进行五项具体工作:(一)召开干部大会,由高级负责同志作专门报告,传达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号召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和指示,并组织全体干部讨论。(二)根据毛泽东和康生的报告及《解放日报》社论和文章中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精神,各部门应分别进行工作检查。(三)支部应扩大民主生活,发动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进行自我检讨和同志间的相互批评,以及对于组织领导上有何意见,均应尽量提供。(四)召集非党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党的意见。(五)在干部中进行整顿三风的测验。指示还指出,在运动周内,学校可酌量停课,机关部门可酌量减少工作时间。为使这一运动能收到良好效果,各级政治机关应定出具体计划与周密布置,并于事先进行深入动员,事后应切实总结。

4月22日,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由

王稼祥、陈云负责。委员会当天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军委直属部门以军事、政治、后勤三个系统分别成立学习分委员会,领导整风学习和检查。

军委直属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 1830 人,编为 193 个小组,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高级干部 79 人,列入甲类。如此众多的人参加整风学习,工作性质(有参谋机关、政治机关、供给机关、军工、医务等不同部门)、斗争经历、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要搞好学习是有相当难度的。对此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学委负责人王稼祥等人想了不少办法,对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对每一个环节都抓得很紧。对高级干部,要求他们在带头认真学习的同时,参加和帮助乙类干部的学习;对丙类干部,采用上课的方式,学习文件减少到 15 个。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经过动员后,学习热潮迅速形成了。据 1942 年 5 月 19 日《解放日报》报道,军委直属系统“各单位均积极的进行学习。此中热烈情绪,在有些部门为从来所未有”。政治部组织学习小组,规定每人在一星期之内必须提出五个问题,然后根据提出的问题分类,进行座谈、讨论和辅导,帮助大家理解 22 个文件的精神实质。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自接到中央整风的指示以后,曾发动全校工作人员研究讨论。为了揭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表现,学校领导人明确制定了进行为期十天的整风检查计划。学校政治部还提出了“四要”的号召:一要认真认识其重要性,指出这是今后工作转变的关键;二要专心一意进行,不可潦草从事,暂时放下其他日常工作;三要正确地进行,正确地认识三风不正之“的”,不要无的放矢;四要找到正确的目标,勇敢放“矢”,把正确和勇敢联系起来。

在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军

委后勤部学习委员会成立，由叶季壮、胡耀邦、邓飞等九人组成。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在后勤部学习委员会之下设供给部、经建部、卫生部、工业局、后勤直属机关等五个学习委员会。学习组分甲、乙、丙三类。在学习步骤上规定：第一步，在5月5日以前，甲、乙两类学习组最低限度必须把整风文件浏览两遍，暂时不开讨论会，也可以不作笔记。

为了配合整风运动的进行，军委直属政治部作出《军委直属队在整风期间党的工作的决定》。军委直属政治部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推动和保证研究整风文件当作中心任务，同时要估计到可能发生的偏向。各级党组织的具体工作是：集中力量完成研究文件的任务，但也要照顾到日常工作；研究文件便是党的工作，防止把研究文件和党的工作对立起来；党的组织应和学习组取得密切联系，一方面防止不过问研究文件的倾向，另一方面防止包办代替学习组的现象；考核各级党的工作成绩时，主要以保证研究文件中所起的作用为断。

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单位的情况，推动学习，中央军委系统学习总委员会派出考察团到各单位考察整风工作。在考察中，发现甲、乙、丙组已读10个文件左右，提出220多个问题。学习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程度低，有的花了三个钟头才读完一篇不到千字的文件，原定时间不够。许多名词、语句、中国和外国常识，特别是《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大多数人读不懂，提出的问题有些机关甚至无人解答，文件至今没有发齐。《解放日报》因为份数少，有许多人感到有时间无文件读之苦。

针对发现的这些问题，军委于5月12日在王家坪召开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讨论如何克服目前学习中存在的一些困难，更好地推动今后的学习，以及研究精读、讨论文件的办法。王

稼祥到会听取了讨论,并作了结论。会议决定,应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教育干部加深对整风运动的认识,对各种干部要有不同的要求。会议还要求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学习时间不够可适当延长。对于学习办法和今后考察团的工作,会议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就在军委直属系统深入研究问题,进一步推进整风运动的同时,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再次发出指示,即《关于整顿三风的补充指示》,号召全军掀起整顿三风和学习的热潮。《补充指示》要求对中央宣传部规定的整风文件,必须精读和深刻讨论,务求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阅读和研究这些文件的时间,规定为三个月,必要时各地区各兵团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酌量延长。中宣部“四三决定”和北方局宣传部关于研究整风文件的通知,一般地也适用于全军,在研究和讨论这些文件时,应执行上述的决定和通知。在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内,干部政治教育和业务学习,以整风文件为中心内容。指示要求在整风运动中不应妨碍工作,不应脱离工作去清谈文件。

在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和军委直属系统的带动下,各部队的整风运动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1942年4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各直属单位领导学习的办法。会议决定:直属队分六个学习单位,各单位指派一个学习委员负责帮助;每星期六召开一次学习大会,各部处长和行政单位首长都必须参加,并有专人负责收集延安各机关的学习方法,在扩大会议上介绍,各单位也要报告学习的经验。会议还决定出版学习生活报;每两周召开一次各单位的学习委员和小组长联系会议;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每个同志的学习情况。

5月底,八路军留守部队学习委员会召开各单位学习小

组长联席会议。萧劲光司令员出席会议。到会者有 300 余人。会议总结了学习情况,指出虽然已经掀起了空前的学习热潮,但这种热潮还不够普遍,对文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其原因在于:(一)对整风的认识不够,没有普遍地深入地了解这是全党在思想上的革命运动。有的人甚至认为主要是“整领导”,和自己关系不大。(二)学习的领导不深入,抓得不紧,没有保证每天四小时的学习时间。领导者没有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三)学习方法不当。(四)没有严格的学习纪律,汇报、检查不深入、不经常。为了克服学习中的缺点,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学习委员会除了执行西北局的指示以外,还决定第一期延长学习 20 天。

针对存在的问题,会议对今后的学习提出了三个要求:首先,把学习运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开展起来,使运动更加全面化、组织化。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干部,深刻了解到这次整风运动不仅是我们党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而且是使我们党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步骤。对留守兵团来说,有伟大的实际意义。整风运动应作为留守兵团的政治整军运动,彻底地转变和创造正规化的工作作风,使留守兵团能走上更高的党军化、正规化的道路。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以行动来表现自己的认识。其次,在 20 天的学习期间,要把对文件的基本认识统一起来,把握反主观主义的中心思想,即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要重新修改笔记。各单位要举行三次讨论会,各组要指定中心发言人。在讨论会上,要提出问题,启发争论,最后应有结论。第三,开始转变自己的工作 and 思想,每个干部要根据文件正确地进行自我批评,清算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任何对自己的姑息、等待都是不对的。在学习期间,各学习分会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同志们的具

体的思想情况。

几天之后，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各机关检查各支部是否对整风学习起到了保证作用。检查结果表明，政治部和供给学校的支部对研究文件的领导和检查做得比较好。这两个支部派得力支部委员参加学习委员会，大部分的小组长兼任了学习小组长，在推动和督促学习上，同行政取得了一致。招待所和通讯连较差，学习完全由行政上负责，支部没有进行领导、督促和检查。大多数支部认为研究整风文件由行政负责，支部便放松了对学习的领导，忽视了支部对行政的配合作用。

军事学院在4月份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并参考延安已经开始检查工作的各机关、学校的经验，进行总检查。院政治部拟出详细的检查提纲分发给各单位。各连队出墙报，大开言路。到8月初，军事学院的学风学习结束，学习委员会将各单位的总结整理就绪，由教育长向全体干部学员作报告。对于学习的收获，学习委员会是这样估计的：全院对于主观主义的危害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运用，已有了初步的了解；两种思想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已逐步展开；个别同志大胆地揭发了自己的错误以后，改变了过去对党不忠实的态度，许多同志已开始改正错误。学习委员会也指出了学习中存在的缺点，如少数同志把自己放在整风运动之外，这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些人是皮毛的反省，敷衍应付；思想斗争开展得不够，自由主义倾向还没有彻底消灭；学习方法上还有缺点等等。

军事学院还把学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归纳为七条：（一）正确的理论有伟大的力量，所以应认真虚心地研究文件；（二）学习好才能领导好，领导者应该先整自己而后才能领导；（三）虚心是工作好的主要条件，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同志都应当虚

心相处；(四) 选拔得力干部组成领导核心，是成功的主要条件；(五) 计划要精细，检查要严密；(六) 干部的模范作用是运动胜利的主要因素；(七) 发扬民主反对自由主义才能开展思想斗争。

军事学院的整风总结在部队院校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别是总结中所指出的某些人的具体缺点，以及对这种缺点的批评帮助，在许多单位也是存在的，其典型意义不可忽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延安整风无论是就集体而言，还是就个人而言，都是受到很大触动的，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说，延安整风无疑收到了应有的成效。

那些身处抗日斗争前沿的部队，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开展了整风学习。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于 1942 年 4 月 25 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全师整风大检查的问题。会议着重指出，整风检查工作是改造我党我师的重要关键，是我师走上正规化、模范党军的必要步骤。所以，全师同志应以坚定的决心战斗的精神来胜利完成党所号召的三风大检查工作。会议确定了三项事宜：(一) 组织工作：成立全师大检查委员会，由邓小平、刘伯承、李达、蔡树藩、黄镇、朱光、张南生等九人组成。以邓小平为主任，朱光为副主任。各旅、各军分区分别组成检查委员会，负责推动、领导、检查工作。(二) 进行计划：5 月 1 日至 7 日为动员传达周，各级政治委员负责传达中央决定，作整风报告，并依照中央宣传部决定的整风学习文件，分别进行上课讨论。5 月为研究讨论月，6 月为检查月，检查各部门的工作，7 月中旬开始进行总结。(三) 检查内容：按照师部颁布的检查大纲并根据各部门的具体情况执行之。各旅、各军分区和师直属机关，定期出版报纸，反映和指导检查工作的

进行。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直属系统党代表大会在6月召开，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心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部队中产生的根源，为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而斗争。在中央的号召下，第一二〇师的全体指战员学习整风文件的浪潮已经普遍展开，整风运动在蓬勃发展着。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1942年6月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军队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后，也开始了整风学习。罗荣桓在领导整风学习中，经常深入了解各单位的学习情况，加以指导。他反复强调要认真学习文件，正确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对于如何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改进学习方法及加强学习的组织领导等，作了一系列指示。总政治部还在1942年9月17日，将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

在此前后，新四军直属队也成立了整风检查总委员会，曾山为主任，彭康为副主任，领导和推动整风学习。在成立大会上，陈毅作了报告，指出党中央整风运动在我党思想上、教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陈毅在报告中提出了研究文件的办法和步骤，详尽地说明了整风检查应针对每个在职干部、党员和非党员自己的思想方法，检查在观察事物、处理问题和执行工作时，对事物、对人、对同志是否犯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毛病，充分发扬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洗刷三风不正的余毒，以整风作为推动工作的武器。

会议决定，目前应进行下列工作：深入研究整风文件，有步骤地进行三风检查工作；各单位和政治部内，成立各级检查委员会，各委员会设整风文件研究指导员；整风要联系直属各

队各部门的工作去进行，以推动和改进工作为整风的主要目的之一；对于整风学习的时间进度，会议规定首先在6月份内读完和深入研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七个文件，其余文件在7月份内继续研究。深刻研究整风文件后，立即开始整风检查，各部门负责同志应以身作则，自我检讨，针对自己思想方法，所领导的工作，对事对人对己充分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以便领导各部门全体同志，开展整风运动，达到推动全体干部进步的目的。军直属队各大单位，立即派出五至七人，组织整风检查委员会分会。每个支部也必须选出三至五人，组织整风检查小组，领导和推动整风文件学习工作。

由于各部队所处的环境不同，又大多是直接作战的单位，因此整风学习的进度、学习方式各有不同。

延安保安司令部学习委员会的整风有自己的突出特点，如特别强调小组长的作用。1942年5月学习委员会召开小组长联席会议，检查第一期的学习情况。这一时期的学习，绝大多数同志学习文件的热情都非常高，能提出各种意见，并在争论中纠正不正确的意见。但是，从整个情况来看，学习还是落后的，有的小组只开过两次会，规定的七个文件只讨论了两个。还有个别同志，借口工作忙而不愿学习。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一是督促检查不够，尤其是各小组长没有很好地负起责任，小组的划分不适当；二是行政上对学习时间的掌握和保证都做得不太好；三是支部没有能够及时地配合。根据这种情况，会议决定精简学习委员会的成员，各委员分别编入小组，加强小组的领导。小组应按具体情况划分，并随时予以合并。行政上坚决保证每天上午12点以前全部为学习时间。党的总支委员会应注意和行政配合，保证取得密切联系。

第二天，延安保安司令部学习委员会又明确规定小组长

的工作职责，要求各小组长应像对自己的行政工作一样担负起责任来。要组织本小组的同志互助，学习得法的帮助学习不得法的，学习办法多的帮助学习办法少的，理解力强的帮助理解力差的。小组长在每星期六把本组学习情况和讨论情况作一书面报告，送交宣传科，还负责收集本组同志提出的大小问题送交宣传科。这使小组长在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重视小组的作用外，延安保安司令部也很重视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讨论。6月份中级组和甲级组干部联合讨论《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发言者均联系个人历史进行反省。讨论中还争论了一些问题，如“站在最前线斗争的，是否全是好干部？”“怎样发现干部的长处和使用干部的长处？”等。这些讨论，对于保安司令部的整风学习起到了深化的作用。

到1942年6月底7月初，许多单位开始总结学习情况，考试测验。绥德驻军第三五九旅供给部举行第一期整风文件学习考试，试题是：主观主义的来源、表现怎样？如何反对？你的反省？根据文化水平的不同，采取笔答和口答两种方式。测验的结果，70分以上的占总人数的80%，有的同志达90分以上，还涌现出一些顽强、刻苦的学习积极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纪念日那天，延安驻军举行整风学习测验和整风学习展览会。展览会上陈列学习笔记、讨论会记录和几十幅讽刺画。讽刺画的内容反映学习文件过程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借以提高对整风学习的重视。

1942年7月2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整风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要意义，同时又强调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整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我们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

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的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和进行。《指示》根据上述要求和部队的特点,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对前方部队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除按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和6月8日指示外,又作出了具体决定。

到7月底,中央军委系统的学风学习基本结束,并作了总结。只有一两个单位尚未作出全部总结。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学校整风第一期学习也结束了。参加学习的干部共653人,内含非党员135人。参加者都有较高的学习热忱。学习制度比较健全,保证了每天四小时的学习,纪律严格,经常汇报检查,态度认真,研究走向深入。在学习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或者个别机关、工作部门都有了深刻的反省,开始了工作转变,提高了干部的党性。发现了一批优秀的干部。

1942年7月,在留守兵团的学风学习大致结束的时候,朱德率领检查组对留守兵团的工作进行了检查。他代表中央军委对检查结果作了结论。他肯定留守兵团在保卫边区、整训部队以及生产建设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对地方政府不注意团结和不够尊重,对军民关系注意不够;有些干部总想扩大队伍,打出去发展,把留守边区看成是暂时的,因此,对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压下,不好好讨论;对生产建设工作不够积极。朱德分析了他们思想上的问题,指出:你们从主观主义出发,等到主观与客观有了矛盾,还硬要按主观行事,这就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在你们身上的表现。做事情要搞出成绩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把握住正确的思想方法,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把一

切杂念去掉,真正为党、为阶级忠实工作。他还批评有的人的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在工作中即使有所成就,那也是阶级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业绩。必须看得起群众的力量,看得起哪怕是最笨的人。世界上的许多大事,常常是那些老实人干出来的;要干成功点事业,也只有老老实实才行。朱德的讲话,是实事求是的,对问题的分析和批评也是一针见血的。这个讲话对于下一阶段的党风学习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事系统整风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其所属机关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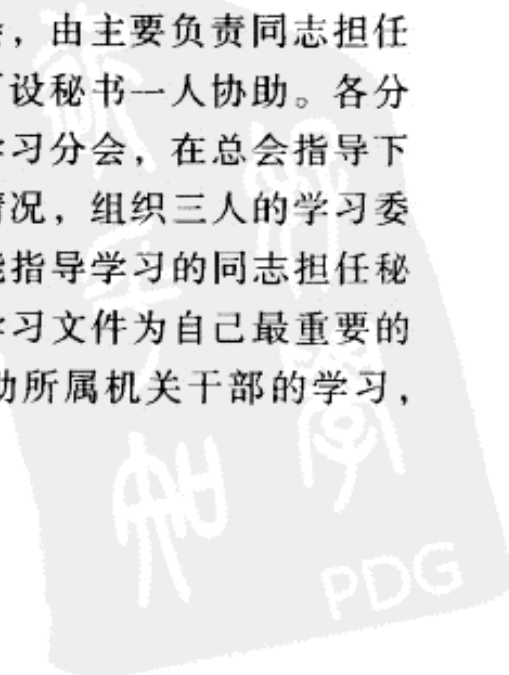
1942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对执行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拟出了具体办法,提交西北局讨论。

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作出《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关于执行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决定的计划》(草案)。会议还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群众团体三个系统,组织三个领导学习的委员会。从4月20日至7月20日三个月内,负责指导所属机关、学校研究中宣部所指定的整风文件,准备将来检查工作。并明确规定,党和群众团体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总负责;政府系统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留守处保安司令部系统由萧劲光总负责。计划草案规定从4月20日至7月20日为研究和讨论中央文件的时期,并对研究和讨论文件的具体办法作了规定。16日,边区学习委员会正式通过这个计划,并付诸实施。

4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的信,指出了整顿三风的重要意义,认为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问

题。这封信还说,延安整风开始时,有个别同志走了弯路,他们不是从整个历史上、思想上、领导上去看问题,只是从今天技术上和事务问题上(如待遇问题、婚姻问题、娱乐问题等)去找“不正确”的三风,而又以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的方式来进行揭发和反对,因此,曾发生过某些有害于整顿三风和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不正确的倾向,并因此掩盖了整顿三风的正确目标。这一倾向在延安已经得到纠正,现在如果影响到了各地,也需要加以切实的纠正。这封信具体部署了总学习委员会制定的学习计划,指出到8月31日前各地要学完整风文件,9月1日以后,各地开始检查工作。

但是,各地党委在接到中宣部“四三决定”和西北局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后,虽然都作了布置,但在计划上、组织上、学习方法上,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为了加强对学习的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5月30日又发出了《关于在各分区及各县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等二十二个文件的指示》。《指示》规定学习时间为六个月,各分区和各县自7月1日开始,各区自7月20日开始。已接到文件并开始研究的可以继续。在此期间,其他学习和一些次要的工作,应该停止或减少。必须保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学文件(每天以九小时计算)。关于学习的领导组织,《指示》规定各分区和县必须由各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学习委员会,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主任,处理学习委员会经常性工作,可设秘书一人协助。各分区可按需要在政府或其他系统成立学习分会,在总会指导下领导该系统学习。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三人的学习委员会,由区委书记担任主任,由一个能指导学习的同志担任秘书,共同负责领导学习,并应以领导学习文件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应经常亲自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



反映意见,表扬模范,纠正偏向,了解干部,具体地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各区县应根据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把干部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学习。《指示》还对划分小组的办法作了具体说明,对学习文件的步骤和时间也作了大致的分配。

在西北局的指示下,所属各单位开始落实整风计划。

西北局直属党委所属各支部首先进行了学习。各支部和行政负责人、学习委员会密切配合,支部的一切活动以学文件为中心,并按学习的步骤,详细定出计划。到5月下旬,西北局学习总委员会召集各学习组长、支部教育干事和文化补习学校教员,进行第一期学习总结汇报。为了更好地解决西北地区历史上存在的问题,西北局组织部组织考察团到安定,调查三个乡的社会状况和乡政府工作,并进行一个乡支部的党员登记。此外还有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等组织的考察团,到绥德、米脂进行社会状况的调查,也搜集到很多材料。这都为西北局的进一步整风作了准备。

今天的延安和全国任何一处正在发展中的城市一样,现代化的宾馆、商厦、宿舍楼随处可见。如果说延安与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有什么显著不同的地方特色的话,恐怕要算当年党中央和革命领袖们留下的革命活动遗址了。在延安,这种遗址比比皆是,多不胜数。

延安是一座古城。蜿蜒的延河水从城中间流过,把延安城一分为二。城的四周是山,也就是“峁”。在黄土构成的山坡上,坐落着一孔孔窑洞。延安城本不大,但在中央红军及党中央落脚到此地以后,延安的人口激增,于是大量的窑洞被开掘出来。那些后来举世闻名的革命遗址,大多属窑洞一族。

同今天现代化的建筑相比,那个时代留下的窑洞,色彩要黯淡得多。但是,作为革命遗址,它们记载了一个时代的辉

煌。延安整风,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插曲,但这个插曲同样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延安很多单位的作息时间是统一的。但在整风期间,窑洞的灯火比平时亮得早,比平时熄得晚。而在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便走出窑洞。清晨便有人迎着朝阳读书,傍晚还有人在山坡上、延河边相互讨论、质疑。后来有些单位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把有的同志读书太晚影响了身体健康作为缺点提出来了。那种学习的气氛,那种不把问题弄清誓不罢休的劲头,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地处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整风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不但因为陕甘宁边区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 3240 多人,占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还多,而且还因为陕甘宁边区在全国所有根据地中是政治意义最大的;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进行得怎样,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整个革命斗争中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1942年4月21日,陕甘宁边区 2000 多名干部在延安参议会大礼堂参加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任弼时向到会的干部作了报告。他具体谈了整风学习的问题,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遵义会议以前,曾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现在它是党内“保存的残余”,哪些部门三风不正,哪些部门的工作就要受损失。我们整顿三风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大的改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使党更加巩固、团结,更有战斗力量,能渡过黑暗,培养出大批坚强的干部,等到政治上光明局面到来时,他们能独挡一面开展工作。他还说,中央规定的 22 个文件,是历史的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要以文件为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本部门的工作。开展批评时,“对己要严,对人要宽”,要全面

看问题,所谓全面,就是对历史上发生的错误“要照顾到时间、地点、条件和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既要看到缺点错误,也要能发现优点。他还说,各部门领导亲自负责,发扬民主,上下结合,从4月20日起至7月20日止学习文件三个月,然后以一个月的时间检查工作。高级组的成员工作经验较多,要求联系个人的历史实际、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下决心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初级组的成员则以分班上课为主。

谢觉哉在大会上也作了发言,说明在学习中一定要有决心,有领导,有民主,并特别表示欢迎非党同志参加学习。

从同一天开始,边区党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学习委员会开始工作。各部门的行政负责人任学习组长,保证每天学习四小时,工作五小时。党的小组长若不是学习组长时,要协助学习组长工作并服从其学习范围的领导。各部门除文化程度最低的以外,都以研究文件为中心。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学习是把全部学风阶段的文件分为两期来学习的。各单位的进度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相仿。

为了了解各单位的学习情况,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决定组织巡视团,由西北局各单位的同志七人组成,分别到各单位巡视,除谈话询问以外,还参加讨论会。巡视团在巡视各单位的学习中,发现总的情况是学习都已开始,学习情绪非常高,非党人士参加得很多。

4月30日,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召开会议,任弼时出席。会上,除了检查各单位的学习情况以外,还决定:(一)正式规定阅读整风文件为业务学习的课程,各级干部必须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学习。(二)高级干部参加中级干部的讨论会,以起指导帮助作用。高级干部组可以在全部学习时间内单独开会四至五次。(三)边区师范等学校的学生和民众剧团

等的一般演员,应以学习文件为补助课程,不必以全部时间学习文件。(四)低级组上课不必讲授全部文件,可选择若干问题讲授。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整风学习是搞得比较好的单位。1942年4月14日,建设厅召集临时会议,讨论中宣部“四三决定”。会议决定最近三个月的中心任务是学习整风文件,在学习中进行个别的自我检查。三个月的学习完毕时,再进行总的检查。会议还决定,每星期一集体办公时,检查各单位的学习进度;每星期各单位集体讨论一次;每一文件要做到熟读深思,做阅读笔记;三个月学习完毕后,举行严格的考试;建设厅和各农校分别进行集体学习,并由各单位领导人负责。

从20日开始,建设厅所属各单位开始学习,每天集体学习时间为两小时,凡有自学能力的干部,一律参加。

建设厅高级组的成员,到5月上旬时有的已将第一期全部文件看了一遍,并且每人都作了四至五个文件的学习札记。所有的成员都是每天早晨学习一小时,下午学习三小时,保证学习四小时。

5月19日,建设厅召开各局科长以上的干部讨论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七个文件。会议开了三天,平均每人发言在三次以上。21日,会议进一步开展讨论,如第一期的七个文件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产生主观主义的根源及其表现方式?怎样克服主观主义?最后会议作出决定:讨论内容由各单位负责人向本单位全体人员传达;由建设厅召集各单位低级组全体人员作反对主观主义报告;各单位相互交流学习心得,要选出最好的和比较好的,进行比较;实行奖惩制度,由各单位推选第一期学习积极、成绩优良者给予奖励。

在陕甘宁边区各系统各单位大规模学习之时,1942年

5月18日，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举行会议。任弼时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各单位的学习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作出规定：（一）第一期学习计划，一般应在5月20日以前完成，至迟不得超过5月25日。第二期应在6月20日结束。（二）出版学习导报。（三）近期举行各学习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总结第一期的学习。（四）第二期的文件分为四类依次学习。（五）各机关要切实执行上午学习，不办公、不会客的规定（工作性质特殊的机关和紧急工作例外）。（六）各单位的负责人和学习委员会应积极负责领导文件的学习，并经常和上级学习委员会取得联系。（七）各分区、各县的学习自6月1日开始。区级干部暂不进行整风学习。

在边区学习总委员会的指导下，各单位各系统的学习不断深入。民政厅的学习是很有成效的。但是，民政厅的学习也有一些缺点，如对文件的精神实质领会不够，钻研不深，有咬文嚼字的现象，笔记上反省自己少，个别同志借故逃避学习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民政厅提出改进方法：一是行政负责人应成为学习的模范，学习小组长应成为学习的核心，抓紧并推动大家的学习。二是严格执行学习制度，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作风。三是小组讨论要有中心发言人，每人反省要彻底，反对“一团和气，互不侵犯”的坏习气。会后要检查会议进行的情况。四是要纠正冗长的笔记，笔记内容应是心得和反省，要提倡传阅笔记，修改笔记。

陕甘宁边区政法系统的学习也很有声色。

1942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会议作出规定：在第一期的学习中，将文件分成三类进行学习研究。学习时间为每天四小时。笔记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本文件的中心思想；个人的心得；理论根据；和实际工作的联系；

对本文的意见和批评；提出问题；讨论后的感想。会议还决定5月1日以前出版学习方法专刊的墙报，每20天测验一次。在讨论中宣部“四三决定”时规定了这样几个中心问题：（一）中央决定和毛泽东的报告，为什么要全党并欢迎党外人士来共同讨论？（二）党过去提出两条战线斗争，为什么现在提出整顿三风？（三）所谓“掌握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报告的精神和实质”，究竟什么是精神和实质？

5月初，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改进学习方法。为了推动学习，决定出版墙报《学习》，第一期内容是学习方法专刊。

5月中旬，第一期学习结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举行总讨论会，中心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争论得很热烈。学习委员会认为第一期学习是紧张而认真的。但是，还存在着缺点，如对文件的学习，深思熟虑不够，未能融汇贯通，表现在有些同志不能提出问题，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又不能理解；缺乏分析综合的功夫，笔记只是摘出中心思想，对文件的总的精神加以发挥的较少；存在某些断章取义的情形；讨论前准备得不充分，以至讨论不深入，质疑少，争论多，像研究会读论文一样。针对这些缺点，学习委员会指出，今后讨论会应在学习时间内进行；给墙报写稿应当作整个学习过程的一个步骤；学习是长期的，应当坚持，防止松懈现象。委员会决定从5月15日至6月10日为第二期学习的时间，具体安排是：把各种文件分22天学完，最后用两天复习，两天总结。

到7月中下旬，高等法院开始进行整风学习的集体测验。测验的题目是：“高等法院的工作有无主观主义？有或无的表现在哪里？”测验是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的。测验的结论是：高等法院工作在总的方针上没有主观主义的倾向，正确

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司法政策。边区司法是保护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在诉讼上是便利人民的，废除了官僚主义手续，重证据不重口供，对犯人执行宽大政策并采取教育主义。此外又采取了人民仲裁制，使人民自己过问司法。所以高等法院的司法工作是在正确的政策下，依据边区的历史环境和目前的实际情况及人民的要求具体运用的。在正确的运用中，建立了许多制度，如批答、上诉、汇报、学习、劳动生产等，使边区司法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这可以说明，如果不把握新民主主义的司法政策，或者主观主义地不估计边区的实际情况，那么，过去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初具规模的司法工作现状。高等法院工作在个别部门中，也有着主观主义的作风，如在审判工作中对某些案件的处置怀着某种程度的成见，这虽然也有历史习惯的因素，但不能依据具体情况而从极公允的立场出发，由此也说明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的成见和或多或少的感情成分。又如在司法教育中，根据总的司法政策订出的方针是对的，但在工作进行中却也存在着主观主义的作风，不论干部教育或犯人教育，都有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个别同志因受教条主义的毒害，在工作上有主观主义的表现，如在生产工作中，只知道有数目字的积累，而不顾及院部的实际需要和便利。

从高等法院测验答案来看，确实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法院的工作，不夸大成绩，不掩饰缺点，表明学风学习真正有了收获。

延安的几所院校和研究机关也深入开展了整风运动。

延安大学于1942年4月8日成立了整风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决定从4月20日至6月30日为研究中央宣传部指定的学习文件的时期，并拟定了进行研究的具体计划，确定了

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的负责人。4月21日,延安大学召开全校整风动员大会。校内的非党员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参加了研究文件。全校有52个学习小组,参加者共364人。各学习分会认真负责,定期向学习委员会汇报,按期检查各组组员的笔记,纠正偏向,提供意见,组织班和班之间交流学习经验,收集有争论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参加小组会,帮助组员解决困难,保证了学习计划的执行,起到了帮助各小组学习的作用。这一时期学习上的优点是对文件重视,切实埋头研究,学习热忱高,能积极提出问题。出现的偏向是个别同志为看文件而看文件,抠名词,在词句上打圈子,记笔记不能把握中心,只钻研抽象的概念等等。7月,延安大学总支委员会号召全校党员配合学习整风文件进行自我反省,并向各支部提出自我反省的参考意见:各支部负责人除自己进行彻底反省以外,还要经常检查全支部同志反省的成效和偏向;各小组长应有计划地组织互阅反省笔记;全体党员应以最大决心去掉爱面子思想,自觉地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思想和工作;各支部利用假期收集《解放日报》和本校《正风》的有关反省文章和具体事实,分组研究反省的方法和要点;相处较久的彼此了解的同志,建立“相互反省”制度;自我反省中的模范例子或发生偏向者,支部应分别予以评价和纠正。这些措施都得到了落实。

民族学院在1942年4月初就进行了工作总检查,目的是为了今后把学校办好,以符合中央关于干部学校决定的原则,符合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方针。学校还出版了不定期墙报,以反映整顿三风的实际情况,帮助检查工作的深入。到5月底,民族学院第一期文件学习结束。院学习委员会对学习情况进行了检查和总复习。6月2日,学习委员会召开学习方法座谈会,交流阅读文件和作笔记的方法。大家认为,从总的

情况来看,有学习热情,有深入研究的精神,但没有造成普遍的学习热潮,主要原因是由于彼此交换意见和互相监督、检查、帮助不够。为了克服这种缺点,保证每天学习两小时,学习委员会决定实行集体学习制度,以小组为单位,规定每天上午用三个小时阅读文件,一个小时交换意见。

行政学院在1942年4月初曾进行工作大检查,“四三决定”公布后,发现有很多做法与“四三决定”不符,因此停止了大检查。学院决定今后将根据中央的精神,首先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实质,两个月内把指定的文件研究完毕,在工作人员中分组讨论得出结论,再分别向同学传达。待文件研究清楚以后,再进行工作检查。4月13日,学院召开工作人员大会,讨论干部学习问题。学院分会还根据总学习委员会的指示,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订出了学习的计划和方法。决定:(一)每人对每个文件至少要精读两遍,记笔记和心得,每天由学习组长随时检查。(二)每星期开讨论会一次,而且要真正检查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的精神和实质融汇贯通。(三)把不必要和可能减少的工作减少下来,每人每天学习二至四小时。到5月下旬,行政学院工作人员第一期文件学习已经结束,这期间开过三次讨论会。在讨论中,每个人都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发言,还提出不少问题,如“非党干部是否有党性?”“民主与领导的关系”,“如何在长期过程中,改变我们的思想及工作作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学习分会负责人的解答,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了初步的理解。6月中旬,学习委员会再次作出决定,改进学习方法,规定学习委员会中指定三人在每个文件未传达讨论之前,先写出“讨论中心”和“传达办法”,同时注意各班级和工作人员中的偏向,随时纠正和帮助等等。第二期学习开始以后,讨论会、漫谈会都比过去进步得

多。讨论会上不再是小组长先提问题,而是组员提出问题,争论也多,会开得比较活跃。漫谈会上都自然地联系实际,反省自己,文化程度低的同志有一些不懂的问题,也得到了解答。

自然科学学院是延安时期少有的以自然科学为学习、研究对象的机构。在整风学习期间,自然科学学院也不甘人后。还在1942年5月中旬,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和大学部的学生就已学完了《反对自由主义》等五个文件。在研究和讨论中,大家联系自然科学上的问题,如学习自然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表现在哪里?自然科学和实际怎样联系等等。在短短的学习过程中,已有许多同志在政治上、学习上和工作上表现得比过去积极,学得的东西也在逐步实行中。在学习中,各班都贴出了墙报,还有全院性的《学风》和《三风》报。这些墙报在整风学习中起了很大作用。6月19日,自然科学学院总结第一期整风学习,指出过去学习中存在着组织不够紧凑,领导上不够灵活等缺点,为此特规定学习委员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和组织壁报,解答问题,组织、计划和检查学习。要尽量做到组织精干,工作正规。

为了进一步促进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还作出了关于单位互相参观的决定。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参观团互相观摩。

行政学院正式组织了学工人员参观团,前往西北局党校参观,听取西北局党校关于学习情况和学习经验的介绍,分组参加了党校的会议和各班的讨论会,看材料、记录、笔记等。大家一致认为,通过互相参观,收获不少,取得很多经验。回校后要把参观得到的材料加以整理,向全校人员传达,借以推进本单位的学习。

边区青年救国会组织参观团,参观了总工会、边区妇联等

单位的学习。参观团分为谈话、看笔记、看墙报三个小组，分工负责收集材料，并参加讨论会，同学习委员会座谈，进行小组访问等，互相交换意见。大家认为工会和妇联在研究讨论文件时，自我反省很好，有中心，能经常交换意见，经常检查，不断改进，中心小组对机关学习领导得也比较好。

在整风学习中，低级组的同志虽然文化低，但学习热情很高，领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他们学习，使低级组的同志也得到很大提高。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低级组就办得很活跃。边区政府专为他们开办了讲习班。讲习班第一期学习从4月28日开始，共学习了36天。秘书处、生产委员会、交际处、民政厅及其所属的通讯站、公益栈、政权研究班、保健药社等单位的干部50多人参加了学习。讲习班每星期二、四晚上讲课一次，讨论一次，教员主要负责在课堂上学习指导，另由学习委员会指定中级组一位同志负责检查督促和处理技术上的一些问题。第一期的学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最显著的有两点：

一是学习态度转变了。在学习大会上，曾有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觉得参加低级组的大多是土地革命或长征的老干部，只是文化程度低。平常他们就不爱学习，要是用“低级组”这个名词，恐怕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学习更不会起劲。但是，一个多月的学习，情况却不是那样。一位曾做过县苏维埃主席和边区县长的同志在讨论会上兴奋地说：“从前，我不肯学习，我想：土地革命是我们工农分子搞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归我们领导，要写个什么，找个知识分子当秘书就行啦。现在文件一学，才知道过去是‘老公鸡带串铃，装大牲口’。文化低，没理论，只有狭隘的经验，在原脚地上转圈子，不能开步往前走，要开展工作和提高工作质量就没办法，就是有一肚子经

验,也说不漂亮,写不漂亮,还是空事。这次在延安赶上整风,能学习、能听课,真美。”^①还有些人以前认为学文化、学理论必须住学校,获得实际经验必须下乡,因而不安心工作,不肯在工作中学习。现在慢慢转变了,成为学习上的积极分子。

二是对于实际问题能用理论来说明了。在讨论会上,他们参照教员所讲的内容,联系所经历过的事实,谈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有的说:“从前稀里糊涂,不知道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才知道是犯了主观主义。”“原来是没有调查研究瞎冲冲,失败啦!”还有人说:“1935年东征以后,党提出争取××军的口号,我们很奇怪,人家武装那样好,还争取得来?他们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争取他们干啥?现在才知道,争取××军做统一战线的桥梁。那时就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因为没有研究××军的情况,就分析不出正确的结论,对执行决议,也没信心,也很勉强。”^②

陕甘宁边区系统第一期学习,到6月初已大致结束。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对这一期学习成绩的估计是:

全党这样热烈的研究文件是空前的。行政上这样认真的领导学习文件也是空前的。学习的效果已经看到一些,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已经开始有些转变。比如有些同志在学习了这些文件以后,处理问题更慎重更仔细了,有的同志以前不愿到下层工作,现在自动要求下乡了,有的同志以前把自己变成空头的“最有学问的理论家”,轻视实际工作,现在觉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无用,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181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181页。

立志为实际工作而学习了。

在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咬文嚼字者多，能发挥文件中思想者少。相当普遍的偏向是忘记了反省自己。有的专讲文件而不反省，或反省人家不反省自己，反省自己也只是约略涉及。但是，也有人只顾反省，不顾学习文件的，结果是反省和文件之间形成生硬的加法关系。还有少数人轻视文件，觉得文件上说的没有什么，我都知道了。或者逃避整风，掩饰自己的错误，但这是少数人的表现，多数人是积极学习的。笔记方面的缺点是有的失之过长，引申枝节，以至无所不包到处可用。领导方面的缺点是还有少数学习委员会和行政负责人没有起应有的作用，还没有把领导整风学习作为中心的工作任务之一。

边区总学委根据这种状况，于1942年6月2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各学习单位的学习委员和学习小组长联席会议，由高岗代表边区总学委对今后的学习提出了以下一些改进办法：（一）决定延长学习时间两个月，因为这是以无产阶级意识克服资产阶级意识的革命斗争；（二）学习委员、小组长要积极领导、起模范作用，行政负责人尤其要反省和自我批评；（三）错误的意见可以发表，但是要组织正确的批评；（四）开讨论会事先要漫谈，讨论会上要有中心发言人，学习领导者的主要任务是启发别人发言，使讨论能抓住中心，结论要避免过长，应该是解决几个争论问题；（五）作笔记应该经过摘要、感想、反省和讨论后的综合补充等过程，笔记应该经常检查和传阅；（六）要召开小组长联席会议，以交流经验，检查进度，解答问题，推动学习，遇有重大争论问题和总结学习时，也应该召集较大的座谈会；（七）各单位可以组织参观团，彼此参观，以

资互相借鉴。

贺龙在这个会议上也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安心学习，切实学习，因为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思想斗争。他举出历史上不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危害的实例。他还着重说明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克服本位主义，服从党的集中领导，拥护党的领袖毛泽东。

在边区总学委的领导下，第二期的学习进展比较顺利，各单位、各小组在学习的领导方法上比第一期更有经验，也更为深入。

1942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就边区系统各单位的整风学习问题作出决定，变更了边区级的学习计划，第二期学习延至9月15日。原规定第一期学习的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反对主观主义部分、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与斯大林论民主与纪律这三个文件列入第二期学习；为了学习领导上的集中和便利，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办事处并入西北局宣传部，今后边区各机关的整风学习统归西北局宣传部管理，西北局各部抽人脱离行政工作，参加学习委员会的工作。各机关停止工作三至五天总结三个月来的学习。至此，陕甘宁边区的学风阶段的整风学习大体告一段落。

从整体情况来看，在学风学习阶段，延安各系统各部门进行得有声有色。其特点是：第一，各根据地由于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交通不便，通讯联络条件落后，因而整风学习开展的时间不一，而延安由于处在党中央所在地，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障碍，能最先领受到中央精神，因而整风学习在时间上开展得比较早。同样由于这个便利条件，带来了延安的整风有第二个特点，即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比如，在

上述各单位整风中，有的单位发现整风学习的步调与上级精神不完全相符，便立即停止原有的做法，加以改进。而中央对延安的学习也很关注，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以指导全党的整风。毛泽东在给其他根据地负责人的电报中就曾提到过延安整风的情况，借以互通情况并督促各地领导机关注意整风。由于上两点因素又导致了第三个特点，即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学习比较规范。一般都能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组织上成立不同层次的学习委员会，由各级主要行政负责人担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根据干部的职务、文化程度和革命斗争经验分成不同学习小组，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学习。在学习方法上，除了通常的读文件、作笔记、出墙报、讨论、考试测验外，各单位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有的是先通读文件再进行研究，有的是把文件分类，边读边研究；有的讨论会是大家提出问题，汇总到学习委员会后，再由负责人解答问题，而有的是先由学习委员会提出问题，大家再讨论等等。第四个特点，就是中央的精神落实得比较好，不搞形式，不走过场，实事求是，学得好就按期结束，学的效果不如他人，就再延期学习。学习形不成热潮就想尽各种办法，使整风学习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如果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其整风受到中央的直接关注从而成为典范的话，那么，那些远离中央所在地，处在敌人炮火底下的各敌后根据地，在艰苦而频繁的战斗间隙中所进行的整风运动，更令世人为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自我剖析的精神而感慨不已。

但是，在战火中的学习毕竟不同于相对平稳的延安及其附近地区，所以除西北局直属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外，有许多地区的学风学习推延到1943年才结束。

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42年5月1日发出《关于研究讨论整风文件的通知》。《通知》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号召所属各地区、各机关、各部门开展整风学习。但文件又根据华北各根据地的实际战斗情况,指出华北敌后处在战争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因此,阅读和讨论中央整风文件的时间,应比延安长一些。要求各级党委在整风中,不要脱离实际工作去清谈整风和空喊整风。

在此之前,194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已经借第六期学员开学之际,对过去的学风作了深刻的检查,发现过去在课堂讲授中多采用注入方式,缺乏和实际的联系;没有充分发挥研究精神,善于提出问题、发掘问题的风气不够。过去几期学员多是来自各方面的有经验的新老干部,但是在学习期间没有很好地组织交流经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北方局党校决心从第六期开始,按照中央的指示,彻底地加以改革,力求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及敌后斗争的问题切实联系起来,克服狭隘的经验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空谈主义。要求培养干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了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了解党的基本政策和具体的斗争策略,确实能独立地去组织工作,领导工作,能在各个不同的具体斗争环境中,去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应该注意到,北方局从一开始对整风就持有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这在战争决定生存的敌后环境中是不可缺少的态度。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延安转入整顿党风阶段后,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才开始整风动员。

在太岳区,自1942年春就开始进行整风思想动员和一般的学习文件,只是这个阶段很长,直到第二年的4月才结束。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了那些频繁而残酷的战斗——如果没有那

些战斗,这个思想动员阶段完全可以像延安一样,几个月即结束。

1942年4月27日,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根据毛泽东整风报告的精神,结合太岳区党的建设的实际,在《太岳日报》发表《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列举太岳区党内存在的三风不正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批评某些干部的糊涂认识,要求对整风的文件,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与检查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真正把整风文件作为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武器。接着,中共太岳区党委于4月30日在太岳日报发表《整顿三风征询各界意见启事》,欢迎各党各派及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存在的缺点,毫无保留地提出建议与批评。在此之前,太岳区工、农、青、妇各救总会以及太岳日报社、新华社太岳分社,都纷纷决定开展三风大检查。4月24日,太岳行署向各级政府发出《关于整顿政风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成立检查委员会或检查小组,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政风不正的事实,通过整顿政风,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

5月4日,太岳军政委员会书记薄一波在太岳区3000多人参加的纪念“红五月”的集会上,作了如何整顿三风的报告,要求各单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开展整风学习,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立即掀起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整风运动的热潮。接着,成立了由薄一波为主任的整风总学习委员会。7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制定了整风计划。从8月开始,全区各级党政军民干部,按照职务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分别编为高级、中级、初级三种学习组,开始学习22个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初步认识整风的目的、内容和意义,有的也初步联系实际,检查了思想和作风。

在这一阶段,由于日军的连续“扫荡”和阎锡山部第六十

一军的屡屡进犯,根据地军民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投入反“扫荡”作战和反顽斗争中去,所以太岳区各级党政部门对整风文件的学习是时断时续的。

晋冀鲁豫边区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积极行动起来,华北新华社及新华日报社利用反“扫荡”的间隙,阅读文件,检查新闻报道中党八股的种种表现,提出了具体改进的措施。但从整风的范围来讲,整风初期主要停滞于少数领导机关中,还没有从上到下全面铺开。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1942年4月初召集所属各机关的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整顿三风,首先要造成一个热烈的运动,并进行由上而下、由全体到个人的大检查。4月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根据整风的精神,特别提出整顿政风的问题。为了整顿政风,急需进行一次工作检查。检查要由上而下地进行,首先从边区一级开始。检查要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并把握住中心,点滴深入,避免大而不当的现象。在进行检查时,应防止各种可能发生的倾向,如对人、对事的义气之争,不提出具体的办法,形成极端的指责,使干部发生恐慌或麻痹的现象。会议决定在4月18日以前向边区政府所属各单位传达这次会议的内容和整顿三风问题。22日开始边区政府一级的总检查。对专署各县的检查,由边区政府组织检查团,分赴各地,按照所定办法进行检查。在检查专署时,除按照机关检查大纲执行外,更要注意专署如何领导县,并把检查工作同帮助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关于检查县的方法,由检查团到专署后具体规定。到群众中去检查时,主要检查政府法令的实施,以土地法、负担为中心。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大检查是根据整顿三风精神进行

的,但从形成整风学习的高潮来看,还要等到1943年。

冀鲁豫区党委在接到上级党组织关于整风的指示后,要求区党组织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并结合文件来反省和改造自己的工作、思想,检查、纠正各个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1942年八九月间,区党委决定县级以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均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区党委成立高级整风学习组,各地委成立中级组,各县委成立初级组。各级党委会委员及相当级别的军、政、民干部编为一组。人数多者,按部门划分成若干小组。边区各级党的宣传部直接掌管与领导该区党员、干部的学习和制定统一计划。区党委还陆续印制部分整风文件,发到党政军民各级机关、党校和部分团体,组织学习。

为了加强对整风学习的指导,区党委宣传部还发出了《关于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指示》,规定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必须研究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时间定为五个半月。《指示》还把文件归为学风、党风、文风三类,要求逐件讨论,深刻领会文件精神实质,反省自己在工作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发扬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整顿三风,团结干部,改进工作。在学习方法上,《指示》要求以个人阅读、集体研究为主,需作详细札记,讨论中要做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

但是,由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边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加上空前的自然灾害,边区局势极端恶化,使整风运动难以像延安那样正常进行。因此,整风学习虽没有停止,但一般限于阅读文件,范围也限于一般干部内,深刻的反省和高级干部的整风并没有展开。

在晋西区,区党委在1942年4月初设立了各级调查研究机构。晋西区党委仔细研究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认为晋西北党内的主观主义和

形式主义是严重存在着的。晋西区党委根据这种状况，确定了调查研究的组织问题、分工问题、基本环节问题等具体办法。在组织上，区党委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除专任干部外，还请在职高级干部 50 多人兼任调查研究员，分配任务和参加适当的会议。各地委设调查研究所，县设调查研究员，由地委、县委书记直接管理，下面设调查研究网、行署和晋西北抗联各设调查研究室。中心区抗联和专署各设科，县抗联和县政府各设调查员。区党委还规定：阶级关系的变迁，政策的执行，反映各阶层的政治动向等问题，是党组织调查研究的主要方面。政权建设，三三制的执行，财政经济建设和敌伪政府等问题，是政府调查研究的主要方面。群众运动、群众武装建设等问题的调查研究，由群众团体负责。文教建设的调查研究工作，由文联和政府教育处负责。晋西区党委还特别指出，以后检查工作，检查党员的党性，把他是否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是否了解自己工作周围的具体情况，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向上级的报告，也要有十分之九的具体材料，十分之一的总结意见。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必须掌握阶级观点，用“群众反映”概括一切对政策的考验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材料都要从抗战前搜集起，从抗战前后，事变前后，一点一滴，一片一段，一个村庄一个问题地搜集到现在，比较研究，弄清问题，得出结论。另外，还要从研究典型入手。

在晋西区党委的领导下，整风学习开始了。

1942 年 6 月 5 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确定了有关整风事宜。晋西区党委宣传部根据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和 4 月 16 日通知，决定从 6 月起，根据晋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全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民能够看文件的各类干部（区级能看懂文件者亦可参加），首先研究整风文件，求得充

分掌握其精神,领会其实质,以提高干部党员的思想,转变工作作风。对于研究文件的步骤,区党委宣传部也作了规定。

晋西北区的学习情景是极其动人的。在敌人炮火击毁的断垣残壁间,张贴着学习壁报征稿启示和种种标语。山脚边,树荫下,水湾旁,小河畔,到处都是干部学习的踪影。大家日常见面时的寒暄,为一句话所代替:文件学得怎样了?战斗、工作间的闲暇时间,都用来讨论问题、交流学习方法和交换材料。从延安传来的一切有关整风的消息,都受到大家的欢迎,都争先阅读,并把《解放日报》和《抗战日报》所刊载的文章,剪贴下来随身携带,随时阅读。在敌后工作的同志,也把整风文件视为至宝。晋西北区的学习又是普通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能见到这种情景,所以,它只是当时整风学习的一个缩影。

五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名刹所在地。历史悠久的寺庙群在战争的硝烟下失去了往昔的神秘与尊严。昔日兴盛的香火显然冷淡下来,伴随着青灯古钟的诵经声也时断时续。

但是,另一种信仰,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却在民族危亡之际,如同一面旗帜,在崇山峻岭中升腾起来。这当然是党内思想的启蒙。

晋察冀北岳区(五台山)党委,从1942年4月开始整顿三风的学习。4月18日,北岳区党委针对本地工作中的缺点,作了专门的讨论、检查和指示。区党委指出,当地的学风、党风、文风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都还有不正确的部分。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不重视研究具体情况,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同的地区订出同样的工作计划,采取同样的工作方式。对群众、党员和干部,根据同样尺度,提出同样要求。对上级党委的文件,到处生吞活剥地照抄一遍。在学习上也是一样的生吞活剥,

好高骛远,只是津津于搬弄名词术语,而对于文化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学习则不感兴趣。在宗派主义方面则表现为对“三三制”的认识不足和执行不力,政权工作中的党政不分,和群众团体中的党化作风。党内某些部门闹独立性、特殊性,工作中互争领导权,对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看不起。某些干部之间互抱成见,闹无原则纠纷等。党八股的作风,在宣传工作上也相当浓厚,许多支部小报不看,只顾学大报的一套,满纸长篇大论,社论有2000字以上的,三四十字的长句,加上欧化的语法,使支部的同志望而生畏。新闻照抄会议记录,通讯则老是抽象公式,这一切都是文风不正的表现。

为了扫除上述学风、党风、文风上的垃圾,区党委决定:在反对敌人“扫荡”的斗争中,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进行改造学习和检查工作,准备在5月5日学习节举行干部测验和召开整顿三风大会,使全区干部了解整顿三风的意义和途径。区党委还规定,支部小报由各地委宣传部负责编辑,每期不得超过2500字。其内容应该是阐明党的建设、党的政策和党性锻炼的根本问题,并联系当地实际情况,介绍支部工作经验。区党委还强调了整顿三风中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因反对主观主义而走向客观主义,因反对宗派主义而走向麻木不仁,因反对党八股而走向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

北岳区的整风学习在硝烟中展开了。

6月初,北岳区各群众团体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工、农、妇、青、文、学联、抗援会各团体的同志。与会者本着负责任的精神,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各团体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会议还对整风的具体办法和整顿的主要内容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如提出行政上应加强对学习文件的统一领导,有计划地研究整风文件,有计划地作笔记,发扬自

我批评精神，必要时进行各团体联合检查和总的大检查等。

7月18日，晋察冀北岳区学习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次大会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政府、团体各方均派代表参加。在会上，北岳区共产党代表刘澜涛发言说：学习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也就是全北岳区的党政民的学习动员大会，自去年以来，我们在学习战线上正和根据地其他建设一样，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在政策掌握上，有显著进步。不过，以往学习多是分散的，力量不集中，步调不一致。今天学习委员会的成立，可使全边区党政民干部，在总的领导下，团结统一地进行学习。他还强调，我们的学习是自觉自愿的组合，凡有利于抗战建国的学术思想，均可研究，每个抗日战线上的同志，都可自由选择学习课程。我党整风文件，共产党员是要集中精力深刻研究的，也欢迎友党和非党同志加以研究。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学习条例和半年的学习计划，并选出刘澜涛等七人为学习委员会的成员。

晋察冀边区的其他地方也如北岳区一样，踏踏实实地开展了整风学习。

晋察冀边区政府从1942年5月起，一方面编印整风学习文件，一方面进行个人的大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准备对整个工作进行严格检查。

在晋察冀边区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各专区成立了学习分会，一些县如易县、满城、徐水、涞源等都相继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第三分会自7月份成立以后，制定了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中心的计划，建立了学习制度，检讨了过去学习中的缺点，决心认真执行学习委员会总会的指示，加强对学习的检查，切实了解学习制度，及时纠正学习中的一切偏向，彻底肃清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同时还决定在半年中不仅以学

习整风文件为重心，还要求每个干部在精读每份文件的过程中，根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认真地、深入地检查、反省、改造工作和自己。在研究每份文件后，每个人应有显著的新的转变。

华中局在整风运动开展后，于1942年5月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华中军分会也发出《关于各战略单位整风的通知》，要求全体干部认真阅读中央所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并进行认真的工作检查。华中局根据过去存在的“上风不正整下风，大风不整整小风”等轻重倒置现象，决定整顿各级整风学习领导机构，各战略单位成立学习委员会，以区党委书记为负责人，分区成立学习分会，以地委书记为负责人，负责整风学习的计划、组织、督促、检查与总结。整风的重点放在区党委、地委和师、旅、军区一级。甲组着重整风学习，乙组着重党风学习，丙组着重业务学习。

山东分局在接到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后，也开始了整风学习。1942年5月8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决定》规定学习讨论中央宣传部指定的22个文件及华北、华中根据地领导人有关整风的报告。《决定》还要求精读细嚼文件，把握其精神；检查工作要上层领导与下层民主同时并重，不仅要检查工作效率，而且要检查思想方法、领导方式、工作态度、工作关系；鉴定党员要以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为主。7月1日，山东分局又发出了有关整风的补充指示，要求山东各级党组织以最高的热情和最严肃的态度普遍开展整风运动，并指示各级党组织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把整风运动作为转变全盘工作的关键。决定改组县委以上党政群团领导机关的学习委员会，由各单位领导者及干部教育负责人共同组成学习委员会，党委负责人兼任主任。

7月中旬,山东分局中心学习组成立。参加中心学习组的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干部40多人。从华中局返延安的刘少奇,途经山东,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暂留山东,帮助解决山东分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中心学习组成立会上,刘少奇作了讲话,说读书看文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方法,能使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理论。但只是学习方法之一,而不是其全部;只是必要的学习方法,而不是主要的学习方法。主要的是什么?是参加实际斗争。因为知识或理论是从实际斗争即从社会生产中和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刘少奇强调,我们做工作,解决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周密地调查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还要精细地研究调查材料,正确地把握它的规律,然后根据它的规律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作出来的决议和指示,才是正确的,工作也才会做好。这才是行动上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口头上的唯物主义者。有些同志天天喊调查研究,要求下面做,可是自己作决议发指示的时候,却忘了这一条,不去调查下面的情况,只管在屋子里发号施令,这也就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于工作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克服。他还指出,经验是实际的,有用的,但这是根据一定条件来说的。实际经验必须与理论相结合,提到理论阶段,才是可靠的知识。同时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而且是片面的、局部的,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否则就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把狭隘的经验当作知识的全部,把它死硬化、公式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主义,对于工作同样是有危害的。工农分子的干部容易犯这种毛病,所以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刘少奇的讲话对于指导山东分局的整风学习有很大帮助。随后,从1942年7月16日起至9月16日,山东分局中心学习组以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整风学习。

在此期间,山东各地的整风学习也相继开始。鲁中区、鲁南区、冀鲁边区、清河区均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胶东区党委成立了整风工作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主任曾于1942年7月在《大众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将整风工作同胶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山东分局的整风学习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1940年以来,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巩固战略后方,加强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山东,仅仅1941年一年,就进行了29次大规模“扫荡”。与此同时,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主要领导人,在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他们先后向中央反映问题,申述各自的理由。由于这些复杂的原因,山东各地党组织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恢复、发展根据地,但到1942年春,根据地仍处在艰难发展中。在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刘少奇帮助解决了山东存在的主要问题,形成了统一的山东党的领导集体。山东分局总结了山东抗战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检查了领导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对于推动山东全体党员改造思想和改进作风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整风学习是在山东根据地严重困难时进行的,而整风计划又没有考虑到敌后环境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致使计划不完全适应战时的实际情况,各地区没有按计划完成任务。在整风学习中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密切,对党员的思想改造不重视等问题。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开展起来的。

南方局与延安相隔千山万水,但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南方局的动向,他经常给周恩来发电报,在电文中不时谈到延安整风的情况。比如,在1942年6月13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

中说：“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成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①6月26日，再次致电周恩来，盛赞延安学习22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并告知他延安有1万名干部参加学习。因此，虽然南方局与党中央在地理上相隔甚远，但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信息，整个学习运动开展得比较扎实。

在中宣部1942年6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的指示后，南方局迅速召集会议，研究部署整风学习事宜，成立了由周恩来、董必武等20余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南方局机关、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社的人员，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别划分为几个小组学习整风文件。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分批调回南方局进行整风学习。其他同志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组织学习。

在做好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基础上，学习委员会引导大家由浅入深地学习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这些文件除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刊登一部分外，还把全部文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大家，作为必读材料。同时，学委会还拟订了一些专题，由领导干部和有专门知识的同志向大家作学习报告。

南方局整顿学风阶段是从1942年秋开始的，到1943年1月中旬结束。这一阶段在集中学习了文件之后，着重讨论和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分析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检查主观主义的作风。周恩来还就学风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给全体同志作报告。学风学习结束时，董必武作学风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7页。

结,周恩来报告学风学习提纲。

从各地的整风学习情况来看,在学风学习阶段,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级指示后都能迅速行动起来。其共同的特点,一是各地党组织都很重视,按照中央指示,从上到下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各级领导人都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加强了对本地整风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二是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制订了大致符合本地具体情况的学习计划,没有照抄照搬延安的经验。三是在整风学习中能够联系实际,解决本地最重要的问题。如山东,在第一期学习中,在刘少奇的帮助下解决了山东当时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四是勇于自我批评,对本地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敢于揭发,勇于改正。

但是,与延安整风学习相比,各地的学风学习也有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学习时间上起止不同。在延安已进入党风学习的时候,大多数敌后根据地还在学风学习阶段,有的才开始学习。其次是没有连续学习的条件,由于日军的“扫荡”、“清乡”等大小不一的军事行动不时发生,因此学习过程也是时断时续,也没有统一的规范性的学习方式。再次是讨论、质询等不及延安多,这当然也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最后,虽然大多数根据地都按照中央部署学习了指定文件,但有些地方的学习不够系统。从总体上讲,各地的整风学习深深触动了广大党员的思想。各地党组织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在不误作战、工作的情况下进行学习,这是难能可贵的,也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有此创举。

第六章

文艺界整风独辟蹊径

一、毛泽东分管文艺界整风，密切关注着这支“鲁总司令”的队伍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在中国古典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诗人。他的诗词，有的感情细腻，颇有几分婉约的味道。比如：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①

但他毕竟是政治家，所以他写的诗词大多充满了政治意义，显示了豪放的情怀，只是这种政治的意义蕴含在深厚的艺术修养之后。比如：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①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①

这首词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作品，在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有的文艺评论家说这首词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自己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②

在短短的一首词里面，包含了如此深刻的寓意，却又充满艺术色彩，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家与诗人和谐地统一的结果。

不知是有意还是一种巧合，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分管文艺界整风。

由这样一位有着深远政治眼光和深厚文学功底的人来主持文艺界整风，便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和久远的历史影响。

延安在历史上有过它辉煌的一页，凤凰岭上古风依旧的庙宇，宝塔山上巍巍耸立的古塔，都是过去那一页的见证。但在后来这座古城逐渐衰落了，它的历史文化鲜有人提及。

抗战开始以后，这座因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而著称的古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无数青年所倾心向往的抗日中心、革命圣地。短短几年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投奔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数以千计。毛泽东 1944 年春在一次讲

① 《毛泽东诗词选》，第 61—62 页。

② 《毛泽东诗词选》，第 63 页。

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粗的估计数字，但也可以从中领略到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的热烈氛围。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延安，成为革命文化的中心。

毛泽东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汇集在延安无疑是诚心欢迎的。直到1942年，在大批文化人投奔延安的高潮已过去的情况下，他还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刘少奇和华中局的电报中说：“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①这里既有政治家对文艺及一切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视之意，也有文人对文人的珍惜之情。

鉴于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功能的重视和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尊重，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加强和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比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怀、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胡乔木回忆说，每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胡乔木举了这样两个例子：一是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二是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5页。

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事例反映出毛泽东对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成绩是肯定的，也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

但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多的注意文艺的政治功能，这在文艺界整风开始前就三番五次地表现出来了。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艺术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为了培养文艺工作干部，充分发挥文艺工作的战斗作用，中央决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2月，毛泽东同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1938年4月10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出席了该学院的成立典礼，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认为，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

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①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了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他说：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他号召青年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细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他强调，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意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②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2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2—253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3页。

毛泽东对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他在1939年3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时指出：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非艺术的作品。

毛泽东的这番话固然是批评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一些不符合现实需要的偏向，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鲁艺的文艺作品是极为关注的，否则他不可能对鲁艺的创作是否有朝气作出一个时间上的明确分界和内容上的对比。

作家萧三原是新民学会会员，1939年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毛泽东在1939年5月5日傍晚到鲁迅艺术学院探访萧三，谈话间涉及到文学问题。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在毛泽东看似闲谈的话语中，体现出政治家看文学的独特视野。虽是一家之言，却也发人深省。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毛泽东那里，文学与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的、社会的作品来阅读的。这一特点，不能不对延安文艺界整风产生影响。

毛泽东对“笔杆子”必须与现实政治结合的想法在很多场合都能表现出来。他曾这样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

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挡得过三千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上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二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①

萧三在1939年5月间曾给毛泽东一份自己的诗本（手抄本），毛泽东看后写信给萧三，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②显然，这种符合现实需要的充满战斗感的作品，毛泽东是热烈欢迎的。

毛泽东的文艺创作主张，在他给鲁迅艺术学院的题词中也明确体现出来。1939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出席纪念大会，并为鲁艺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鲜明主张。这就要求文化艺术作品既符合现实需要，又充满鼓舞人、激励人的革命热情和理想。联系到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可以说，毛泽东本人是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主张的最好实践者。

当然，作为文化艺术工作的一种根本的方向，还应该是毛泽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即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科学的”，其含义在于“它是反对一切封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4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8页。

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还强调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①这种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概念的阐述，表明在延安整风之前，他对党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已经有了成熟的意见。从什么是好的艺术家、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基本方针、文化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到文化艺术工作的根本方向，都有了明确的并且全面的一整套主张。贯穿于这套主张的基本线索就是文艺是革命战线中的重要一部分，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他各种观点都是围绕这条红线而展开的。胡乔木把毛泽东的这套主张简单地概括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②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必然要用这种思想去指导延安的和整个革命阵营中的文化工作，并以此来纠正文化艺术工作中出现的与此不符的偏向。

当然，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排斥与现实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文艺作品。这种观点，在他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有论述。他在这篇文章中，把外国的古代文化和中国的古代文化，都分为糟粕和精华两部分，提出剔除其糟粕，吸收其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8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3页。

性的精华,从而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也不排斥在延安上演一些并不直接反映根据地生活,但寓意深刻、有积极作用的文艺作品。他在1939年12月初曾找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提出在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应当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他自己也酷爱并不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对古代小说《红楼梦》的偏爱是人所共知的。1940年6月初,他到延安政府交际处看望沈雁冰时,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具有个性化的见解。当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这部小说当作社会历史书来读的。

毛泽东对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是多方面的。1940年2月15日,他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西北摄影队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该队是去内蒙古拍摄《塞上风云》影片途中路过延安的。毛泽东询问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当他们的领队介绍了《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后,毛泽东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

萧军是一个个性很强、颇有才华但性情有几分孤傲的作家。1938年3月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萧军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回重庆。1941年7月下旬,他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

泽东谈了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诚恳地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收集文艺界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可以说,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这时起就有了实际的调查。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又给他写信,内容是:“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①毛泽东坦诚恳切的心情,既有批评又有鼓励的意味,在信中表露无余。

在全党整风动员阶段开始后,毛泽东曾参观延安美术协会举办的讽刺画展,对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给以表扬,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后来,毛泽东还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谈话,说:有一幅画,叫《1939年所植的树》(华君武作),载8月19日《解放日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这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4页。

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都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这段对话,既体现了毛泽东对漫画家们的关心,又再次阐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阐明了对人民内部的缺点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热讽”。“热讽”是毛泽东的概括,而做到“热讽”,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对人民群众满腔热忱的态度,还牵涉到诸如此类的许多基本问题。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基本点,即必须明确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这也是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下,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文艺战线真正成为革命事业的有力推动者,成为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文艺的政治功能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另一方面,文艺工作也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文艺界也存在一些与当时斗争环境不太适应的偏向。1943年4月22日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曾极其简练地概括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

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具体说来，这些偏向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

第二，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还有人认为“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第三，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的形式来讽刺现实）一类的口号也出来了。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还有人认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写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的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等等。

第四，在与实际生活、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鲁迅艺术学院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创办起来的，为活跃边区的文化生活，调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作出了贡献，但办学方针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珂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

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

第五，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有许多的人自己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对工农兵群众，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六，在文艺工作队伍中还存在着宗派主义的余毒。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无原则的”问题上挑起争端。而在“为什么人”这个原则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倒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①

此外，在“人性论”、“人类之爱”等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

^① 上述关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均参见《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858页，第868—87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4—256页。

造成这些偏向的主要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说,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是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还存在着唯心论、教条主义、空谈、轻视实践等不正之风。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立场、态度方面的转变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

从客观方面来说,在抗战初期到1940年1月以前,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及前方,有留延安工作者,有在延安住一段又回大后方者,来来去去,听其自便。而当时党正忙于抗战,有关部门对文化人的工作着重于招待、优待和帮助他们上前方,对他们的工作注意不够,对于在思想上团结、教育他们做得不够。但那时环境比较好,因而问题暴露得不是那么严重。但194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但文委对这个方针并没有充分研究,文艺工作者中许多人对此也没有深刻理解。而这时国内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反共宣传屡次甚嚣尘上,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也出现了很大困难,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模糊,问题便暴露出来了。

对于文化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党中央、毛泽东是极为重视的。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文化艺术界开展整风运动是极为必要的。

延安文化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是认真的。

1942年4月3日,鲁迅艺术学院召开大会,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周扬在报告中说,院内有些同志想在三年内成为一个作家或诗人,天下不会有那样容易的事。目前鲁艺的同志和各根据地的军队、民众有脱节的现象,好像坐在碉堡里空想培养,尽是限于空想,知识分子应是生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结合。报告号召大家不要轻视工农分子,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成为真正的艺术干部。鲁艺还决定把整风文件分为四类进行研究:学风文件三个星期,党风文件两个星期,文风文件三个星期,最后一星期精读所有文件并作总结性研究。研究问题之前,先召开座谈会,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指导。问题讨论结束后,学院举行小考一次,艺术上有修养的教员,成立特别研究会,研究艺术运动、艺术教学等问题。研究结果,向学院作报告。院里还成立整风材料陈列室,除陈列整风学习文件外,还包括各个时期的教育计划,各届党员大会的文件,党和非党人员的关系的材料,各系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进度,各部代表作选集,创作目录统计等材料,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青年艺术剧院比较早地开始了整风动员。1942年4月13日又召开大会,号召全院同志反省自己在戏剧工作上、创作方法上有过什么缺点。为了避免检查工作中出现不良倾向,检查委员会改为整风委员会,并决定以两个月的时间研究文件和讨论文件。在此期间,艺术课暂停,实习课照常,实习中的排演和剧本的创作,都以整风为原则,并随时准备上演小型剧。

延安平剧院也开展了整风学习,全体党员、非党员都积极参加学习运动。院领导组织出版了整风墙报,发表大家整

风学习的文章。

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关注的。这不仅因为他分管这项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文艺界暴露出许多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事件出现后，更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所谓“思想斗争有了目标”，当然不止是说王实味，而是指的那些广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借整风之势，对文艺界来一番思想整顿，也就在所难免。

二、文艺座谈会上众说纷纭，毛泽东要求必须实现两个“结合”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文艺座谈会从此正式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面对着众多颇有才华、又有强烈个性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当然更要进行调查研究。

4月初，萧军受毛泽东委托，陆续收集了一些文艺界的情况，他将这些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给萧军说这些材料已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4月7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约萧军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两人接连谈了两天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

4月9日，毛泽东复信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约请欧阳山及夫人草明谈话。当天欧阳山夫妇应约而来。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

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4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欧阳山夫妇：“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①同一天，他还给萧军、舒群写信，也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仅仅过了四天，他又写信给欧阳山、草明，说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要的说明。毛泽东在几天之内，连续给几个人写信，有时给一个人连写数信，说明盼望了解情况的心情是很急切的。

4月间，毛泽东还约请艾青交谈。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烽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先后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在一次面谈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回答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再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泽东委托艾青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几天之后，艾青便把材料交给了毛泽东，并经修改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三次约请了刘白羽。第一次询问了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4页。

艺界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请刘白羽把议论结果告诉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白羽耳目一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由于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党支部书记,毛泽东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还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刘白羽曾向毛泽东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毛泽东约去谈话的作家还有丁玲。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泽东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齐名,曾受到许多同志的批评。胡乔木回忆说:在一次会上,“贺龙、王震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胡乔木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①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一篇文章就否定丁玲。毛泽东同丁玲有过多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56页。

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27日，毛泽东同何凯丰向100多位作家发出邀请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请他们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开座谈会，以便交换对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

座谈会召开前，他又邀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

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他还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一切都想得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谈到人性问题时，毛泽东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在回答是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时说：他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

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写成很

好的作品?毛泽东回答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就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这个谈话发生在文艺座谈会的前夕。从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对座谈会的主要讲话内容已是胸有成竹了。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了。

5月的延安,春风和煦,山间河边草木葱葱,生机盎然。1942年5月2日下午,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主持会议。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100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一走进会场,气氛就活跃起来。毛泽东在周扬的陪同下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泽东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泽东还向刚从前线回来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亲切致意。^①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引言”。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

^① 艾克恩:《延安的锣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前后后》,转引自高树等编:《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587页。

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①当他说到鲁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是十分活跃的。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作了恰如其分地阐述，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还回顾了“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的成长过程，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很有成绩的部门。但在十年内战时期，当时的反动派把文化军队和手里拿枪的军队从中隔断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到抗日根据地的多了起来，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

毛泽东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着重提出了五大问题加以阐述。

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

^①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9页；高树等编：《历史巨人毛泽东》，第5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立场。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态度问题。毛泽东说，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毛泽东指出，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毛泽东分别论述了对三种不同的人的不同态度：对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对自己人，也就是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对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是有缺点的，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①

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作对象的问题，就是艺术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既然如此，“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849页。

东批评有些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不熟不是指人不熟,而是指“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不懂是指“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①毛泽东接着提到“大众化”的问题,认为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还以自己如何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转变到逐渐同工农兵熟悉起来,感情起了变化为例,说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毛泽东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②

毛泽东所提出的五个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延安文艺界的各种争论就无法得到正确解决。毛泽东的政治家的姿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座谈会一开始就充分体现出来。

毛泽东讲话之后,要大家讨论。萧军第一个发言。他滔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8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又有几位作家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点头微笑，时而插上几句话。会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很激烈，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表态。胡乔木回忆说：萧军的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他发言内容很多，引起我反驳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很高兴，开完会，他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①

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40余人集会，举行边区戏剧界座谈会，讨论戏剧运动的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问题。会议的中心是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大会尖锐地批评了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和“只演洋人死人”的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吧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

重于普及工作。对于普及与提高二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胡乔木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是：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 10 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 月 16 日，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继续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毛泽东还不时地作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他说到这里，与会者都笑了，毛泽东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回来的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毛泽东对这个发言很满意。

在讨论中也有人大谈空泛的文学定义，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讲起，说文学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爱是永恒的主题”，宣称自己从不写“歌功颂德”之类的文章。还有人借机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这反映出文艺运动中的一些基

本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整风学习、文艺座谈会等问题。在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毛泽东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政治局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存在着的偏向，同意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要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座谈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朱德在下午最后发言。他热情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他还批评了文艺界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甚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宣传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个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的第一个作家。朱德针对这种思想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才行。有的作家感到在延安怀才不遇，没有受到更大的重视，便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来抱怨延安没有知人善任的韩荆州。朱德批评说：你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有的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朱德说：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朱德还针对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

想转变的争论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对于某些作家嫌延安生活太苦的问题，朱德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①朱德的讲话朴实无华，言简意重，在与会者心中引起很大震动。

朱德讲完话后，毛泽东作“结论”。此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三根木棍悬挂起一盏汽灯，照得会场一片通明。

毛泽东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人们专注地听着毛泽东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问题的中心归结到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着力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首先阐发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以其惯有的政治家的思维，从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高度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

^① 参见《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28页。

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这样，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权问题，党的领导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与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就提纲挈领地阐发出来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民大众？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①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这四种人。毛泽东分析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原因，关键在于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没有转变，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②毛泽东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问题。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是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还说，过去的文艺作品是流而不是源，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毛泽东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二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工农兵的问题，是“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毛泽东还指出了二者的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①

毛泽东进而又提出了第三个问题：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党内关系是指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②在党外关系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毛泽东力主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团结起来。毛泽东特别强调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在第四个问题中,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用了很大篇幅来讲文艺批评的问题。他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①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还具体解答了延安文艺界在“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光明与黑暗、“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动机与效果、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问题上的争论,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分辨其正误,阐述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结论”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指明延安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严肃的整风运动。在这一部分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入党”的观点。他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这不仅是对文艺界党员而言，而且还是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党内大多数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都需要有一个思想上的改造、转变而言。毛泽东的这段话，其意义已经不限于文艺界整风，而对指导全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毛泽东以党的领导人身份，对党的文艺工作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的基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党领导下的文艺理论，都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今天的文艺理论有许多新的、甚至是前所未闻的观点和流派出现，但现在的文艺理论毕竟是从那个时期、那个阶段走过来的，这也是不能割断的历史。

当然，毛泽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表这个讲话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因而有些提法只是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有所指，在某些问题上只是适合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胡乔木曾发表意见说：

文学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跟阶级、政治的现象有些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直接。……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情就讲不清楚了。^①

按照胡乔木的说法，“文学服从于政治”的提法是有局限性的。但他也指出，要考虑到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事实上，毛泽东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某些艺术至上、文艺脱离政治的偏向而提出的，其用意在于调动文学艺术界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为抗战服务，为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服务。这也是政治家抓文艺工作的一个特点，即把文艺作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毛泽东不可能撇开战争，撇开政治，去专门研究文艺的特殊发展规律。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整风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延安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说：文艺界的同志最近开了几次会，座谈怎么样使文艺界的同志与我们领导下的各方面的同志相结合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欢迎。他还说，党对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8页。

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有 100 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那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方面文艺工作者要和做其他工作的同志结合；另一方面其他工作的人，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从文艺工作者这方面来说，毛泽东还特地提出，主要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①毛泽东指出，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承认，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分成几类：一种是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

^①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6 页。

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①总之,毛泽东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②

毛泽东对党的文艺政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③

如同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讲文艺工作一样,他没有局限于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42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文艺本身来讲文艺，而是把文艺和其他工作联系在一起来看。在高级学习组的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把文艺和知识分子政策又联系在一起了。他指出，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可以看作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一个重要补充。他所谈的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问题，不仅对文艺界整风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整风运动都有指导意义。

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艺检查整风学习。这时，学院的同志正在热烈辩论学校过去的办学方针，检查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联系学院讨论中的一些争执，作了生动而有说服力的解答。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有些人争论不休，毛泽东说：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的小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毛泽东还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地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三、毛泽东满意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恰如一股春风，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气息。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以全新的面貌开展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是从座谈会以后才开始的。

汇集了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虽然早就开始了整风学习，但真正明确了整风方向、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后。1942年6月4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本院的实际情况编印了《复习学风文件参考大纲》，作为复习学风文件时的反省参考材料。大纲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从艺术方面看，反主观主义意义何在？（左翼十年中的新教条，艺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封建主义的旧教条，曾发生了何种有害的作用？）第二，从主观主义的表现方面看，鲁艺具体表现在哪里？艺术性和革命性是否兼顾等等。第三，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包括如何从实际出发，在艺术工作中如何实践，如何做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在艺术上如何具体化，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如何学习对群众采取正确的态度，改进鲁艺的中心问题在哪里，从何处着手等等。从这份复习材料中可以看出，鲁艺的整风已发展到实事求是地剖析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缺点的程度，也说明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产生了。

为了学习其他单位的整风经验，鲁迅艺术学院整风学习委员会组织了整风学习参观团，曾前往中央党校参观了两天。在参观中，发现党校的同学都是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所以无论在讨论会中还是在笔记中，都能以高度的自我批评精

神，根据文件的精神实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党校的领导也能经常深入了解下层，研究情况，及时总结。参观团回学院后根据本院的特点，参照其他单位的经验，提出改进本校整风学习的意见。院学习委员会接受了这些意见。为了便于大家在整风学习时联系本院的工作实际，决定印发周扬 1941 年的《全院工作检查总结报告》《本届教育计划》，让大家对照检查学院的工作。为了适合文艺工作的特点，除中央规定的文件外，鲁迅艺术学院还增补了几个文件，如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高尔基《论青年的文学及其任务》、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也被编印出来，作为研究延安文艺界思想偏向的反面参考材料。

经过三番五次地学习、争论，鲁迅艺术学院的整风学习终于取得很大收获。7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成就。这篇报道说，一个月前，该校发动大家对学校的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进行讨论，周扬在一次大会上鼓励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并说不妨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学习委员会在讨论前指出应注意的问题是：所学和所用是否脱节，脱节的程度如何，即教学上的提高和普及，艺术上的革命性和艺术性的联系如何等。还未到正式讨论开始，全校就已卷入激烈的辩论中，“从清晨到夜晚，饭厅里和树荫下，散步的时候，连星期日也不例外”。所有的讨论都汇集到一个中心点上：“鲁艺的教育方针和实施方案是在路线上有错误呢，还是在执行中有错误，或者两者都没有什么错误？”一些人认为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实施计划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又一些人认为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对的，在方案和执行上有某些缺点。还有人认为两者都无重大毛病。经过讨论，大家的意见逐

渐趋于一致，认为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和实际脱节。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里缺乏研究现状的精神，关门提高的偏向从而发生。表现在课程配备上，就是充满着西洋古典。表现在艺术作风上，是从个人出发，不注意普及和对普及的指导。接受遗产的批评的战斗精神也很不够。由此所产生的对个人的影响就是想当专家，但对专家的概念又认识模糊，强调技巧，突出个人等等。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大家有两点明显的收获，一是进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实质，学会了怎样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明白了什么是空而无用的条文。二是使大家明确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它的教育团体，必须在每一活动中和实际密切联系起来。^①

鲁迅艺术学院的整风学习是延安文艺界整风的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艺是不可能有这样深入的讨论的，也不可能产生这样大的收获。

著名女作家丁玲也根据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检讨。1942年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从立场和思想感情的高度，对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和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还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胡乔木对丁玲的评价很高，说这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30—231页。

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泽东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①

6月15日至18日，文艺界举行有4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整风号召，掌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而召开的。虽然会议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批判王实味的所谓托派思想，但许多作家也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密切和群众结合。

在延安整风的热烈氛围中，文艺工作者怀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愿望，继续清理自己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充实自己，以此作为改造自己思想的第一步。

7月，青年剧院在学风文件的学习中，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对自己创作的十个小型剧本作了认真的分析、讨论，检讨了小型剧的创作方法，指出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以促进青年剧院的创作思想的进步。

8月，“文抗”进行学风总结。总结大会开了八天半。总结方式是先由被检查者自己作一分析，然后其他同志就其分析进行补充或纠正误解和偏向之处。大多数人的反省能把握文件的中心，态度坦白诚恳。向他人提出批评的同志毫不客气，尖锐彻底，但不失与人为善的态度。被批评的同志也很虚心。大家表示，要严肃地对待文件，把真正掌握文件作为改造自己的开端。最后由丁玲作了学风队伍的总结报告。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人周扬对鲁艺的学风学习也作了总结。1942年9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文章《艺术教

^①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4页。

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他从三个方面来检查鲁艺的教育：（一）怎样才叫做“从客观实际出发”。他指出这个客观实际应当是：抗日战争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在战争中和民主政权下，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的大众的革命文化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我们面前所摆着的任务。这三者都是我们以前所从没有遇到过的。（二）我们的“糊涂观念”及其所造成的偏向。他说鲁艺的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穿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主要表现在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三）今后的改进方案。他认为把鲁艺整个教学活动建立在与客观实际的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上，这是改造鲁艺的首要的中心的中心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艺界整风运动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在“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有了明确答案后，以前争论不休的“人性论”、“光明与黑暗”、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等问题不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转变为检查文艺工作中有没有主观主义的影响，以及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二是开始认真地普遍地反省自己的工作，检查自己的作品，能够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思想和立场的高度来分析自己，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这是文艺界过去少有的。三是文艺工作者在整风学习中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走向工农兵群众，打破了“普及”与“提高”的对立，为“普及”做了大量工作，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整风成果。比如，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使文学家们的艺术创作直接面向广大群众。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

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发展为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鲁迅艺术学院多次派出工作团深入农村为群众演出宣传。1943年初鲁艺秧歌队150多人在延安周围演出40余场,每到一地,群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种在整风中边整边改边出成果的崭新气象,也是过去少有的。

延安的山岭是墩实、浑厚的,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延河的水弯弯曲曲,透着一股灵气。生活在这山水之中的人民淳朴敦厚,有着风格独特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惯于到处“采风”的文艺界人士,只要肯以热诚的心俯首在这块土地上,便可伸手拾来诸多未经雕琢的艺术宝石。

作为文艺界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文艺工作者在整风的教育下,深入基层,创作出大量的甚至长久流传的优秀作品。

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界的许多人就利用各种途径、各种方式深入群众。一些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受到文艺整风的推动,要求到群众中去。文艺座谈会后不久,作家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方去。毛泽东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1943年2月,文化界200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

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①

为了更好地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为了使即将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解决如何到群众中去工作等问题，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刘少奇、陈云、何凯丰、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

何凯丰在讲话中指出，作家到前方去，到农村去，今天并不是第一次，但是这次和过去各次都不同，因为过去很多同志都是去做客，甚至已经工作了几年，自己还觉得是为了搜集写作材料而来的，不觉得自己应该是群众的一分子，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还保留着很大的距离，所以就始终不能解决作家和实际工作相结合，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次是根本打破宾主的界线，去的人不以客自居，群众也不以客相待。最后，他希望到会的同志都能够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方向，能够把中国新文艺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同时希望党政军各方面的同志也能够给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以必要的帮助。

陈云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针对一部分同志从旧社会带来的两个弱点——自视特殊和自大自满，在讲话一开始即尖锐地问：文艺工作者在加入党的革命队伍时，究竟是一个以文艺工作为党内分工的党员呢？还是一个附带做党员的普通文艺家？他指出，前者是党所要求的，因为这样党才是一个统一的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6页。

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后者是党所反对的,因为那样的党就变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党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明白的原则问题。他认为党内没有抽象的党员,文艺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因此,分工决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陈云强调: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在党内关系上应该尽量做到不特殊,要和旁的党员一样遵守纪律,学习政治。在反对自大自满问题上,陈云要求文艺工作者无论对文艺在全部社会生活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还是对自己的知识和成就,都要有冷静的虚心的估计。实际上文艺乃是经济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文艺作品的内容乃是群众生活和斗争的反映。就这两点来说,文艺都是有从属性的,承认这种从属性(并不否认它的能动性),对于任何文艺事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做文艺工作的党员,他的工作做得有成绩更是份内的事,如同每个战士都做了他的份内的事一样,完全不值得骄傲。

在大家的要求下,刘少奇也讲了话。刘少奇反复批评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出得到知识应从深刻了解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入手,读书虽也是一种不可少的方法,但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旁观又不如动手。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在学习的质上说乃是找到了主要的基本的方法,学习就是要打倒无知,这比苏联打倒希特勒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需要大家长期学习。

中央领导的讲话,使与会者受到很大鼓舞。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

众一分子。”^①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文艺工作者们热情更加高涨,纷纷写文章,发表谈话,决心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并很快付诸行动。如鲁艺工作团 1942 年 12 月到绥德分区等地巡回宣传,直到 1943 年 4 月才回延安。他们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了鲜活的素材,又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协助,创作出了许多真实动人的作品。他们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惯匪周子山》、秧歌剧《兄妹开荒》,根据民间故事和民间音乐创作的《白毛女》,根据秦腔改编的大型秧歌剧《血泪仇》等,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一直流传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表明,这些作品不仅有较强的政治意义,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得到了人民大众的认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943 年农历正月初一,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毛泽东住处拜年。毛泽东看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时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

1943 年秋冬,西北局宣传部组织延安各剧团下乡,民众剧团出发到关中,西北艺术团到陇东,青年剧院和部队剧团到三边,平剧团到延属各县。他们在基层演出、生活,深受群众欢迎。深入基层不仅解决了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而且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们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问题的良好开端。

后来,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观看后给他们写信,认为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28 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66 页;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359—363 页。

“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把这一工作同郭沫若的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说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①

1944年6月，丁玲、欧阳山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泽东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②

诗歌创作在此期间也有大批新作涌现出来。如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田间的《假如敌人来进攻边区》，高敏夫的《边区自卫军》等。这个时期涌现的《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王贵与李香香》等都成为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

这种以刻画工农兵新人物，反映党领导的根据地人民斗争、工作、生活的作品，只有在明确了文艺的方向并自觉地以反映这种生活为己任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这是代表了新时代的前进方向、与时代脉搏的跳动协调一致的文艺作品。

毛泽东十分欣赏文艺工作的新成果。他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

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不仅在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史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运动，而且在当时整个整风运动中，也是有代表性的成功的典型。这当然与毛泽东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与毛泽东为文艺界整风确立了基本方向有重大关系。但是，也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那些文艺工作者都是怀着参加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强烈愿望来到根据地的，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一经认识到问题所在，就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一切与现实斗争不相符合的东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为工农兵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去。这种崇高的精神，理想的光辉，将是永载史册的。



第七章

整顿党风文风紧锣密鼓

一、毛泽东号召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一元化领导体制随之建立

从1942年8月中旬开始，各单位相继转入党风学习阶段。这一阶段共四个多月的时间，至12月中旬结束。

党风学习阶段，着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在延安整风过去将近60年时再来审视这场反对宗派主义的运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党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进行的一次适应性调整。

在全党整风开展之时，从国内政治局势来看，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另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党。这表明，党的地位有了很大变化。而党在当时的任务就是动员群众克服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致于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

处在这种局势中，党的组织有能够适应党的地位的变化

和应付任何突然事变的成熟的基本方面。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着 20 多年奋斗历史,经历了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次大的失败,但又两次从失败中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党能够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能够正确处理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①

但是,党自身的组织结构也存在着与环境不适应的某些方面。

比如,在中央领导层面上,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班底仍然是六届四中全会和六届五中全会时奠定的。毛泽东后来曾用“码头”一词来形容这种状况,说:“遵义会议以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②毛泽东称这是一个矛盾。但在当时还不具备从人事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这就需要建立某种制度,确保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顺利贯彻实施。

再如在领导体制上,体现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是党一直坚持的原则。但是,在各抗日根据地被四面包围、彼此分散、联系不便的状况下,在大量的工作需要独立自主地作决定、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各抗日根据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80 页。

地都得到全面的、创造性的实施,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在政权组织和其他民众团体中实现党的领导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党的各级组织与各级政权的关系是明确的。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各根据地的政权虽然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但在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又必须在这些政权中体现,因此对坚持党的领导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难度。更具体地说,在某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党与政的关系存在着或者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或者党与政之间合作不当、步调不和谐等现象。又由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甚至党的组织大多是党所领导的军队去帮助建立起来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军队与党、政组织之间又存在着统一协调的问题。在各根据地中,还存在着一个党政军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党、政、党政军委员会之间又形成“三权鼎立”的局面。当然,这种结构在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对于没有突发事变的情况来说,还是能够适应的,事实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是全国范围的政党来说,对于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危险的首要任务来说,这种组织模式、领导体制确有其不适应的地方。适应党的任务的需要进行组织调整,显然是必要的。

又如在党的干部队伍构成上,大多是抗战后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仅以军队为例:第一二九师工作人员中,老干部占 17.2%,新干部占 82.74%;在政治人员中,老干部占 44.4%,新干部占 55.1%;在指导员中,老干部占 43.54%,新干部占 56.46%。第一二〇师也大致相同,新干部占总数的 56%。山东纵队各支队的干部,新干部分别占到 85%、67%、

73%、50%不等。^①地方干部新老比例数字不详,但鉴于军队老干部保留的比地方多,可以想见地方新干部的比例更大。这些新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②这种状况,也是同形势与党的任务不完全适应的,也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同时,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③事实上,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对干部进行教育、借以实施思想改造的一种手段。

为着造就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为着使党能够适应党的中心任务和环境的需要,除了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外,进行组织上的适应性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从当时和后来的情况来看,这种调整所要达到的目标至少有三点:

第一,建立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各级组织、党所领导的政权机构及其他一切团体都必须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工作,步调一致,相互配合。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突

^① 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1940年10月,转引自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然事变,都要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行动。但是,鉴于各根据地的特殊情况,又需各根据地有自己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便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下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

第二,坚持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系统的领导,以此来实现共产党对广大党外群众的领导。但这种领导不是以扩大在政权机关中的共产党员的数量而体现出来,相反,要扩大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坚持“三三制”政策,减少共产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人数,使政权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要通过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体现出来,通过自己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团的工作体现出来。

第三,调整党、政、军的关系。党、政、军三者的关系对全面建设根据地、发展根据地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且涉及到党的整个领导体制能否正常运转。协调三者的关系就成为组织调整的不可缺少的内容。

调整的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如何运作,即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进行调整。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操作是恰到好处的。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而是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放在了第一位。在全党整风之前,中央在1941年7月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就已经严厉批评了有碍党的统一领导的闹独立性的问题,并具体列举了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思想上个人主义等各种表现。文件所列举的那些表现和后来反对宗派主义时所提到的那些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人们对于过去“左”的错误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因此只能是以增强党性的形态或名义提出这些问题,还只是为了从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提出组织上的问题,就有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混乱。只

是在经过了九月会议,在对过去的错误有了统一的认识,并且经过学风阶段的学习,解决了思想方法问题之后,人们对分析问题看待问题有了统一的方法论的基础,毛泽东、党中央才从组织上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而在这个时候,在不大面积调整人事的情况下,部分地解决领导体制、组织制度的问题,不会引起不良影响,相反,却可以促进、改善党的工作。因而可以说,在全党整风最重要的阶段——学风阶段暂告一段落之时,开始调整组织体制,是再恰当不过的时机了。

这种组织调整的方式,是以反对宗派主义的形态出现的。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

第一,宗派主义在本质上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相对立的,反对宗派主义必然有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时所说的宗派主义,与“左”的错误路线时期的宗派主义已有很大不同。这时已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有的只是宗派主义的“残余”。因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态主要的不是干部路线上的严重排斥异己,任人唯亲,而是表现为在组织关系上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置于全党利益之上,向党闹独立性。产生这种现象,与党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党长期处于广大的农村环境,且是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的倾向。这种闹独立性的代表,党的历史上以张国焘最为典型。但是,在整风运动期间,提到闹独立性,人们不可能不想到王明。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给党带来的损失是全党难以忘记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党中央对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表谈话、文章的做法是

很不满意的。反对闹独立性,反对宗派主义,当然有肃清王明错误影响的意图。但是,更重要的是上面所叙述过的,在各根据地党、政、军关系上,在某些工作部门之间,存在着某些不甚协调的现象。这种带有某种程度的闹独立性的现象,影响到党的领导体制的正常运转,影响到全党的团结统一,这不能不是整风在组织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干部的相互关系上的表现,是毛泽东再三批评的一个重点问题。新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党在长期的农村环境中,在武装斗争的历史环境中,在主要以军队的力量去创建根据地的特殊条件下所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这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些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不可能不影响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不可能不影响到党的组织工作、领导体制的正常运转。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整顿的,但是,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与王明“左”的错误占主导地位时期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毛泽东称之为宗派主义的“残余”是恰当的。

第二,反宗派主义既是思想、作风问题,又是组织问题。在整顿党风、把宗派主义思想批到体无完肤的基础上,再进行组织调整,无疑可以使组织调整的阻力降到最低点。同时,宗派主义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有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有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本位主义的问题,纪律与民主的关系等等,但归根结蒂还是一个党性问题。所以这就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不只是和少数领导干部有关。以反宗派主义的形态进行组织调整,实现组织上的布尔什维克化,这就便于每个单位每个同志具体

地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进行学习。其结果就是不仅在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达到了集中统一，而且还在各个层次的组织机构和大多数党员中达到了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效果。

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原因，就使毛泽东、党中央在转入党风学习阶段前后，在批判宗派主义的基础上，开始着手调整党的领导体制。王稼祥根据中央的决定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的决定》。1942年8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决定草案。

在讨论这个决定草案时，王稼祥作了说明，介绍了根据地存在的党、政与党政军委员会“三权鼎立”的情况，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针：（一）减缩军权；（二）提高政权；（三）调整党政军关系。

朱德在发言中指出：军队没有党政民不能存在，根据地没有军队也不能巩固。今后，党政军民关系要搞好，党内也要进行法治教育。

任弼时在会上说：华北地区，过去地方的党组织大体只管地方工作，对军队工作领导差，但政策是党统一管的。现在，党委要注意组织战争的工作。过去中央没有规定地方党委管正规军的工作，地方也无法管理。现在地区分割，根据地的建设要求领导一元化，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主力军在该地区亦应当受当地最高党委的政治领导。他建议文件的名称可改为《关于党对军政民领导关系的决定》。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这个决定，正式将文件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会议规定这个文件9月1日发出，

并作为整风的文件之一。

两天之后，这个文件按照规定的日期正式发出了。文件成为确立党的领导体制的基本准则。其主要精神是推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体制。

一元化领导包含有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即横向的关系，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即纵向的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

《决定》首先规定了党委在同级各组织中的地位。《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由此而确定了党组织是各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构：“根据地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①即是说，中央设在各地的代表机关和各级党委，是当地统领一切的指挥机关。由于这种领导使命，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就必须有相应的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

^① 凡涉及《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引文，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436页。

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在原则上确定党与其他各组织的关系是不难的,但在具体操作中,党与其他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组织,如与军队、政府、民众团体的关系,以及这些组织各自隶属的系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其协调一致的问题却并非简单一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决定》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这些关系问题。

《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需无条件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交同级党委负责人交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而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的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这里,中央对各组织间的关系规定了大致的操作规范。尤需注意的是,该《决定》要求政府、军队、民众团体重要的文件交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同级党委负责人同意,这是体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关键一环。有了这一环,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在执行各自系统的指示时,实际上也就是在执行

党的指示。

对于各地最高领导机关的产生办法,《决定》也作了明确规定。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

《决定》对过去军队与地方党、政府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指出:“今后为了实现一元化领导,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策上的一些错误。……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区、县、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且应当经常的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必须遵照实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而使党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解决问题。”

《决定》又对党与政权系统的关系作了说明。如前所述,在同级各组织中,重要的决定、命令、法令需经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取得同意,但这并非是要党委干涉政权系统及其他组织的工作。《决定》根据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弊病,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

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与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也应给以严厉的处分。”《决定》还规定，党必须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来实现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而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党团不能强制党外人士服从党的意见，而是要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的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决定》还指出，在实行三三制时，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数量减少，因此必须提高党员质量。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决定》还规定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

对于党与民众团体的关系，《决定》指出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事情。党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实现对民众团体的领导。“但党政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决定》还大致规范了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关系，指出：“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某种团体的生活与工作。”

《决定》还考虑到游击区的特点，规定在游击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有所确定，而且在机构上也要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

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职务，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职务。

上述规定主要涉及同级之间的各组织关系，这也是《决定》以大部分篇幅来阐述的问题。对于一元化领导的另一方面，即上下级组织关系问题，《决定》虽然用的篇幅不多，但措辞甚为严厉。《决定》以不容置否的语气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质的不违反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这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决定》还再一次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地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通观全篇《决定》，只有在此处才使用了如此激烈的言辞。这表明，中央对于高级干部服从党的领导问题，远比对一般干部要求严格。这既是由于高级干部地位的重要性所使

然,也是由于历史的教训所使然。

在对同级各组织间的关系和上下级间的关系作了说明之后,《决定》又把这种组织调整和整风学习、反对宗派主义联系起来,说:“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决定》要求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系。《决定》还要求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这表明,整风为组织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单纯的组织调整可以进行,但不会收到好的成效。那些措辞严厉的语言,如果没有整风的基础,也难以得到全党的认同。

最后,文件指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这说明《决定》本身只是一种原则的规定,其具体操作还有待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来解决。

这个文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的历史问题而产生的。它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它在党内起到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保持党的行动一致的作用。其次,它协调了根据地内各方面的组织关系,极大地统一了党政军民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再次,它为党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组织上和领导体制上的保证,是在战争条件下实现党的组

织上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步骤。

但是,这个文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它所产生的那个历史阶段。在那个历史阶段奠定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其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在民主生活不足的情况下,这种体制就被推向了另一面。邓小平曾这样评价后来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变化:“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①邓小平还指出,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领导体制后来出现的弊端,与颁布这个《决定》的初衷是两回事。党在执政以后,特别是在党的中心任务发生变化以后,没有能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及时调整领导体制,这主要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没有深刻认识的缘故,把责任归于抗战时期颁布的《决定》显然是不合适的,要求《决定》的制定者在那个时代就认识到这种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也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本身蕴含着易于出现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或个人手中的缺陷,毕竟是为历史所证实了的。所以,当后人谈到这个《决定》时,不能不全面地分析这个问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题,否则我们的眼光永远不能超出前人,历史的经验教训永远不能为后人所记取。

这一《决定》颁布前后,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如中央政治局先后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晋西北分局,贺龙为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邓小平为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聂荣臻为书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将边区的军事指挥机关由过去的联防司令部、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三级改变为一级,联防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合并,贺龙为司令员。对于其他根据地原有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中央也分别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组织力量。

在上述决定颁布不久,中央又于1942年12月1日发出经毛泽东审定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中央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这个指示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军区、分区两级缺乏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是完全矛盾的。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根据中央关于统一领导的决定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以下各项,以应付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是领导核心。军区、分区两级许多类似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重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必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57万缩至20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大批干部及知

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需要的部门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令经过下层锻炼。（三）干部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消除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被分配到新的岗位去。

这个指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督促各地实行精兵简政，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各地要自觉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求“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应谁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这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上又迈进了一步，也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内在要求。这种体制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否则体制的内在力量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样做有利于党的集中领导，同时也为进一步在全党确立党的领导核心起了铺垫作用。

对领导体制的调整，势必引起中央组织机构的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以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为标志而达到顶点。

当时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还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位较高，其成员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陈绍禹）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把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让掉，并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不主张提这个问题。因此，张闻天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去讨论。这样，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作调整。六中全会后，

张闻天逐渐将自己的工作职责向宣传教育方面转移。整风运动开展时,中央的领导机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朱德、康生、陈云、项英、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书记处书记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从组织上说,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负责,但由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已得到全党的公认,并且也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界和国际舆论所确认,因此,在党的工作上,张闻天有事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很少独自决定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虽然由张闻天召集,但在党内分工方面,他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泽东拿主意,作决定。^①这种体制,虽然由于中央各位领导有着较高的党性而不致影响决策,但从决策的过程来讲,从正常的组织关系上讲,在程序运作上都存在着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问题。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以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张闻天深感工作很不适应,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从1942年初起就离开了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常驻重庆,中央的全盘工作很难参与。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党的工作。因此,无论从调整党的领导体制的长远角度来说,还是从解决现时的工作问题来说,都需要把调

^①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0—271页。

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为着进一步调整党的领导体制，也为了落实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任弼时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中央机构调整的初步方案。

由任弼时提出调整中央机构的方案，是有一定缘由的。任弼时自1940年3月同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就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任弼时等回国，主要是准备召开中共七大。1940年五六月间，中央决定任弼时担任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但以后发生皖南事变，七大就拖下来了。这以后，任弼时在政治局内分工主管党群口和情报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做些工作。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实际上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张闻天到基层作长期调查后，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就完全由任弼时负责了。因此，由任弼时提出中央机构调整方案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任弼时本人对这项工作极为认真的。他在延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的工作笔记，从既增加领导效能，办事更加集中统一，又精兵简政两个方面着手，提出了初步方案。

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随即由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他在解释这个方案时说：中央的组织机构，自前年九月会议后，作过一次调整，组织更加统一，各自为政的现象改变了，但机构仍比较分散，现经过整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条件更加具备，有可能使机构更加简便灵活，办事权更加统一集中，进一步增强领导效能。他还汇报了方案的具体内容：一是明确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他说：内战时期，在白区和苏区的书记处，等于是政治局的常委会，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临时

中央搬到苏区后,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是不对的。现在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是中央各部委的联席会议,与政治局会议无多大区别。现在要确定书记处的性质与权力,使书记处成为政治局的办事机关,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制定的方针下,主持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应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二是在政治局之下,设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同时,按地区指导各地工作。三是设立民运委员会,统一领导职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对外保留各组织的名义,保存干部和传统。四是合并同类机构。五是调整研究机构等。^①

在作出某些修改之后,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洛甫(张闻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康生还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说:“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决定》指出:中央机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对于中央政治局,《决定》规定其责权是:“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

^① 参见《任弼时传》,第501页。

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对于中央书记处，《决定》规定其性质和责权是：“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①

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中央党校，中央文委和出版局。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和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为书记。组织委员会管理中央组织部（含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民运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委。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都是每周（或每两周）召开例会一次。

为着分工而又有利于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① 胡乔木对此解释说：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是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为了便于集中统一,精简增效,中央对许多职能机关采取了缩小规模、同类合并和合署办公等办法。如取消原中央财政经济部,设立经济建设材料组,由张闻天负责,直属中央书记处。取消原调查研究局和中央研究院名义,另成立精干的中央研究局,刘少奇为局长。中央情报部与社会部合署办公,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取消原中央机要局,将军委和社会部的机要科并入中央机要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的行政事务部门,统一由中央管理局管理。

工、农、青、妇的机关合并,成立民运委员会,下设四个组。邓发为委员会书记。

在通过上述决定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

政治局委托李富春主持精简委员会,照上述方案具体实施,于4月中旬完成。

中央机构的调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动,即刘少奇地位的变化。这个问题在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在一般学者的著述中也鲜有论及。这一方面固然与缺少历史资料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过去政治运动频繁,领导人上上下下变动很大,不宜多说有关。对这个问题论述较充分的是胡乔木。他说:

这次中央机构最显著的变动,是少奇同志参加中央书记处,并与毛主席一起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这个变动是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逻辑结果。前面已经介绍过,在那次会议上,陈云等领导同志认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与重要的领导责任。毛主席在那次会

月到达山东后，毛主席又致电与他，委任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驻 115 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因通过封锁线安全尚无保障，不必急于西进。在少奇同志处理完山东问题，于 1942 年 10 月到达晋北地区以后，毛主席又电告该根据地领导人，指示他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12 月下旬，少奇同志安抵 129 师领导机关驻地山西境内太行山涉县的赤岸村，毛主席去电表示慰问，望其休息短期后来延，并让他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同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二位，对少奇同志来延路上的安全保障作周密布置。1942 年 12 月 30 日，少奇同志平安抵达延安。毛主席这才好像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了。1943 年元旦，《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新年晚会，并欢迎少奇同志从华中归来的消息。少奇同志在路上走了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毛主席无时不在挂念。对少奇同志的安全这样关怀备至，在不少人的亲见亲闻中是很少有的。大家深为党的领袖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所感动。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 年 3 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了。^①

胡乔木的回忆是耐人寻味的，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刘少奇的地位上升，固然与他在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错误中的态度有关，与他抗战后在华中的工作成绩有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74—275 页。

关,这是得到了党内许多同志公认的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刘少奇从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直接上升到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其酝酿、提名过程我们无从了解,但从上述现象分析,确实与毛泽东对他的倚重有关。毛泽东对党的各方面决策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而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层,客观上为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极为重要的人事上的准备。

1943年3月的中央机构调整、精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经过遵义会议,再经过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是经过整风之后,毛泽东以他所代表的、并被历史证明了是正确的路线,得到全党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这是整风运动的最大成果,是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一环。其次,它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七大党章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组织路线由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所决定,又为政治路线服务的特性,在此深刻地体现出来。第三,它为在全党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作出了表率。

从1942年9月1日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到1942年12月1日颁布《中央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再到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即从部分地调整领导体制入手,发展到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确立领导核心,再到确立全党的领导核心。从不涉及具体的人事问题,发展到在人事上确立具体的领导问题。当然,这期间在人事上还只是小范围的变动,并且都和确立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变动都是通过反对宗派主义、精兵简政的形式出现的。反对宗

派主义对于党的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作用已充分展示出来。至此,党的组织的调整以建立起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告一段落。大规模的组织变动,即换“码头”,要待党的七大才能完成。但这样的调整,已足以保障党的领导的实现。

党的组织调整的轨迹是毛泽东、党中央铺设的。这表明,历史毕竟还是人创造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整风从解决思想方法入手,达到在组织上出现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事先难以料到的。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出现这样的结局却是经过多年准备、意料之中的事。毛泽东对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领导班子早就不满意,这是人所熟知的事实。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王明意欲在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职务,毛泽东便有所警惕,而王明在此之后种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更使毛泽东和延安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满。毛泽东甚至认为“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②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时,就严厉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上出现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即宗派主义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批判了张国焘从小组织活动发展到反党反中央的行为。在这个会上,中央还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思想。但是,尽管有进行组织调整的必要性,但那个时候一是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还没有出现后来那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4页。

② 杨奎松:《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恩恩怨怨》,第76页。

样的逆转，二是人们的思想认识还不统一，因而组织上的调整还不像后来那样迫切，还不可能发展到涉及领导体制的调整。毛泽东在写作《〈共产党人〉发刊词》时，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这里不能不包括他对组织问题的设想。尽管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组织上的调整，但在那个时候，就说毛泽东已经有了调整的具体方案显然为时过早。1941年九月会议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特别是王明说他与周恩来在1931年秋离开上海时，安排博古、张闻天等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组成临时中央时，曾交待他们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但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并没有交出权力。^①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注意。再加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临时中央到苏区后的所作所为，中央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作风，不能不使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尽管整风学习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但毛泽东在整风动员时就毫不留情地猛批宗派主义。当整风学习转入反对宗派主义的时候，组织的调整就是必然的了。而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出现的困难局面，又辅证了进行组织调整的必要性。历史进程中的人为设计与事态发展在这里显示出惊人的吻合。唯一的解释就是：人的主观认识一旦符合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能够把握和利用这个规律。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党的建设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能够把握创造历史的机会。

反宗派主义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中央在进行反对主观

^① 参见周国全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7—128页。

主义学习阶段就已涉及到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如任弼时在中央党校讲解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时，就宗派主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需要指出的是，在反宗派主义的学习中，党中央除了以大力批判表现为在党内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外，对表现在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也给予了极大的注意。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非始自延安整风，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时，他就再三地指出团结广大非党群众的重要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他又多次阐述这个问题。党所制定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在政权问题上的三三制政策，都是为了尽可能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反对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①这种宗派主义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②为了团结抗战，不能不把反对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调节、改善党内外关系，毛泽东在1942年3月曾亲拟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后来虽然没有公开发出，但它的基本精神却在反宗派主义运动中体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这个决定草案中开门见山地说：“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是：除了汉奸及决心破坏抗战团结者外，一切阶层的抗日人员，不论是有党有派，或者无党无派，不论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是同情我党的,或者只在一部分纲领上愿与我党合作的,也不论是已经与我党共事的,或者尚未与我党共事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和他们一致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而奋斗。”^①毛泽东批评认为,全党在这方面虽然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党务、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他们不愿意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把党外人员看作无足轻重。他们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者自居。他们对于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他们对于政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执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②毛泽东在列举了宗派主义的这些表现后,又指出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绝无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毛泽东号召全党: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395页。

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及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

毛泽东在这个决定草案中还提出了解决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十二条办法。这些办法归纳起来大意如下:一是要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一切党组织与一切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解决。这其实是要求党组织从思想认识上和态度上重视这一问题。二是提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党组织不得指派未当选的党员去凑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其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的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这是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保证吸引、团结广大党外人员。三是在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党支部的任务是:对于党员进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员,保证该部门工作任务的完成。支部不得直接处理干预行政领导,更不得代替行政领导。在行政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行政的领导。在党外人员担任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应采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某些地方党政不分的现象,应该纠正。党员如有违犯行政法规者,应受行政处分;其错误涉及党纪者,同时须受党纪的制裁。但在行政关系上,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外人员,亦须服从上级行政的领

导。四是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要细心了解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尊重党外人员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习惯。五是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党报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在我党党报上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六是与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其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决不可采取缄默不言、听其积累或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态度。七是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学习上、物质上应给他们以真正必需的帮助。抗日根据地的机关、部队、学校中，党的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允许同一部门工作的党外同情分子到会旁听，并发表意见。抗日根据地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八是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党的组织部门内，设置管理非党干部的专门机关，担负对党外干部的接洽、登记、了解及照顾的责任。毛泽东还提出在党的保护健康委员会内，设置党外干部科，管理党外干部的保健工作。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各项规定，涉及思想上的关心、组织上的管理及物质生活、医疗保健等方方面面。毛泽东对处理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重视程度由此可充分显示出来。

经过反对宗派主义的学习,以及党组织在各方面的工作,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更加密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开明人士李鼎铭,以在党的历史上提出“精兵简政”政策而著称。但他与党的关系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李维汉回忆说:

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和这些中间人士的关系,一度搞得不十分好,把李鼎铭当客人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而他对是否有职有权,则非常重视。我在任秘书长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就在若干情况上发现了他的消极和不满态度。其一,他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总是很少发言。有时林伯渠问“李鼎老有什么意见?”他总答复:“俺没意见。”其二,有时政府行文,他不划行。其三,他同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人士之间,和同共产党负责人之间,亲疏不同。这三种情况,都表示党内外关系不好。我将这些同林伯渠讲了,林伯渠也有所感觉。经商量之后,林伯渠同意我采取下述方式去同李鼎铭开门见山、开诚布公地谈谈。某个晚上,我就专去会见李鼎铭,我说:“鼎老,我这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秘书长怎么当?!”我这样一说,把他头脑里积蓄已久的意见挑动了。他打起精神,与我谈了很久。他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命令、指示,要我划行,有的内容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

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我完全意识到,他确实把心里话说了。回来我就和林伯渠商量,也报告了党组。我说,党组当今应该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设法打破这种不正常局面。党组随即商定了几个改进措施:一、要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参议长汇报工作,我也参加;二、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他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三、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副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四、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一句话,要同党外人士民主相处。这样做,李鼎铭很高兴,态度完全变了。不作客人,而作主人了。不讲“你们党上”,而讲“我们团体”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他马上以主人翁的姿态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以后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副主席谈话,我们给他配备了翻译,就让他自己找去了。他在谈话间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安文钦本来是比较右的,但他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为边区说话,痛骂国民党。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我说这些党外人士同中外记者谈话,都有一个“边区立场”,这是一个很好的局面。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很好。^①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2—524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团结党外人员的工作中采取了民主合作、生活照顾、适当让步等措施,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涉及到党的基本政策问题,也坚持原则,开展适当的批评。这些举措有效地团结了非党工作人员。其他各根据地也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措施。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方面所采取的严于律己的态度和善待一切抗日的非党人士的措施,赢得了民心。延安《解放日报》于1942年9月6日发表范长江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观感,其中谈到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他说:“整风运动不但在共产党内发动了巨大的思想革命,在党外也引起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记者在大后方,亲眼看见不少其他党派人士,对此拍案叫绝者。根据地中不少士绅,因共产党整风而改变其对共产党所抱之传统看法。经整风运动之后,除党内必然发生划时期的进步外,对于团结其他党派及其他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必有极大开展。”^②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范长江的评价和预言是准确的。

如果说,学风阶段的学习主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对某些人的工作实际联系还不是那么直接,那么,到了党风阶段的学习就直接和所有人的工作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了。1943年6月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说,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

^① 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63—264页。

动坦白运动，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如能真正做好整风，真正审查好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①毛泽东是从大局出发来阐明整风运动各阶段之间的关系的，但也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即在党风学习阶段要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实践，更具体地说要在反省和思想自传中、在工作中体现出来。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转发新四军军部、山东分局、第一二九师、晋西北、重庆等，希望参照办理。

毛泽东在发这个电报的时候，延安党风学习早已结束。但延安各单位在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学习中，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普遍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反省。

在各单位的实际工作中，不同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反宗派主义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各地各级党的干部都在整风中反省了这一问题。如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于1942年9月15日至20日召开各区宣传科长整风学习讨论会，讨论反对宗派主义的六个文件。大家都反省了下乡以后知识分子干部和农民干部的关系问题，认识到只有对当地干部诚恳和尊重，才能亲密团结。其他一切如谦虚、客气、注意态度等都是次要的。如果只有这些次要的东西而缺乏出自内心的诚恳和尊重，反而感到拘束、虚伪、不自然。有些同志批评了知识分子的自我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7—208页。

优越感、过分自鸣得意和轻视群众的旧意识,介绍了这些旧意识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消失的过程。这种学习讨论对于提高干部觉悟,消除宗派主义的影响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毛泽东、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反宗派主义学习中,大家的反省更为深切实际。而通过这种反省,通过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每一个人在工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比如,在边区银行,过去有些同志不安心工作,有的认为长期在银行工作会妨碍自己的提高,耽误自己的前途;有的认为银行工作不适合自己的个性;有的业务部门的同志要求调到银行的教育和党的工作部门,认为那是“清高”的。在其他财政、经济、医院、工厂等部门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通过党风学习,大家的观念有了转变,认识到不安心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大家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于目前所处的工作岗位,也有了新的认识,即技术工作、财政经济工作也是革命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应以最高的热忱去从事它,提高它。这是真正从思想上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服从组织安排。由于认识上有了这样的飞跃,所以各部门都有了一种新气象,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业务蔚然成风。

作为整顿党风、增强党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反对自由主义的“小广播”也是整风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带着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到党内来的,因而容易产生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缺乏全局观念,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等等。这些问题与宗派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是交叉重复的。从思想意识

来说，自由主义与宗派主义一样，都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要解决党风不纯的问题，就不能不涉及自由主义的问题。因此，在反宗派主义的同时进行反自由主义的学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早在1937年9月，毛泽东就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产生自由主义的根源、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危害，号召大家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与自由主义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由主义者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对待，而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完全实行之。这种思想方法与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相通的。这也是《反对自由主义》何以会作为整风的必读文件，毛泽东在整风动员中并未提及的自由主义问题何以会成为党风学习中的重要内容的缘故。

在整风期间，自由主义还有其特殊的表现，即“小广播”。主要表现为不负责任地散布各种消息：有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等秘密消息与机密行动都泄露出去，破坏了党内有关生命的机密；有的人散布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甚至于“广播”对敌有利的谣言；有的人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有的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谣言，破坏党的团结；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制造反党谣言。中央总学委针对这种情况颁布了《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小广播”的通知》，指出“小广播”的现象流行在每个角落里。虽然在整风学习中许多同志自动向党揭发出来，但在许多机关学校中“小广播”尚未彻底清除。《通知》指出：“这种‘小广播’决不是

小事，而是极端危害党的大患，是党内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党员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甚至于是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如王实味等）。反革命分子正是依靠着这些人的‘小广播’进行反党宣传，特务人员正是依靠着这些‘小广播’取得党内秘密，取得‘合理流言’并作为反革命的掩护。”^①中央总学委号召各级学委严密注意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在反自由主义斗争中应开展的几项工作，如：号召全体党员对这种泄露秘密制造谣言的“小广播”群起而攻之，以促其觉悟，并须严整党的纪律，彻底肃清之；每个党员应深刻地反省自己与严正地批评别人；各学委会应把这种反省与揭发当作学习考试与学委检查的尺度之一；各机关应制发“小广播”调查表，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并向总学委报告；对泄露秘密造谣生事者，应按其性质程度之轻重给以处罚；对确有错误隐瞒不报者，应在群众中开展斗争使其觉悟；要认真进行秘密工作教育，定出秘密工作之条例与工作须知等规则，并建立经常的检查制度等等。

延安各单位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各项指示。延安大学举行了反自由主义的大讨论，由校长吴玉章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妇委、总政、电影团等机关的同志旁听。全校师生讨论了校风纪、群众利益、学习上的自由主义、工作上的自由主义、非组织批评等问题。讨论会还依据文件精神，把存在的问题与党性、思想方法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把少数工作人员的非组织批评、宗派主义倾向等都在会上揭发并加以讨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就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等问题，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以便进行彻底的检

^①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第 39 页。

查和反省。

反宗派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整风学习深刻地触及了每个党员的思想,带来了工作上的进步,改善了党员形象,从而使党的威信更为提高了。而党组织和党员在整风中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则感召了广大非党群众,使一般群众对党的向心力大大增强了,党与一般群众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如延安大学俄语系有一个非党学员写了一篇题为《我对党的了解》的文章,谈了她在整风前后对党的不同认识。她说:“我以前曾见过一些党的领导者,我很崇拜与尊敬他们,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英雄,那时共产党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为数不多的一些英雄所组成的集团,个个都是天将一般的能干!”可是到了延安以后,发现共产党有广大的党员,“这时我认为他们只是党员而已,决不是‘党’,我认为党还是由少数人组成的,与他们无多大关系”。半年以后,有人告诉她,党是具体的,周围每个党员都是她接近的对象。于是她注意起来了。可是,当她发现某些党员有缺点时,她消极了。“我成了旁观者,把党的问题高高挂起,自己抓紧学习,自己一切不对的地方以‘我不是党员’来解释,而对别人则以‘你是党员’要求非常高,不去了解教育党员的长期性和困难”。整风学习开始后,她有了新的认识,说:“由于理论上的教育,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使我更客观地去看党,了解了应从政治上去测量党,个别党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表现,并不能就是代表党的。因为有些党员是从旧社会出来的,有些不好的习惯的残余,而且每个人的锻炼不同,决不能每个人都像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那样健全。”她认识到个别同志有缺点,不能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而应当站在爱护同志、爱护党的立场积极提意见帮助他。她在最后这样写道:“我认识了:‘组织就是力量’,懂得了自己既

然已经确定了终生奋斗的目标，那么，再采取第三者的态度，不去积极地增加党本身的力量，是不好的。”^①这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对党的认识过程，显示出了整风的力量。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与个人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的整顿党风取得了超出于党内的成果。

二、西北局高干会旨在“七整”，毛泽东说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是圣经而不是教条

延安的仲秋已是凉意袭人。到了冬天，塞外寒风更将黄土高原吹得绿意难寻。大自然全然不顾人类的喜好，依着自己的规律演进着。

以整风为形式进行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循着自己的规律继续开展下去。尽管陕北的秋末和冬天并不那么宜人，但整风的势头却毫无收敛、倦怠的迹象。相反，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恰与逐渐变冷的气候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各单位整风学习硕果累累的情况下，西北局召开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高级干部会议，其主要意图是在整风形成的大好形势下，达到“七整”：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政、整学。这是西北局为会议所规定的任务。

在整风过程中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有其必要的原因。就其历史原因来说，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历史上有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但却未能深刻地总结其教训。就其现实原因来说，陕甘宁边区在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面，与它在全国抗日根据地

^① 上述引文和相关内容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277—278页。

中所处的地位,还有一定的差距,党、政、军等方面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协调。在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上,也还存在着不同意见。解决这些问题,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在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上统一行动,是这次会议的任务,也是整个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样,这次会议就成为整风运动的必然产物了。

西北局高干会(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历时88天。

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之多,在当时也是空前的。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县团级以上干部约3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会议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工作时,还邀请了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干部参加。会议按五个分区分为五个小组,除开大会外,必要时还召开小组会议。

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在一个区域性会议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的酝酿、准备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本书前述高岗、林伯渠等人所作的大量调查,实际上是为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准备的。党中央、毛泽东曾几次研究这件事。毛泽东不但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两次重要的报告,即《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讲演和长达十多万字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个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央对这个会议的重视程度堪与党的某些全国性的会议相比。

党中央、毛泽东所以重视此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战争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各方面工作影响到全局。其次，陕甘宁边区是中央所在地，汇集了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大批的干部，中央各部门、各机关与边区党组织、政府的部门、机关同时并存，中央各单位与边区的关系，边区党与政府关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问题，都是需要妥善解决好的，否则，将会给边区甚至全党带来巨大损失。由于上述两点，所以就有了第三点，即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一向极为关注，为缓解、协调边区党与政府的关系，毛泽东甚至亲自调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胡乔木说毛泽东确实有点像把边区当作自己的“亲儿子”，非常爱护。^①这表明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有深厚的感情。

由于各种综合因素的结果，就使这次会议成为整风运动中引人注目的大事。而会议在有关方面领导的关注下，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待，解决了争论不休的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领导和当前主要任务这三大问题，因此又成为整风运动转入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先声。

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的发展经过了许多曲折，留下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但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在作主题发言时并没有具体涉及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他只是从整风的角度，从全局出发来谈这次会议。毛泽东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国际国内形势问题。毛泽东指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经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页。

这是件大事情。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去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的“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战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那时也有国内战争的可能性。

二是关于整风的问题。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了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的一些人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如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决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

三是关于边区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民、整党、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①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

^① 毛泽东此处所说的“七整”，与前述西北局所说的“七整”，在具体内容和顺序排列上有所不同。

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关心的,还是抗战大局,是影响到全局的现实问题。在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中,他最重视的是与实现党的领导有关的问题。这当然与他所处的全党的领导地位有关。他所说的这些问题,无疑是会议的大方向。对于一个地方性的会议——尽管陕甘宁边区有极重要的地位——来说,无论怎样商讨那些带有地方色彩的问题,都不能偏离这个大方向。

大会从10月21日起,由陈正人作整党问题的报告。而整党的基础,在于思想上的一致。由此便不能不接触到边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大争论。

参加高干会的同志中,有许多人是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在讨论整党报告中要求用整风精神来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就连一些对边区历史不熟悉的同志,因整党报告中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统治过边区,也希望弄明白这些问题,以便有利于今后的工作。

由于与会代表的呼声强烈,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意见,认为在这个时候开展这样的讨论,是既有利又无弊,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的。于是,从11月2日起,整党问题的小组研究一变而为大会讨论,几百人的积极性马上高涨起来。在长达十几天的历史问题大讨论中,人们集中精力,以极高的责任感逐一审阅着至关紧要的几页历史。

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悠久。这种悠久的历史既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光荣的传统,也给人们留下了不易梳理的历史结节。

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陕

甘地区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而斗争。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刘志丹、唐澍、刘继曾领导了渭华起义。上述起义和陕西地区其他一些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西北红军的英勇斗争,不仅吸引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长征,而且保存了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的红军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但是,在此期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西北党内在革命形势、土地政策、军事战略等许多问题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1933年12月11日,在北平西城平安里公寓召开了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肯定了陕北特委的成绩,批评了陕北党内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对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等等。会议对陕北特委不切实际的批评,种下了错误“肃反”的根苗。

1935年7月5日,北方局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达陕北根据地。代表团坚持“左”的观点,不作调查,偏听偏信,使“左”倾错误在陕北逐渐占了统治地位。7月15日,代表团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信和军事指令。信中指责“陕北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它的阴谋已经暴露”。当时党的刊物认为“永坪会议是陕甘党最布尔什维克的一次胜利的会议”,是陕甘党“转变到最后走向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开端”。不同意这些“左”的错误的刘志丹等人,被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一场排斥异己的“肃反”在当时已是硕果仅存的陕北根据地展开了。他

们先是将刘志丹排斥出领导核心，接着又用严刑逼供的方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把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干部逮捕起来，进行残酷斗争，并杀害了 200 多名党政军干部。错误“肃反”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根据地的群众惊恐不安，少数干部开始动摇；兄弟部队之间互相猜疑，互不信任。西北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后，听取了关于“肃反”情况的详细汇报，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中央派王首道、刘向三和贾拓夫接管西北保卫局，把局势控制下来。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又决定组成以董必武为首的解决“肃反”问题的五人组，在经过全面调查研究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推倒了强加给刘志丹等人的莫须有的罪名，释放了被关押的同志。11月11日，为这些同志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

但是，尽管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了初步的结论，但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那时的结论中对“肃反”的性质，在认识上还有局限性。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审查。1942年4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入西北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

边区党政军民的负责人，曾参加开创边区斗争的老干部

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相继发言，举出种种事实说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革命工作，危害党内团结和党同群众的联系。一些曾经执行了“左”倾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某些同志之所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从思想方法上看，主要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不是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上级的指示出发，从脑子里想象出发。多读了几本上级的决议和教条就自满起来。没有认识到理论是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没有注意在斗争中向陕北人民学习，向他们的领袖学习，成天只是读文件，根本不懂得调查研究。因此在认识事物方面就看不到事物的区别性和矛盾性，认为地主、富农、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党都可以划等号。认为北方等于南方，陕甘等于陕北，因此也就认识不到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认为革命应该一直向前发展，中间不会有低潮；轻视经验，觉得只要理论学通就够了。

从组织上分析，主要是实行了宗派主义的路线，对同志采取的是打击政策。因为不打击就不会使下面许多真正服从真理的同志执行错误路线。不信任本地干部，看不起本地人民革命斗争中创造出的领袖和干部。

从党性的高度来看，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为陕北人民服务的观点，只想完成上级的使命，替自己建立功劳，因此在工作中急于求成，毫不戒骄谨慎。见到各个苏区都有“肃反伟大胜利”，因此也急于在陕北搞一个“伟大胜利”。这种路线执行不通，便不管组织原则，采取硬办法，强迫执行而毫不反省。

大会主席团还将刊有“左”倾错误内容的历史文件摘要翻印，以便大家在联系对照中分清是非功过。会议经过充分讨

论,肯定了刘志丹等执行的正确路线,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边区的严重错误。最后,由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

高岗在结论中分析了西北近 20 年的社会政治历史状况,对于过去的争论为什么说是路线争论,为什么说错误路线不懂得中国和西北的实际情况,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为什么说一个错误路线必然会对党、对人民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与罪恶,为什么个人野心与人民解放事业绝对不能相容的道理等等,作了详细的说明。结论还勉励过去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同志切勿自满,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希望革命知识分子多深入基层,和工农兵相结合,以免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任弼时在大会的讲话中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党内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大。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委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的“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路线。中央重新审查 1935 年 11 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委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会议的检讨和结论,中共中央于 1942 年 12 月 12 日正式颁布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

定》。《决定》正确地总结了陕北党的历史经验，重新审定了1935年11月陕北党组织对此问题的结论。就此，中央对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了结论。

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第二重大成果，是分析了当前陕甘宁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

从11月24日起，大会讨论转为集中批评当前工作中的偏向，主要解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军阀主义等。这一阶段几乎长达一个月。讨论的结果是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建立边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不能不涉及到党政军民等各方面的关系。而边区在这些关系上也曾存在一定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7年成立，林伯渠担任主席。1940年谢觉哉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主要领导人是高岗，他从1938年4月以后，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伯渠、谢觉哉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并且在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毛泽东对他们十分尊重。而高岗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泽东把他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毛泽东曾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①

边区政府与西北中央局的关系从大局上讲合作是好的，但在某些工作中，主要是经济政策上，像如何看待减轻民赋问题、政府带有一定强制性运盐政策、政府预算、纸币发行等问题，双方有一定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为协调双方关系花

^①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8—139页。

费了大量心血。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如果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发生分歧,向来把主要责任放在外来干部身上。但林伯渠、谢觉哉又是毛泽东极为尊重的长者,因此毛泽东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委婉的言辞,多次写信给林、谢二老,并面谈数次,以期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941年给林、谢二人的信中说,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货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信中建议他们“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就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信中还说:“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①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又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好。好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毛泽东还叮嘱谢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毛泽东不久又写信给谢觉哉强调:“大家都希望统一一致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统一行动纲领,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4—315页。

否则无法统一。”^①

在给政府方面的同志做工作的同时，毛泽东也给西北局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如他曾给高岗和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写信，把谢觉哉的信和安塞来的报告附上，说：“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是否有此类调查？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②

为了协调边区政府与西北中央局的关系，1942年9月1日中央颁布在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后，毛泽东决定把李维汉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毛泽东为此与李维汉在枣园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主要有五点内容：一是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二是要精兵简政；三是要发展生产；四是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五是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毛泽东还对他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③此意在于强调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应起带头、示范作用。

毛泽东为协调好边区党政关系，真可谓用心良苦。

边区的军队与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一度也出现了问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7、31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8页。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99页。

视总体利益,工作中有第二党、第二政府等倾向,也受到严肃批评。在会议上发言的总共有70余人之多,从县团级干部,直至边区的许多高级干部,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贺龙、徐向前和萧劲光等,对军队所作的自我批评尤为深刻。如果说,对于历史问题的讨论能体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宽阔胸怀,但许多问题毕竟已经事过境迁,受批评的同志现在已经不负重要的工作责任了,那么,对于当前问题的讨论,对现在仍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的批评和他们所作的自我批评,则更能展示共产党人不掩饰自己错误的特性。会议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与会者感到振奋。参加会议的独一旅旅长高士一说:“参加这次大会是最彻底的整风,不但脱了裤子,还洗了澡,擦了背,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暴露了,都医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宝贵的教育。”^①

对当前主要偏向讨论的结果,就为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西北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党的领导体制问题的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在军民关系上,大会决定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由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提议发起拥军爱民运动。会议还决定重新登记党员,把不可挽救的分子清洗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在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会议还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这是第三个成果。

从1938年以来,党中央、毛泽东就很重视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特别是在日军进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攻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加紧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出现极大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再提倡大力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使人民丰衣足食。事实上，为解决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据 1941 年的统计，边区农业、畜牧、纺织、运盐、合作等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军队的经费有 60% 至 80% 达到自给，机关学校的经常经费有 57% 至 90% 可以自给。

为了解决过去在经济问题上的争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向西北高干会提交了长达十多万字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李富春写的，里面的许多材料也是由李富春等搜集的。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也付出了许多心血，添加了许多分析。这个报告代表了毛泽东的观点。报告共分十章，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生产事业和粮食工作等多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那种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思想，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他提出了“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了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强调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他说：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否则就会军民交困，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必须以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

攻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加紧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出现极大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再提倡大力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使人民丰衣足食。事实上，为解决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据 1941 年的统计，边区农业、畜牧、纺织、运盐、合作等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军队的经费有 60% 至 80% 达到自给，机关学校的经常经费有 57% 至 90% 可以自给。

为了解决过去在经济问题上的争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向西北高干会提交了长达十多万字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李富春写的，里面的许多材料也是由李富春等搜集的。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也付出了许多心血，添加了许多分析。这个报告代表了毛泽东的观点。报告共分十章，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生产事业和粮食工作等多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那种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思想，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他提出了“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了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强调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他说：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否则就会军民交困，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必须以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

是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和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伤着的。

这篇《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作了传达。报告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的报告一扫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并使原来觉得经济问题没有味道的人感到这个问题引人入胜了，使原来觉得经济问题没办法解决的人感到可以左右逢源了。与会代表无论是在大会发言中，还是在小组讨论中，都踊跃发言。

朱德是大生产运动最热心的倡导者，他向大会特别指明了军队重视农业生产的必要，非常生动地告诉大家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的经验和1943年的计划。他指出，在边区这样的条件下搞生产，不但为我们自己解决了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将来全国的军队，都可以效法我们的样子。此外，他还就发展农村副业、水利、畜牧、运盐、生产合作社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贺龙在《整财问题报告大纲》中指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还说，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不是夸夸其谈地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

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地指出如何实现的方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聚论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

参加讨论的党外人士李鼎铭说:“我看了毛主席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我是非常满意的。这个文件全是从实际出来的,没有一句空话,所有他提出的东西,某些能做到的,某些不能做到,他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也不能另外加什么话了。”他表示拥护边区推行的屯田政策、移民政策、运盐政策等。对于减租减息政策,他说:“在今天的抗战环境下,要叫农民有很大的兴趣种地生产,必须要他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所有实行我们的号召减租减息,我们就一定保证交租交息;如果不实行减租减息,那我们也不保证交租交息。”^①

其他参加讨论的党外人士如绥德县长霍祝三、米脂县长马继堂,都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财政经济方针。

会议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边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而在这两项中间又以生产更具有决定意义。这就为陕甘宁边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经济问题讨论结束前,大会又特请刘少奇、任弼时作了三天讲演。刘少奇在讲演中指出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因为领导者不能以限于努力工作就算尽职,还必须善于掌握领导艺术。他详细说明了什么是领导艺术和今天党内许多同志在领导工作上的弱点,还详细介绍了华中减租减息运动的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05页。

经验，对大会影响很大。任弼时则尖锐地提出了在边区党政系统反官僚主义倾向和在军队中反军阀主义倾向的问题，指出过去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导作风必须迅速转变为完全适应于今天新时期的新作风，否则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

为了提高干部对于精简工作的认识，鼓励干部努力工作，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闭幕式上，西北局给近年来领导经济建设及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显著而又克己奉公，在群众中有威信干部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第三五九旅供给部长何维忠、供给部政委罗章，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四科科长胡起林，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健章，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人授奖。而对第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和县政府以及延安南区合作社三个单位予以奖励。毛泽东还分别为所有授奖的同志和单位题词。

如果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上述三大成果，都是实践中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于1942年11月21日、23日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的报告，则为这次大会增添了浓重的理论色彩。这次会议能够至今还被人们关注，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这个报告所具有的内在力量，那是一种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上的影响。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论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塞维克化》一文中提到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作了详尽的解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讲演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拿我们全党来说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说应该这样看，我们是向着布尔

经验，对大会影响很大。任弼时则尖锐地提出了在边区党政系统反官僚主义倾向和在军队中反军阀主义倾向的问题，指出过去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导作风必须迅速转变为完全适应于今天新时期的新作风，否则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

为了提高干部对于精简工作的认识，鼓励干部努力工作，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闭幕式上，西北局给近年来领导经济建设及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显著而又克己奉公，在群众中有威信干部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第三五九旅供给部长何维忠、供给部政委罗章，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四科科长胡起林，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健章，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人授奖。而对第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和县政府以及延安南区合作社三个单位予以奖励。毛泽东还分别为所有授奖的同志和单位题词。

如果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上述三大成果，都是实践中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于1942年11月21日、23日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的报告，则为这次大会增添了浓重的理论色彩。这次会议能够至今还被人们关注，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这个报告所具有的内在力量，那是一种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上的影响。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论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塞维克化》一文中提到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作了详尽的解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讲演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拿我们全党来说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说应该这样看，我们是向着布尔

塞维克化。要使布尔塞维克化我们党实在有多少条件？具备了多少条件呢？一般地说我们是布尔塞维克党。中国共产党经过 21 年的斗争，可以说是布尔塞维克党。从她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塞维克党，但是要讲到化，什么叫“化”呢？“化”就是彻底得很，就是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塞维克。拿这个标准来说，完全布尔塞维克化，现在我们还差，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党的实际状况，对十二条逐条进行诠释，思想丰富，语言生动，使大家很受教育。^①

毛泽东所阐述的几个有理论意义的观点是：

（一）党是领导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

斯大林在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时所列举的第一条说：“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也不能成为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加品——如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对于这点所反复说的那样，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着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自治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②

毛泽东在讲解这条时，主要阐述了党与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关系。他指出，现在拿我们各个根据地来说，我们有政府，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民众团体，党就是领导政府、领导军

^① 毛泽东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讲解主要资料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12—414 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08—211 页；房成祥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169—171 页。

^② 《整风文献》，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 年版，第 247 页。

队、领导民众团体的。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还有党务工作。整理党的组织整理党务工作的目的,就是为着把政府搞好,把军队搞好,把民众团体搞好。我们做的党务工作里头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要把干部工作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不是军队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大多数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的干部以外,十分之九是军队干部和在政府、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因此做党务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搞军队、搞政府、搞民众团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把这些搞好,才好跟敌人作斗争。毛泽东联系到当时存在的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指出,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你这个党就管你们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你少管一点,我的军队你少管一点,我的民众团体你少管一点。从少管到不管,从不管到反对,如张国焘,他不要党管,他自己搞一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闹独立性”,自己有军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中央。另外,就是抗战中有这样的同志,中央的命令他不执行,或者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这些在军队里也存在。合我脾气的我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口里没有公开讲不服从,但心里却这样想,做起来是这样做。在边区党政军民关系上,就有这样的现象,党的意志、决议不能够执行。比如在党政军民关系上,军民合作相当长期不能执行,没有法子贯彻执行,是一个严重的原则性的问题。政府的工作,政府执行的政策,应该符合党的政策。群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也要符合党的政策。针对过去对党的概念含糊不清的现象,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党,我们所谓党是指一切党员。党是由党员组成的,一切党员就是党的组织,我们要承认这一次大会上调整关系的决议案,承认党是一切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以外的其他组织,通过它的党员,一切都要归党的领导。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讲解斯大林所说的第二条“必须使得党、特别是它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时，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对待这种残余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态度，一种是向他们作斗争。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毛泽东还结合党内的现状，指出过去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就容易犯自由主义倾向。这次会议上就反映了很多对待过去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为了克服自由主义倾向，毛泽东鼓励全党同志要多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多进行理论学习。他号召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十本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可以分几等学习。他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实行，就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要有进步，我们的布尔塞维克化就能化得更好。毛泽东建议说，在这次高干会议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个学习，看书能看进去的同志，能看懂的同志，我们要有这样的目的：一个人选择十几本书，认真地天天读，一遍一遍地读，在职的三年为限，学校的十个月为期，一定要实行斯大林讲的这第二条，实行这第二条，使我们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如果不然，不

能讲我们就是布尔塞维克化了。

(三) 只有群众的实践是检验党的决议、政策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尺度。

斯大林所说的第三条是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不是根据熟读了的公式和历史上的类比,而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第四条是讲“必须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讲解时首先指出第三条是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接着,毛泽东在讲解第四条时,阐述了他的一贯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他在这里讲话,决不能说他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有长远意义的。

(四) 反对党内“左”与右两种错误。

斯大林讲的第五条是说必须使党的全部工作改造过来,建筑在新的、革命的步调上,它使得党的每一步骤和每一行动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群众革命化,走向在革命的精神上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塞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也

要反对过左的错误。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是阐述了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

(五) 革命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

在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中，第六条是说：“必须使得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要把这与宗派主义相混淆！）和与群众的最大限度的联系及接触（不要把这与尾巴主义相混淆！）相配合。不然，党不仅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仅不可能引导群众和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推知群众的迫切需要。”第七条是说：“必须使得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要把这与革命的冒险主义相混淆！）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不要把这与迁就行为相混淆！）相配合。”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这些思想作了重要发挥。他说，在对待群众工作上，这就是既要教育和指导群众，又要最大限度地和群众接触，并向群众学习；在处理统一战线关系上，既要讲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要讲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妥协性，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毛泽东还说，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毛泽东又举彭湃为例说，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出身地主，是个大学生，后来又做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但为了做农民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农民把他看成自己人，听他讲革命道理，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他本人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毛泽东说，这里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

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行为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六) 对党内不同错误的性质要区别对待。

党的历史上有许多人犯过错误,有思想错误,有路线错误,派别活动等等,各种错误的性质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错误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党对不同性质的错误没有给以适当的区别,导致在党内斗争方式上采取单一模式。用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话来概括这种情况,就是对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毛泽东指出,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还指出,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致死。胡乔木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为这是建国后提出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的萌芽,说“有了过去沉痛的

历史教训和这样明晰的思路，在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毛主席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的必然了”。^①

（七）从组织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毛泽东还对斯大林所说的党要不怕批评、选拔优秀分子进入领导核心、消除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建立铁的纪律等问题，作了相应的解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对于领导核心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对于腐化分子，毛泽东说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关于纪律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对于斯大林最后所说的党应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说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检查。这次高干会也算是一次大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这些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发挥，也是对当前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指导。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提出的这十二条，说这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并把它称之为我们全党的“圣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1页。

经”。但他紧接着又强调指出：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这一思想与上述对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的阐述，同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性原则。

在长达 88 天的会议过程中，与会代表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但与会代表每天散会后，仍在灯光下、炭火旁议论纷纷，欲罢不能。其原因一是在于会议所解决的问题都是每个人所深切关心的问题，二是在于会议充满了民主精神，人们用整风精神开展了认真而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这样的会议，不能不对今后的实际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各县都先后在党内外干部中传达了会议精神。据《解放日报》记载，1943 年 1 月 29 日，西北局邀请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任职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贾拓夫向他们传达了高干会议的精神。他们听了传达后，一致赞誉高干会议的成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我对高干会这些决定，觉得很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对会议所解决的问题作了简要的概述，盛赞会议取得的成果。

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边区的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陕甘宁边区各单位着重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自由主义

与教条主义倾向。参加整风的干部把中央文件和高干会议的精神同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联系起来，以贯彻统一领导的原则为主，清算自身在贯彻统一领导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纠正和克服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政策和上级组织闹独立性的现象。随后，各级组织根据会议提出的“七整”精神，以抓好精兵简政和发展生产为重点，深入地进行整风。会议的精神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落实。

三、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倡导“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3 年来临时，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全党普遍整风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已开始整顿文风。

作为对新年的庆贺，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干部晚会。千余人齐集新建成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庆祝新年团拜会，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毛泽东、朱德参加晚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新年的献词。

在辞旧迎新的时候，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整风运动的进展。

毛泽东第一次显示出他在整风中的领导特色，即相信群众，给群众一个机会彻底抒发意见。1942 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这番话最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这

也可以说是由群众帮助整党的发端。在以后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中,都沿袭了这一做法,称之为“开门整风”,或“开门整党”。著名的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最初也是以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开门整党更是风行一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做法是否会出现偏激,是受整个政治环境、政治路线制约的。作为一种帮助党整风的形式,在延安整风的年代,它还是起到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作用。

毛泽东对整风的领导方式,是与他民主的理解、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观点的理解分不开的。事实上,毛泽东就是把整风当作群众实施自己民主权利的体现。当他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乡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时,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毛泽东由衷地为此而兴奋。

整风运动带来的新气象,使毛泽东更加充满信心,要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已于1942年12月18日向各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说,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通知》要求各学习委员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文件的精神来学习文风文件。整风学习已结束的单位,要重新研究,没有学完的要深入学习。《通知》还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

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论文、文件、指示、报告、演说、会议、谈话、教课、文艺、整理笔记、工作方式等），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

整风运动携着庆贺新年的喜气声势浩大地进行下去。

毛泽东一直认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藏污纳垢的地方。如前所述，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激昂而生动地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指的是民族形式。毛泽东在整风动员时更以辛辣嘲讽的口气开列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说它“祸国殃民”。^②毛泽东要求每个人应该分析自己的情况，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朋友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遵循毛泽东和中央总学委的指示，各单位继续开展整风学习。如庆阳陇东中学为了彻底整顿文风，以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召开了反对党八股漫谈会。会前教员互相观摩教学，研究讲授方法和给学生批改的试卷、日记及个人写的文章，把研究心得写成笔记，然后在会上讨论。再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学习委员会于1943年1月9日正式决定重新学习文风文件。这次学习的重点放在检查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大家根据文件的精神，检查自己是否有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话不看对象,在笔记、发出的公文和文章中是否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问题,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否有“老一套”的作风,在对内对外接谈问题时,是否有“打官腔”的现象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文风学习开始时,有少数人认为这是写文章的人的事,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又不做领导工作,因而对文风学习的态度比较冷淡。为了纠正这种认识,校学习委员会采取了深入动员、出版《文风》报的方式,说明党八股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同是一家,同时要求每个人把反对党八股的文件和工作(如教材、工作、报告、会议发言等)联系起来,进行反省。有的单位还把学风问题与反对自由主义的学习交叉进行,如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剧团,在出发途中,于百忙之中抽出半个月的时间召开反对自由主义大会,每人轮流反省,大家相互提意见。

从上述各单位文风学习的情况可以看出,整顿文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文风学习与学风和党风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党八股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是教条主义的问题,党八股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所以,很多单位的文风学习实质上是与学风、党风、反自由主义问题的学习交叉进行的。

由于有了学风、党风学习的基础,所以文风学习无论是在学习的组织上,还是学习方法的掌握上,或是反省、讨论,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到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委便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就此,延安普遍整风学习已接近尾声。

毛泽东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不断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解决整风中易于出现的偏差。他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一点请你注意着,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一些,某些是

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①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党风学习应着重反自由主义，还说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这对于各地从学习内容、方法上把握整风运动的进行，是有很大益处的。

1943年2月1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林枫、朱瑞、罗荣桓、饶漱石，指出：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二）在哪些干部中收获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上级？（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领导学习之事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他们“速复为盼”。^②

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整风学习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各地也在自己的特殊

^①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第63—6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7页。

环境中整顿党的作风。

重庆的红岩,本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地方,但因其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所在地而成为著名的革命遗址。而一部以“红岩”为名的反映重庆地下党斗争的小说,则使这个地方名声大噪。

与抗日根据地相比,驻扎在红岩的南方局所处的环境更有其特殊性。南方局地处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整风学习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嚣张,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连遭破坏,南方局和所辖各省党组织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进行的。在这种危困状态中,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了南方局的整风运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学风、党风、文风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了学习和反省。

在1943年新年过后,南方局就开始了党风学习,除了学习有关文件外,还讨论了入党条件和手续、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干部的标准、党的干部政策、民主集中制和纪律等等。学习委员会还组织了五个专题报告。周恩来在这一阶段的学习开始后作了《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深刻总结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不久,又作了《我党六届五中全会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总结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孔原作了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董必武作了关于学习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待人接物交朋友等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对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水平,把整风学习引向深入起了很大作用。党风学习直至5月中旬结束。

南方局的文风学习从5月中旬开始至6月中旬结束。这一阶段着重学习讨论了新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学习委员会邀请华岗作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报告,

郭沫若作了《文艺上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报告。潘梓年、夏衍、徐冰、胡风等讲了党的文艺政策问题和有关文艺方面的专题报告。

南方局的学习不仅在局机关进行，而且还扩展到下属的各省及“据点”负责人。那些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而与南方局失掉联系的党组织和党员，虽身处险境，自身安全尚难保证，但从南方局所办的《新华日报》中得知全党正在开展整风运动，便千方百计找到一些学习文件，认真地组织党员学习，检查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革命意志。如潮梅和闽南两个特委在遭受破坏后，遵照上级组织的指示停止了活动，隐蔽起来。这两个组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组织党员骨干上山下乡搞埋藏生产的同时，还开展了整风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加强党性、纪律性和革命气节。广西省工委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南方局完全失去了联系，处境非常艰险。省工委书记一直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抓紧一切机会向党员进行教育。当他于1944年春通过党员和社会关系得到整风文献后，立即组织省工委和附近的党员进行学习，并结合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种在危困环境中的整风学习，实令许多人难以理解。这种举动，实实在在体现了一种追求真理、为信仰而舍弃个人利益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是南方局的领导人，更是党内老资格的领导人，但他在整风中充分信任并依靠广大党员来进行这场思想革命。他既是整风学习的领导人，又是整风学习的普通一员，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在整风中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其要旨是：“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

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①周恩来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度过的,但他在讲解党史时,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在过去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不少干部因此而深受启发。如有一个贫农出身的报社干部,有两个突出的缺点,一是看不起知识分子,二是不重视比自己入党晚的干部。他在周恩来严于律己的精神感召下,剖析自己,很快放下了自负的包袱。周恩来还以其惯有的关心他人、循循善诱的风格帮助其他同志。在一次小组会上,一个干部在发言中用了几句文言和成语,就有人批评他的发言是教条主义、党八股。周恩来立即指出,这种批评不正确,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更不能形而上学地去对待党八股、教条主义。他指出这个干部在工作中能以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说成教条主义。他教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贵在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南方局的整风始终没有出现偏差。

“红日照耀在太行山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首歌曾使无数青年听后为之感动,他们怀着一腔热血奔向高高的太行山麓。

太行山,那里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那里是中日交战异常残酷的地方。侵华日军无数次的“扫荡”使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难以计数的抗日青年血洒太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造就了大块的无人区。八路军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发生于此，日军的“铁壁合围”、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式“清剿”战术也在此“修炼”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殉难于此，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葬身于此。太行山凝聚了太多的故事，整风的记述也不可能不在此落上一笔。

还在1942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同时，就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兼组织部长。12月23日，北方局发出《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根据上述指示，太行分局于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邓小平以整风的精神对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2月20日，邓小平作了会议总结，要求整风运动在1943年认真开展起来。他在总结中还对一些与整风有关的重大问题作了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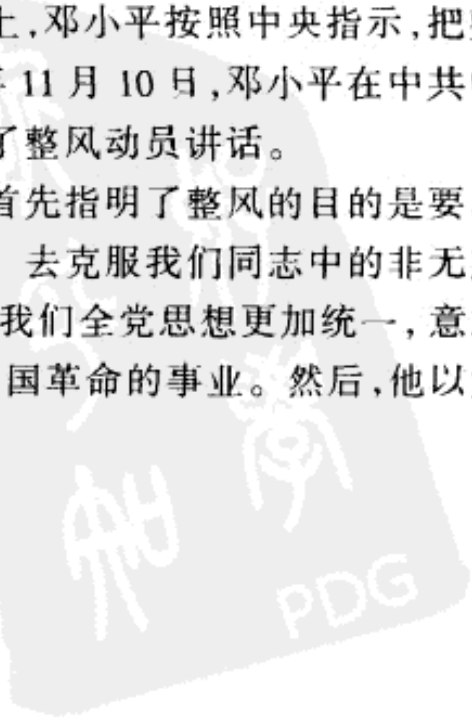
邓小平在谈到根据地建设规律时重点阐述了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他说：一个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相互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他还指出了这四种力量的关系：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

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他还就群众运动、统一战线、党与群众团体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温村会议对太行根据地今后的斗争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整风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会后，太行分局发布《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计划》，决定军队、地方所有干部必须参加整风学习。在职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专员、县长、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轮流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然后回到岗位领导在职干部整风。同时成立整风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

1943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太行分局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在新的岗位上，邓小平按照中央指示，把整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同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首先指明了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然后，他以大部分



篇幅来阐述整风的必要性。他回顾了党成立以来 22 年的历史,指出我们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他又以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形为例,指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 9 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他还进一步联系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存在的问题来阐述进行整风的必要,说提出整风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等歪风在今天不占统治地位,这是对全党来说的,我们自己就不应原谅自己,以为自己只有残余的歪风,值不得那样严重地重视与警惕,事实上对许多同志说来,就不只是残余,有的还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占了自己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些歪风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区域少一点,有的多一些,有的还是歪风占了统治地位,致使那个区域遭到失败(如山东的湖西地区)。总之,不管哪个区域,哪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①

邓小平针对过去一年整风没有深入开展起来的情况,指出这主要是在领导上对整风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抓得不紧,办法想得不多。他要求在这次党校开学的同时,全太行区开始整风运动。首先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0 页。

要采取一些具体办法。他向参加这次党校整风的同志提出了几个意见：第一，要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第二，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第三，要与检查工作联系。第四，整风中思想上会有压力，要鼓励他把心中的一切讲出来，以便大家帮助。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如他一贯风格，实事求是，简明扼要。

在北方局和邓小平的具体部署下，北方局下辖各区域的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中共太行区党委依据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和分局整风经验，于1943年10月制定了《关于今明两年完成全区整风任务及目前阶段计划》，提出由党委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采取“机关整风学校化，学校整风机关化”的方法，由区党委开办县级干部整风班，各地委举办区级干部整风班，有些县委举办村支部书记和少数区委的整风班，部队干部除了参加区委党校学习班外，多数参加太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举办的整风学习班。区委党校从1943年11月到1946年3月办了三期干部整风班，同时在涉县温村办了报社、文联、干校、联中、工会等单位的整风班，在索堡办了边区政府、工商局、交通局的整风班。温村、索堡两个班分别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党外干部参加。

太行区的整风学习始终保持了民主的气氛，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对领导的不同意见或批评，互相争辩、探讨。领导者引导大家多思考，而不是“我打你通”，更不能以大帽子压人，或以空洞的道理去说教，而是启发大家思考争辩，深入学习文件，个人思考问题。在系统反省和总结阶段，太行区要求党员干部按照党的干部标准系统检查自己，党外干部

也要较为系统全面地对自己作出总结，严格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原则办事，使大家心情愉快地“放弃旧我”，“树立新我”，愉快地返回工作岗位。

冀鲁豫边区地处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的三省结合部，其干部也来自四面八方。搞好整风，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对于冀鲁豫边区有切实的意义。

边区党委总结了1942年整风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边区的整风学习应着重于提高学习质量和解决学与用、言与行一致的问题。1943年3月15日，区党委宣传部发出《一九四三年四月至八月边区干部五个月学习的通知》，规定4月份以整风精神学习边区高干会决议，5月至8月全区展开整风学习运动。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前段主要学习学风部分，以反对主观主义，清算边区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段主要学习党风部分，以反对宗派主义；后段主要学习文风部分，以反对党八股。5月5日，区党委宣传部再次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空谈、不联系实际与不反省等缺点。这样，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从1943年初开始，全区逐步开始比较系统的整风学习。

区党委首先抓了地委一级和区党委直属机关干部们的整风学习。这是边区整风学习的基本对象。这些干部整风学习的重点是学风部分。学习中，先粗读，后精读，再与自己的反省联系起来，从而改造自己，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反省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正确估计个人，不仅要找出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更重要的是找出产生缺点、错误的根源与改进的办法，同时注意发扬自己的优点，防止失去信心。无论在精读文件阶段，还是在反省解剖自己阶段，大家都能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触实际问题，因而取得较好的效果。

边区各地区的县、区级干部及广大党员的整风学习也是边区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这些同志多在基层，处于各项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的整风学习的好坏，成效的大小，对整个边区的工作影响极大。为此，区党委要求重视党员干部的学习，并指出：县级干部的学习，主要是以整风精神，求得对高干会议决议的深刻了解与具体运用；区级干部，主要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并关注以高干会决议精神及整风精神；对于敌占区、敌占区的干部学习，应当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干部水平及工作需要安排进行。

冀鲁豫边区军队干部的整风学习，由于领导有力，干部自觉，因而开展得较好。1943年3月初，军区直属机关召开整风动员大会。会议总结了1942年以来边区部队整风学习的基本情况，检查了学而不专、读而不精或无笔记、不反省的偏向，以及不能保证每日两小时学习时间的问題。会议要求“全体继续动员，不容一人留在学习圈外，不愿学习的劝他学起来，不精研的要他精研起来，不反省的请他反省”。规定除战斗或直接与战斗有关的情况外，每天一定保证两小时学习时间。整风学习以团、旅以上干部为重点，以“经常上课和自习”为主要学习方式。这次会议，对军队干部及全边区的整风学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各单位都逐步开始整顿学风的学习。

到1943年7月初，军直对整顿学风部分的文件大部分学完，为更密切地联系干部思想与工作的改造，军直整风学委会发出关于《布置总结学风计划的训令》，强调思想方法与立场的联系，文件学习与工作检讨的联系。之后，各军分区先后进行整顿学风的学习总结，并开展时事教育、调查研究和坦白运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军队系统的整风运动。

经过 1943 年上半年的整风学习,边区绝大多数干部完成整顿学风部分的学习,而且发扬“脱裤子”的精神,检讨和揭发边区党内、军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倾向,克服某些错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有所改进。1943 年 8 月初,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决定自 1943 年 8 月 1 日至 1944 年 8 月 1 日为边区深入整风的一年,要求全区党员干部对于整风学习的意义要有深刻的和足够的认识,转变过去对于整风学习忽视或认为无关紧要的观点,加强整风学习的统一的系统的领导,并要求各级负责同志亲自指导,起模范作用。为加强对全区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区党委决定成立整风学习总委员会,区党委书记黄敬任主任。党、政、军各机关分别成立学习分会,各地委亦分别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由各地委书记任主任。下面根据干部不同情况划分学习小组。加强组织领导之后,全区整风学习出现新的气象。

整顿三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转变了边区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使广大干部、党员进一步掌握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边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使大批干部、党员的世界观得到改造,团结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党政军民实现了巩固的团结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并由此而带来了根据地的发展。

新
平
知知
学

PDG

第八章

整风运动一波三折

一、王实味事件影响甚大，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有个王实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的文件，为王实味平反昭雪。一桩几乎长达50年的历史积案终于公正地告示于天下。而这案子，却是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

本来，1942年开始的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顿三风就是要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思想。而在整风检查过程中却出现了王实味的所谓“托派”、“特务”问题。

王实味原名叔翰，实味是他的笔名。他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加入共产党，第二年失去组织关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读到毕业。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1937年他在开封重新入党，并在同年10月奔赴延安。他先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后调职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延安解放社所出的《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就是他翻译的。当时

的《列宁选集》有 18 卷,他翻译了其中的两卷半。1941 年 7 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中央研究院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等九个研究室。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中国教育和中国新闻两个研究室主任。1942 年初张闻天到陕甘宁边区、晋西北农村作调查,委托李维汉代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张闻天外出调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实际上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那时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级,王实味由于在文学和翻译方面已经有一定的成就,因而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

整风动员开始后,王实味于 1942 年 2 月 17 日在《谷雨》杂志第 1 卷第 4 期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 月 13 日和 23 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文章共分五个部分:前记;1. 我们的生活里少点什么;2. 碰“碰壁”;3. “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4.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在这些文章里,王实味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啖玉堂春,舞会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太不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还说是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还把政治家与艺术家对立起来,说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

一切肮脏和黑暗”。他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因此有些青年人对此表示同情。这反映出当时有些干部对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还不十分明了。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在大会上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二）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三）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原来多数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四）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五）院长、秘书及各主任，是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院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六）关于墙报署名问题，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织的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李维汉的讲话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王实味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他反对指定一部分人为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主张全部委员会成员都由选举产生。关于墙报署名问题，他认为墙报文章可以匿名。结果两种意见僵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检查工作委员会全部选举产生者占四分之三，同意李维汉代表院务会议所作的决定者只占四分之一。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在延安比较著名，与这种结局也有关系。

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正式出版。这个墙报的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王实味在最初的三期墙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认为李的发言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另一篇是《灵感两则》，称“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致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

得势”等等。还有一篇文章名为《答李超宇、梅洛两同志》。文章分三个部分：1.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看问题；2. 几点说明；3. 附带谈一谈我的骨头。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自己“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王实味的这些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李维汉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看了墙报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①

当时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的温济泽回忆说：王实味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成题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嘤玉堂春，舞会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②

王实味的问题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他代表了一种倾向，即自由主义、绝对民主的倾向。王实味的观点能够得到某些同志的赞赏，由此也表明全党普遍整风确实是必要的。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3页。

^②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毛泽东作为整风运动的发起人，对此也是关注的。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召开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座谈会上就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他还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消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①

4月初的一天晚上，他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了《矢与的》墙报。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康生提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人的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康生的意见，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有利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高，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于收场。^②

在会上，毛泽东也讲了话。他说：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2页。

^②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页。

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①毛泽东的讲话考虑到了整风运动刚刚开展起来的现实情况,显然不愿伤害群众刚刚起来的运动热情,所以要求各自都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但冷嘲伤人的态度,毛泽东显然是不赞成的。

中宣部“四三决定”公布以后,大家普遍明确了整风是改正领导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的。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回答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提出的问题。

4月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偏向有两个:不懂组织原则,不懂思想方法,并指出这主要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他还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

第二天,中宣部又专门邀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李维汉回忆说,在会上,仍有人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争,即宗派之争,不是原则问题,不同意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偏向。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部分同志的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2页。

区别。

但是,只有在纠正了一般的偏向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王实味个人的问题。因此,中央研究院开始纠正整风偏向。

当时,延安各机关学习整风文件,一般是按总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次序进行的,而中央研究院由于整风初期产生的问题,改变了通常的顺序,自5月上旬开始,首先学习“四三决定”和有关整顿党风的文献。通过学习,使大家初步明白了整风运动的方针、立场、方法,认识到中央研究院在整风中存在的问题,初步端正了学习的态度。特别是通过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使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使大家初步清算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这种学习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结合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状况进行的。学习方式采取个人领会文件精神,自觉检查,相互启发诱导,和风细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李维汉对这一段学习的总体评价是:“思想普遍获得提高。”有了这个思想基础,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纠正错误偏向。

从5月17日至5月30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群众性的讨论和争论。会上,主要检查了整风初期产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此,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有的说是偏向,有的说不是。发言踊跃,争论极大。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民主集中制,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应“强调民主还是应强调集中”;“民主扩大是否集中也扩大了”;“集中是领导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民

主是被领导者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集中是把已经启发起来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使用”等等。

(二)关于党内民主，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是党内民主的实质；能否把党内民主分成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三个领域；能否实行“彻底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极端民主化（当时指极端自由化或自由主义）的来源；中央研究院如何运用民主等。

(三)关于纪律，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服从纪律是自觉的；执行纪律有无条件；灵活执行决议在什么限度内才不致违反纪律等。

副院长范文澜对自己在开始阶段“放任自流的领导”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因为那时我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这是我不能不衷心抱愧、难以忘怀的一次痛苦经验。”他的自我批评受到群众的欢迎。

李维汉也作了题为《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几个争论问题》的发言，对上述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的集中，必须是民主的集中即必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它与专制和独裁根本不同；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集中主义的民主，即必须是正确集中的民主，它与绝对民主根本不同。决不能因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要正确地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需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它，以免流于机械；尤其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考察它，以免流于抽象的名词的游戏。对于民主的实质问题，他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行动的民主主义，就是在党的组织内，党员有



权参加解决党的和一般的实际问题,制定决议,并督促自己的组织实行这些决议,就是议决权和执行决议的统一。这是党内民主的特点。党的民主永远同集中制联结在一起。同集中制分离,就会产生绝对民主,绝对民主就是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是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对于纪律问题,他强调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自觉执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无条件执行,才能获得保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但决不能违反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李维汉的发言不能说绝对正确,但对于扭转当时一般知识青年的某些自由主义和绝对民主主义倾向是有帮助的。因此,到5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基本上告一段落,带有群众自发性的偏向大致上得到了纠正。

在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虽然主题是民主与集中问题,但陆续有同志提出王实味的问题。李超宇在5月27日的会上说,我们有偏向的人很多,但是王实味根本不同,因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以后他个人的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严重的,不是偶然的。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浓厚的,在这点上,我们的偏向和王实味的错误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这就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在5月28日的会上,又有人反对李超宇的发言,认为他对王实味的估计是错误的,是捕风捉影,是主观主义的残余。有些同志则赞成李超宇的意见,并说王实味虽然在组织上还是我们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5月30日下午,又有几位同志发言说,王实味已经离开了党的立场,挑拨上级和下级、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等等。有些同志在会上提出,民主集中制问题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希望

下次会上把王实味的思想实质更清楚地研究一下。大会主席团采纳了这个建议。

5月31日，中央研究院检查工作委员会印发王实味在壁上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从6月1日起，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人员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70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发言的人很多。发言内容最初大多是针对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如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是方式的错误还是立场的错误；如果立场错了，是否他的动机也错了等。但随着势态的发展，对王实味的批判也逐步“升级”了。

从会议开始时，康生就插了一手。当时康生是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受中直机关总学委的领导，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当然的指导权力，他的意见代表着总学委的指示。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大会。会议才进行了几天，就把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了。有的同志说王实味不单是思想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揭发，说王实味曾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①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陈其昌）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

^① 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由于这些揭发，王实味的问题就成为“托派思想”、“敌我问题”。又过了三天，王实味就被称之为“托洛茨基分子”了。这样，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在变为政治问题之后，又加上组织问题了。

王实味本人在6月2日向院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说他“个人和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但在6月4日，王实味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又收回了退党的要求，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的心理下对党委提出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①王实味在发言中承认他在1923年开始和托派有过往来，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和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当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到延安后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和托派的关系时，王实味说：“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1940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争论，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了得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和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了他的发言。

在后来的会议过程中，许多同志继续揭发批判王实味的问题。在6月9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批评王实味的《民族形式》一文原稿中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接着又揭露了王实味在马列学院编辑部和研究院的一些行为，说他这种人绝不是“硬骨头”，而是像水里的蚂蟥一样，是没有骨头的东西。这样的人也绝不“伟大”，而渺小的像一个白蛉子，这白蛉子悄悄从纱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160—161页。

窗飞进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6月10日的座谈会上,又有20多位同志发言批评了王实味。

对王实味的揭发批判,使到会者群情激愤,义愤填膺,要求将其开除党籍。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李维汉受中央研究院检委会委托,在会上作了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总结发言。发言讲了四个具体问题:(一)肯定座谈会的巨大收获,对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对王实味作了彻底的揭发;大家在政治上、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自己思想的改造上,一般都提高了一步。(二)王实味是什么人?支配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为反革命所赞扬和欢迎。李维汉还说王实味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那也只是说破落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而这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征之一。王实味的言论和行动,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我们大家抱着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挽救他,可是他至今还没有诚意接受大家对他的帮助。(三)斗争王实味的必要性和意义。主要是说在目前抗日战争困难时期,王实味的反党言行、反党活动和他所散布的言论的影响,是必须肃清的。(四)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经验。他又具体谈了几点经验,这些经验归结起来说,是一个思想论战的过程,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特殊地说是同王实味反党思想及其影响的斗争;经过学习和反省,比以前更加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的重要性;从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应该得出一个严重的结论,就是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反对自由主义;应使学习和思想论战进入一个新的更具体更深入的阶段。

知

學

PDG

虽然李维汉在发言中使用了反党言行、反党活动之类的字眼,但仍抱着挽救的态度说: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范文澜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的发言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党挽救王实味的过程,说王实味的反党反革命的思想活动,党委早已知道了,我们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乔木当面和写信批评过他,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党委又委托五个同志经常去帮助他,别的同志在口头上、在文字上批评他的也不少,可是他始终不肯反省。我们用尽苦心,想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我们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是有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的。第二部分是根据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大家今后应注意的几点:下决心彻底反对自由主义,严守纪律,严禁“小广播”,提高政治警惕性,更好地去读文件,更切实地反省自己。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应该说,毛泽东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这段插曲,最初并没有想到要把它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而是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其意义限于“思想斗争”。在1942年4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问题发言时说,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他还说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特指某人,而只是一种泛指。毛泽东在特指王实味时所使用的名词还只是“落后”而已。比如,他在5月28日中央高级学习组讲到延安文艺界的

情况时说：“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①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个时候并没有把王实味当作“托派”之类的敌人来看待。毛泽东还特别提醒政治局的成员，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②

但是，随着对王实味问题的揭发批判逐步升级，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他的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942年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40多位作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出席会议的作家们特别驳斥了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中的一些观点，说他把进步的政治家和进步的艺术家的对立起来，极尽挑拨之能事，为文艺家所痛恶。座谈会对于王实味事件作出如下决议：（一）我们一致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根本是托派思想，他根据这种思想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的活动，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危害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应坚决反对的。（二）我们一致认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正是他的这种错误思想的宣传，而当时《解放日报》文艺栏和《谷雨》未能加以揭发和批评，反而予以转载，是不适当的。（三）我们一致认为，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报》最近对于王实味的清算和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对整个文艺界和对我们自己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我们共同一致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② 《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4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0页。

拥护这个斗争。会议还决定向文抗理事会提议开除托派分子王实味的会籍。座谈会之后,文抗理事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开除了王实味会籍。

在这种声势下,毛泽东也接受了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说法。他在6月1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现在的整风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①由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毛泽东又联想到更严重的斗争,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坏人”。他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那些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②

有了这种超越思想斗争的政治气候,王实味的问题进一步升级并扩大化就是可能的了。

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李维汉是不满意的。他要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成果扩大化,使“斗争深入”。康生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他常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在大会上批判“托洛茨基匪帮”,说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②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3页。

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①

在决心要从王实味身上查出托派组织的主观愿望的驱动下,康生使用打迂回战的办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二人曾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夫妇的隔壁,王里曾在河南认识王实味,所以他们又去看望王实味。后来他们又有过几次往来,在一起吃过饭。毛泽东提出整顿党的作风之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芳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也发表过一些与此类似的想法。王实味被定为托派之后,从1942年9月至11月,他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被开会斗争了72天。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五人的关系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康生对此得意洋洋。1943年8月,他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作报告说:

“我再把反王实味五人集团的问题谈谈,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在反王实味斗争中间,七斗八斗,斗出四个人来(潘芳、宗铮、成全、王里),从斗争中也可以看到这四人和王实味是一起的。然而,王实味那时候,他自己不承认是反革命。另外,有时他也露一点头,找些人,但是,这时这些人的材料不怎么具体,就是王实味的《野百

^①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合花》出来以后，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赞成。同情他的反革命思想方法，这样厉害。所以斗完王实味，接着斗潘芳、宗铮，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

“中央研究院这一帮子是潘芳、宗铮，表面头子是王实味，实际头子是潘芳。政治研究室是成全、王里，也有一个头子，这个头子是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再斗于炳然，一斗斗了几天下不了台，以后加上社会部墙报就好了解，于炳然晓得形势严重，一上去就承认错误。”

“以后于为表现自己，他倒满积极，他就暴露成全、王里，强调王、成是托派思想。为什么？因为成全、王里不是托派，于和他们是一把子蓝衣社，为了掩盖他们是蓝衣社而承认托派，这对于有利，对成、王也有利，开始成、王不承认，以后才承认。”

“……反了72天，这样我们利用于炳然与成全、王里的矛盾，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矛盾。潘芳、宗铮已讲了托派思想，反党活动，但这种活动谁告诉他的？他又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潘、宗告诉他的，我说好，他们反省就好，你找潘、宗来谈话。他把潘、宗找来大骂一顿，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回击五人反党集团最热闹的时候，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了一个托派思想帽子。他们看到利用矛盾，有王实味的矛盾，有于、成、王的矛盾。利用成、王搞潘、宗，他们一个个暴露……”^①

^① 转引自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最后,这些人被打成托派、蓝衣社、国民党特务。错案从此形成。

康生的讲话是未经整理的原始记录,所以有许多文字不通、意思颇费琢磨的地方。但是,仅仅通过这个意思不连贯的讲话,我们便已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怎样形成的了,也同样很清楚地看到康生是如何无中生有、挑起矛盾、制造假案的了。如此手腕,康生在后来的“抢救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使用,使人们一再领教了冤假错案的滋味。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会作出决定,开除王实味党籍。决定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王实味突然不见了,院党委派人分几处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了。他跪在地上,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年—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于1941年向党作过详细报告”,他“确实未参加托派组织”。他承认自己是犯了严重的、“在实际上破坏党的错误”,他检讨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且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他要求把开除党籍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视为“托匪和敌特、国特为一体”的王实味,蒙冤是不可避免的了。到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到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军

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陕西兴县时，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①

王实味一案引发的余波是很大的。由王实味之事又引出了中央党校反吴奚如的斗争，吴被错误地打成叛徒。加上当时存在的其他一些组织不纯的问题，便引发出对干部队伍成分的怀疑。毛泽东 1942 年 12 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地查一查。康生等人则借此在党内大搞“逼供信”。王实味事件对后来“抢救运动”的形成是起了导火线作用的。

王实味被开除党籍时，李维汉已调离中央研究院。多年以后，李维汉在 80 年代初开始写回忆录时，谈到延安整风，提到王实味问题，他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由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李维汉还向中央组织部写报告，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他在报告中说，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误，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但是，平反工作障碍重重，这固然与年代久远，许多事情不易调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态度。虽然毛泽东不

^①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 年 1 月，总第 4 期。

赞成处决王实味,但他对王实味的评价是:“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讲讲话。”^①即是说,处决王实味是错误的,但对王实味问题的定性未变。1950年7月,毛泽东在陈传纲的一封信上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平反。但毛泽东的指示并未得到具体落实。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下,才重新把这一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复查。

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正式作出《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是王实味的问题仍未平反。

此时对王实味平反起障碍作用的主要是托派王凡西写的《双山回忆录》。他在书中写道: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样,王实味的“托派”帽子似乎是真的了。

但是到1985年,同是这个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声称要以一个被牵涉在内的证人资格,向国内对此案有权审议的人们,提出他的要求和申诉。他谈到王实味与托派的关系时说,1930年春到1931年春,在上海与王实味来往了大约一年,“他(指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6页。

实味)为译书忙,我为左派反对派组织忙,彼此见面次数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达十次,除我之外,王实味当时与之来往的,据我所知,只有陈其昌,即延安整风时多次提到的陈清晨。陈其昌当时也因赞成反对派而被开除,他属于陈独秀派。不过王实味却从未加入托派,既不曾参加我所属的‘十月’派,也不曾参加陈其昌所属的‘无产者’社”。当时王实味生活困难,主要靠写稿和翻译生活,而王凡西正约集几位朋友翻译托洛茨基的《自传》,王实味英文程度高,王凡西请其帮忙翻译,王实味便翻译了其中的两章。王凡西还解释了他在《双山回忆录》中说王实味是托派一事,表示:“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的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更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希望我这两项证言能多少有助于王实味最后一关的平反,更希望王实味的平反又能有助于他今天多半还活着的妻女的遭遇。”^①

^① 参见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第148—149页;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1月,总第4期。

王凡西的“证言”，表明当年对王实味“托派”的定论是错误的。

198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访问了有关知情人员，在有关王实味的注释中写到：“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①这个注释是报经胡乔木批准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平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的文件，正式为王实味摘掉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帽子，为王实味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问题只是整风运动的一个插曲，但这个插曲的出现却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首先，在党内开展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是必要的，不如此便不能有统一的步调，统一的纪律，就不能防止出现软弱涣散状态。其次，思想上的斗争必须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手段来进行。开批斗会的形式虽然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但也容易把斗争推向极端，造成矛盾激化。再次，开展思想上的斗争，不能无限上纲，不能轻率地把思想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二、“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毛泽东说：我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全党整风尚未结束，延安就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历次运动似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存在一个规律,即任何政治运动,无论这个运动是以思想整风的形式发动的,还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动机发动的,最后总是以组织上的处理而告结束。而在组织处理中,又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这种现实,这个规律总是要顽强地显示出来。即使被人们认为是思想整风运动典范的延安整风,也难免出现这种问题。

延安整风中进行的审干运动,曾发展成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由此出现扩大化错误。驱使事态如此发展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如下几点:

其一,整风发动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时期,蒋介石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第三次反共高潮于1943年春也迫在眉睫。蒋介石对根据地的进攻分为军事进攻与内部破坏两手,而所谓内部破坏主要是派遣特务潜入根据地,伺机活动。事实上,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确曾在陕西汉中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将一部分受过训练的特务约40多人分批派往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打入要害部门,窃取要职,长期潜伏,伺机进行策反、情报等活动。由于这些特务的家大都在西北或陕甘宁边区邻近的边界上,他们害怕被发现后全家受牵连,其中一人首先向边区保安机构自首,并提供了线索。党采取了宽大政策,经保安机构的工作,绝大多数人都秘密地坦白交待了。到1942年,戴笠精心培训派遣的特务全部被破获。但在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国共关系紧张之时,为了反击国民党,为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党中央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所以,在1942年11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就提醒注意反特斗争。1943年5月

初，毛泽东更是提出，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①

其二，在延安开展的全体党员参加的普遍整风运动，是在中央政治局 1941 年九月会议之后，为在全党统一思想，彻底肃清主观主义而进行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战胜非马克思主义，这一目标是毛泽东多次阐述过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整风中出现了王实味问题，并由此引出一个“五人反党集团”，托派、国民党特务等罪名扣在了王实味等人头上。随后中央党校的吴奚如也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这些不实之词虽然后来都被推翻了，但在当时，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一样，相信他们是坏人，相信康生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准确的，并由此又引导出另一论点：既然他们所在单位有特务，那么其他单位也有可能发现坏人、特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坏人”。^②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③

如果说，客观形势的紧张和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某种偏差使人们过分看重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的话，那么，康生等人的所作所为，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包括毛泽东）的这种认识。这也是后来出现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①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40 页。

②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4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88 页。

还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前，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就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最有名的一是钱维人案。钱维人原是边区公路局长，1937年国共合作时，他曾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修筑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说他是“内奸”，后下令将其逮捕。此人后由西北局公安部作了甄别结论。二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北平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威逼她承认被安置上的罪名。1939年，康生甚至亲自写信，制定“王克敏的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她，“使其承认复兴社”。她从1939年一直被关押到1946年。三是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后经家人保释出狱。她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她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内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对其宣布：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她的结论上定罪的根据有：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这些案件虽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但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这些事件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敌情观念——对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戒备心理和防范心理。

由于有不少“事实”作例证，毛泽东不能不更进一步考虑组织上的纯洁性问题，不能不下决心通过审干把特务清除出去。1942年11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对大多数同志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但是还有第二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就是对于吴奚如和王实味这一类的人。毛泽东还进一步谈了半条心、一条心、两

条心的问题。一条心是指完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人。半条心是指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这种人要革命,但他有许多东西是妨害革命的。两条心是指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毛泽东提出要把这两条心分别清楚,要把反革命清除出去。这些话如果作为一般情况,泛泛地谈也并无不妥之处,但具体地把吴奚如、王实味等人提出来,并认为这种特指的情况在延安许多机关也有,就难免有失偏颇。

有了这样的前因,就难免带有某种主观的先验的色彩。后来事情进一步走向偏激,也算是势之所迫。

在1942年冬,审干在事实上还不是大多数单位的首要工作。许多单位的思想整风学习还没有完全结束。待1943年春延安大多数单位基本结束了文风、党风、学风文件的学习后,中央决定延安的整风运动要逐步地结束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第一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从5月1日起恢复正常工作状态,一边工作,一边审干。四天之后,康生在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向中央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

务与日本特务，……今天我们向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根据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①前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后来，毛泽东在同年11月13日的讲话中进一步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②这表明，审干运动是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整风的延续。

遵照中央的指示，延安的机关、学校正式转入审干阶段。

毛泽东密切地注视着审干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1943年4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4月22日，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说：高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停为好，先做防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决定高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五、六、七三个月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2—433页。

^②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5—27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79）》中卷，第430页。

专门进行防奸教育。总学委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其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

审干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审慎的，只是要求每个党员根据文件精神联系自己的思想行动，写反省笔记、思想自传和详细履历，而单位负责人则调阅干部的这些材料，结合本人的表现和侦查得来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发现可疑分子。但是运动全面铺开以后，迅速向着大多数人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事情的变化，是以康生搞了一个张克勤“敌特”案为突破口的。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1937年在甘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送延安深造，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学习。因其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加上一名与他同来延安的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人检举他是特务，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来。在关押中，年仅19岁的张克勤受到逼供，在经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的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他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他在1979年写给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胡乱编造了一通“特务”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当初与他同来延安并揭发他是“特务”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靠逼供产生的假案、错案,康生却如获至宝,让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并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1943年4月1日晚,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提出拘捕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回答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这一夜之间就抓了260多人。

4月9日和12日,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人数达万人之多,规模浩大。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我们的特务破坏政策,因为他们这一政策是损害团结抗战的,但我们并不反对整个国民党。他揭露了特务机关的种种毒害青年的手法,指出误入歧途的青年中,真正甘心情愿替敌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效命的是极少数。他说:今天召集这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对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些一时被骗的人们,只要他们今天向党忠诚坦白,改过自新,真心

诚意地摆脱特务的圈套，我们党对于他过去一时的错误和因此造成的一些罪恶，是应当加以原谅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如果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还不愿坦白，那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是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

恰在这时，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1943年6月，国民党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日，边区召开了三万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中央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1943年6月2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指示还说：“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①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突破。两天之后，7月13日，在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最紧张的时候，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肃反工作现已抓到了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一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六名特务。群众大会很有效，西北局系统也要召开。又过了两天，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紧张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转向了“抢救失足者运动”。

^① 参见郭德宏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康生在那个后来声名狼藉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点了一批人的名字，没有根据地说王实味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康生炮制的特务的世界性、群众性的论点，在这个会上得到了表现。“抢救运动”由此大规模地展开。康生还在西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他号召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单位、各根据地。经康生一煽动，“抢救运动”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在紧张的气氛中，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被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用“逼、供、信”手段，搞“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个人坦白，指名问供等等，使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工作远远离开了发动者的初衷。

“抢救运动”一时间“战果辉煌”。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 1400 多人^①。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如子长县 39 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 37 个被打成“特务”，并被组成“国民党县党部”。^②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

^① 此数字见于康生 1943 年 9 月 2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的记录。

^② 赵生晖：《中共组织史纲要》，第 183 页。

书的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孔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瑛，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凤平，中共甘肃省工委领导人孙作宾、李铁轮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被“抢救”。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如此“抢救”，使不少同志产生了怀疑。当时中央青委的负责人蒋南翔，在青委负责审干，他在1945年3月曾给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他本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写下了他对“抢救运动”的意见。他说：

在几次批评以后，我抱着一种想把自己工作做好的心情，曾紧张卖力地连天连夜地工作，以期使青委的抢救工作获得成绩，并有一个时期——抢救运动前后的三四个月中，我的思想也钻了牛角尖，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我用尽心机从被审查同志身上找矛盾，找岔子，并没有确实有利的证据，只是抱着一种“死硬”的成见去观察对方，强迫“反省”，强迫“坦白”，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只感到对方不肯一如自己主观所希望的那样承认问题的可恶，毫没有用一分心思来反省和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工作是吃力不讨好，我自己那种极端主观武断的思想，也终于不得不逐渐被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所唤醒过来。譬如说：许多所谓坦白分子，都在语无伦次，莫名

其妙的乱咬胡说了。像杨学诚这样纯洁优秀的青年同志，竟被指责为“特务头子”了；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而青委的审查干部工作，也愈来愈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进行了。诸如此类的事实，都不能不引起我对于这种普遍推行“抢救”方式的根本怀疑，不能不刺激我深深地思索，苦苦地思索，差不多是一日数次地在头脑中盘旋着这个问题。^①

他还说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成果，只是相当严重的损害！“因为同志之间不是增强团结，而是增加隔阂；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果不是提高而是萎缩；三风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造而是更其发扬”。^②

蒋南翔的这种思想变化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毛泽东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也一直强调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搞“逼、供、信”。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刊登这样几句话：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

^{①②}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①

毛泽东对正确路线所概括的要点,就是被称之为审干工作“九条方针”的内容。

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在枣园同绥德专员袁任远谈话,询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毛泽东的担忧之情,在他反反复复地陈说上述内容中流露出来。

7月30日,毛主席在致彭德怀电中,再次重述了审干工作的正确路线,即“九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②

在进行以反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中,发生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0页。

“主观主义方针”盛行的“抢救运动”，不能不使毛泽东震惊。中央总学委随即在8月5日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要求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8月8日，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这是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毛泽东第二次到中央党校讲话（第一次是作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也是中央党校在1942年2月底改组和调整领导班子，由毛泽东亲任校长后，第一次到党校讲话。毛泽东强调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是党校六门课中的两门主课，其他为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文化课。他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就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但是，在同一篇讲话中，毛泽东也说了这样的话：党校也要争取领导权，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还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主要的堡垒在人家手里，学生中很多是特务，这是很严重的争取领导权的争。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对“抢救运动”的不满更多的是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九条方针”也主要是从方法上讲的，而对引起这种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因素——干部队伍不纯、根据地特务活动的形势判断过于严重，并没有否定。因此此时还不可能对“抢救运动”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8月15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发布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明确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

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

这个决定颁布以后，审干运动由机关内部的审查干部发展为工农商学兵广大群众性的反奸斗争，从延安一地的反特务斗争发展为全边区的斗争。前一阶段出现的某些偏差逐步开始克服，但铺开的运动一时难以收场，“抢救运动”在一些单位还在进行，只是大规模的运动已逐渐停止了。对“抢救运动”某些错误的纠正，也正在继续。然而，即使这个决定，对敌情的估计也有过分之处，如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等等。这不能不影响到决定的执行。

10月9日，毛泽东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所作的报告中，又谈到了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问题。他说：反特务是今年我们一个很大进步。去年共产党21岁，还未学会作这篇文章，今年则学出来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眼睛是亮的，聪明的，而共产党六年是盲目的，结果国民党的特务就无孔不入。抗战第六年的下半年，我们学会了，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国民党的妙计安天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共产党的妙计安天下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务斗争的经验，兵即是送来的特务。边区已有7000，恐怕有1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10万大

兵,这批兵要好好训练,我们可以使用它以毒攻毒,决不杀一个,国民党能利用我们的叛徒,难道我们不能学会利用特务!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九条方针。

11月5日,毛泽东在致邓小平、北方局各同志,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区党委的电报中,要求他们执行九条方针,立即废止历史上传下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还对该政策的掌握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100人中至多只许捉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事实上,这些对“抢救运动”的纠正,直至此时主要限于局部的纠正,是操作、运行方针上的纠正,但不是对最主要原因的纠正。真正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是从1943年底的书记处会议开始的。

为了总结审干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于1943年12月22日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问题。会议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主要意见有:(一)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开展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二)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工作检查。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从阴暗方面看: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

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会议分析产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决议的九条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或估计不足，或估计过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掌握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还有一个原因是，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业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分子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在这次会议讨论中，任弼时在发言中首先否定康生所谓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约70%，初中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任弼时说：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在1937年、1938年进来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任弼时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

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办法。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同意会议的分析。他还说，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些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他提出要教育干部用这次会议的方法去研究问题，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

这次会议表明，中央领导层对干部队伍状况的分析，对根据地敌情的分析，终于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这标志着审干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可以得到认真纠正了。

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1943年底至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当处置。尽管在一年内清出的“特务”曾高达1.5万多人，有的单位清出的“特务”甚至达到其人员的一半以上（如西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就有208人），但由于坚持不杀一人，不断进行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受到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而且，对审干工作中扩大化的

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

毛主席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主席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①

平反甄别工作一直到1945年春才基本结束。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被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对因战争环境条件的限制,其政治问题拖至抗战胜利还难以确定而被“保留”者,后来毛泽东指示:现在东北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281页。

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作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怕什么呀!①后来,那些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到前线自己去作结论的人,几乎无一人跑到国民党方面去。在整个运动中处理的人,只有极少数拖到违国后才作结论的。

审干结束了,“抢救运动”也已被历史作了结论。但是,这一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几个很难圆满回答的问题。

其一,延安整风本是反对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场思想革命,为什么却发生了严重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观主义地分析敌我两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只能说,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能是相对的,人不可能无所不包地掌握所有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掌握同一事物在所有发展时期的变化规律。中国共产党对30年代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形态有了痛切的认识,主观上有了树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迫切要求,但不等于对新的条件下主观主义的产生、表现有了深刻的认识,有了中央苏区“肃反”的教训,并不等于完全把握了防止这种教训重演的规律。更何况,延安整风,或说整个党的建设,对于产生主观主义的基础条件并没有很强的制约力。

其二,反对宗派主义,增强党内团结是延安整风中的重要内容,但为什么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却出现了对一部分干部群体(知识分子干部)不信任的状态,并导致干部间的相互怀疑和人人自危的感觉呢?

蒋南翔 1945年3月在给刘少奇、党中央的报告中对这个

① 郭德宏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第62页。

问题作了对人颇有启迪的回答。他认为这个问题仅仅以宗派思想来解释是不够的,产生这种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了错误:

第一,是政治认识和政治估计的问题。“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承认不承认,在抢救运动中,是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种前提。对于一般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是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可怪的,但事实确然是如此。例如陇东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里在开展抢救运动时,正式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①

第二个,是组织上的干部政策问题。蒋南翔所说的干部

^①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政策，主要是指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他说：“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救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保护下，受着片面的审判了。”他进一步分析说：“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教条上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动摇的阶层，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亲骨肉。因此在反奸斗争的抢救运动中，知识分子党员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待遇。”他还说：“自然，工农同志有许多优点，新知识分子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能相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缺点可以克服，克服知识分子缺点的主要方法，是要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这是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所明白指示了的。因此我们对待新知识分子，应该是尽量放手让他们到下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使他们的文化知识能有机会和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方面新知识分子就能在实际锻炼中最有效地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又能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转化为各种实际工作上的创造才能，更有

效地推进工作。”^①

其三,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这一路线在延安整风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但在“抢救运动”中,群众运动被作为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而被推到了高潮,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群众路线究竟应该怎样在具体工作中运用?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群众路线并不是只有一种表现形态,在某些时候某些工作中群众路线可以通过群众运动表现出来,但在某些时候某些工作中群众运动并不等于群众路线。蒋南翔在其《意见书》中对此有透彻的分析。他说:“在抢救运动中所表现的群众路线,就是所谓‘高度的群众运动’,最主要的,就是抢救运动中所采用的普遍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所谓要‘将群众发动起来’,要‘发扬群众的火力’,要‘善于掌握群众情绪’等等,事实上也正是指领导群众斗争大会而言。”而这种群众斗争大会“根本不能被看作是反奸工作中正确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因为这不是正确地启发了群众的警觉性,而只是无限止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对于‘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了解?马克思说:理论掌握群众,就成为物质力量。我们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也应该是在正确理论掌握下面的群众行动。因为只有在这种正确理论指导下面的群众行动,才能产生最伟大的物质力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路线。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作领域,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特殊规律;因此,我们也要求须有各种不同的群众行动,来适应各种不同工作领域内的不同规律。因此,

^①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我们不能有抽象的一般的群众路线，只有适应某种工作规律的某种具体的群众路线。例如农民运动所要求的群众路线是一回事，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又应是另一回事。不问何种场合，不问具体工作性质，都简单地把某一种固定的内容（如云‘发扬群众斗争火力’之类）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商标和万应灵药，那是不恰当和不能解决问题的”。^①

上述问题是“抢救运动”引发出来的思考。但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并没有得到公认的标准答案，更没有唯一的答案。只是在后来的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政治运动中斗争扩大化的故事，提醒我们应该去寻求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以求避免重犯错误。

^①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第九章

历史的结论

一、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再议两条路线，毛泽东说王明是错误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

在审干工作还未完结，对“抢救运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还在纠正时，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的整风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整风运动以高级干部学习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开始，在经历了全党整风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又回到高级干部路线学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上来。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着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继续。1941年九十月间举行的几次会议，本来主要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党的路线问题，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央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要到国际去告状，这就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而且，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对

党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作出结论性质的决定，主要是条件尚不成熟。后来转入全党整风，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解决了思想方法问题后，再来对过去的历史作出适当的结论。在此期间，王明住院治病，但并没有偃旗息鼓。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3月张闻天从农村调查归来，王明向他们宣传了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并要他们主持公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民粹派主张的观点。党中央为了真正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全党能够以团结一致的面貌来召开准备了多年的党的七大，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

1941年和1943年两次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都是为了解决党的路线问题而召开的，但各自的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已在事实上得到全党的公认。

如前所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使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组织上得到了确认。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理论发展，也在整风运动中形成为体系。主持中宣部工作的何凯丰曾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1943年4月22日回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

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①但是,整风运动已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全面的理论贡献,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什么时候提出毛泽东思想,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称: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国际联合的集中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个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国(本民族)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赞同共产国际这一决定。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但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决定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而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更明确地说: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独立地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的确,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决定政治方针和政策(事实上从遵义会议以后一直如此),但在共产国际解散后,还必须树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5页。

立起一面旗帜，一面理论上的旗帜，以便指导中国革命，并且实现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这也是一个成熟的党的标志。

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了。

1943年7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文章，题为《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要求一切干部、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①他在这里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种提法。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文章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在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之后，说：“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章的最后颇具说服力地说：

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的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①

未能参加 1941 年九月会议的周恩来这时也回到了延安。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党 22 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与 1941 年九月会议时相比，毛泽东获得了更广泛更有利的支持。

与 1941 年的九月会议相类似，1943 年政治局会议称之为九月会议，但实际上开得时间很长。1943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准备开五次会，隔一天开一次，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检查。

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也比 1941 年时多。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洛甫、博古、邓发共 11 人（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共 19 人。

^① 上述引文均见《王稼祥选集》，第 344—352 页。

这次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史问题，开展了对王明错误的批判。这种批判事实上早已开始了。

1943年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就说要“反对那种‘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地批评、纠正和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同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这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一语，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的。

在7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事，进一步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中国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屡次我们站稳阶级立场予以坚决反抗，都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实际的教训。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弄清楚，对党外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仍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过去一切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改正错误，都

能团结一起工作。

在8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王明说：“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王明同志1941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①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在当时国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言词是比较激烈的。这种状况影响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时期路线问题的氛围。

在王明没有参加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下，与会者除作一般性发言外，会议只能采取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也有一些没犯过大错误的同志作整风检查的），并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为主的方式，其他同志则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

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会议，从9月7日开始至10月6日结束。在9月7日、8日和9日这三天，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和朱德发了言。

博古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我同意毛主席提出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8页。

有两条路线，一为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这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武汉时期是否有两条路线，过去有过争论，我认为有两条路线。我参加了当时长江局的领导，根据今天的认识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林伯渠批评了王明的路线错误，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

叶剑英谈到与国民党的关系，指出：我们主要做一篇半文章，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半篇文章，与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国民党只做半篇文章，对抗战也是想半途而废的，因此我们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

朱德在发言中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的路线错误，说：点明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他批评王明把蒋介石看得又大又好，说成是“中国唯一”、“雄才大略”，对小党派看不起，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统光了。在党内，王明日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在群众工作方面则硬搬西欧的那一套。朱德说：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里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朱德还对新老陈独秀主义加以比较，指出：其相同点是：第一，不要领导权，不要武装，把革命的领导权送

给资产阶级；第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大；第三，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第四，就是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第五，对资产阶级不要批评，不要斗争，只要团结。朱德认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老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第二，新陈独秀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时代的产物，有法西斯色彩。

朱德在发言中回顾自己的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服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

9月13日，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康生首先发言，对前三次会议情况提出了意见。他说，这样的讨论不仅问题不能彻底解决，还会延误很多应做的工作。因此，会议如何开法要研究一下。他提出，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还要联系内战时期来找王明主义的来源。王明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在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至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王明是扩大立三路线更加孟什维克化的，因为他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而是反对立三的右。王明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中造成的恶果来检讨。他认为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

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就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有更多的揭发。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说自己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的言论，如说蒋介石是全面抗战的，要时时、事事、处处帮助政府，这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还批评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对王明也只是抽象地批评一下，这是不行的。同时康生自我吹嘘：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他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队。我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他派了人来侦察我。抗战以来，我在毛主席的教育下，没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一个幸福。但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个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个问题。

胡乔木对康生的这个发言评价说：康生的这个发言，显然含有严重的错误，他对《新华日报》等的批评不合事实，混淆了错误的性质，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

毛泽东发言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泽东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

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洛甫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为洛甫。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中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

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这些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称雄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就是反教条宗派。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一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

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发言有过激之处，对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抗战后的表现也没有作中肯的分析便予以批评。这使1943年九月会议的气氛在民主中透着些许紧张。

毛泽东提议，这次会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研究文件，允许交头接耳、交换意见；要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火力不够，不能克“敌”制胜。随后，书记处于9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德怀到后再行续开；并可采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总论。

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在讲话中，毛泽东肯定了9月的会有收获，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他回顾错误路线发展的历史，指出：过去错误路线是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目的是希望他们慢慢觉悟。但到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竟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这时，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

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六中全会时可以改造，但那时条件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还没认识自己的错误。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会很困难。另一关键是上月的会议与现在的学习。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

在1943年九月会议第一阶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是，毛泽东把王明称之为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①这是1941年九月会议所没有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错误路线的个人责任还是重视的。

在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

刘少奇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刘少奇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朱德发言主要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通过学习，客观地看那些文件，有些问题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他还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

周恩来是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但此前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8月30日和9月1日，他连续两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和对中央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情况，并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整风学习。从9月16日至30日的半个月里，在阅读大量档案文件的基础上，写了四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一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通过对1928年至1930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的研究，指出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处于困难时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共产国际却一直坚持反对所谓“右的错误”，提出“准备总罢工和暴动”的口号。“东方部起草各信，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从国际整个趋势出发，致一切指示都偏‘左’，给了立三路线及以后的错误以基础”。^①这实际上是分析了这个时期党犯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第二篇笔记是《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探讨了产生新立三路线和新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指出这种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民族战争亦即农民战争的长期性。第三篇笔记是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指出四中全会并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第四篇笔记是阅读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687页。

倾向错误中教条主义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周恩来在10月6日的发言中说：中国党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与陈独秀的土教条。王明的教条，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作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周恩来也对经验主义者的品质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品质有三类：一是为人的品质，有的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够格；二是革命者的品质，如勇敢、不怕牺牲，联系群众等，作为共产党人，这些品质是需要的，但还是不够的；三是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要开展思想斗争，既要联系群众又不做群众的尾巴，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经验主义者或者有革命的品质，但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求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故要整风。有些人连革命者的品质都没有，更要反省，通过整风来提升自己。

毛泽东在小结中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一是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坚决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进行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与他们的落后性、狭隘性、动摇性作斗争；三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本阶级中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才能达到；四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要通过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来实现。前年九月会议是中央现在能够团结的关键。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他指出，我们是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

国民党。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赞同少奇同志的意见。过去党内斗争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传统，这次整风要避免党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这次整风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解除了一些同志的思想顾虑，使大家更加明确了中央整风的目的和要求，掌握了政策与方法。

此后，高级干部的检查暂停，进行学习。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毛泽东在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后，又谈了王明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现在是有22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堪称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我们党已有22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毛泽东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

毛泽东所说的“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是有所指的。王明从住进医院后，有不少中央领导人去看他，他传播了不少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到周恩来说：现在整风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到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

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所以就开始反对你,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①毛泽东对王明的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在这种场合下提到此类问题还是第一次。

1943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复会,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从11月13至11月27日,毛泽东主持了这一期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以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的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在红军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8页。

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错误路线,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毛泽东还指出,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中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中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他还说:《联共(布)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毛泽东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关头各中央领导同志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的,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则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

在11月13日的会上,博古作第二遍检查。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的和个人的错误。他谈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

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是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作了结论。”^①

博古的检查花了两天时间，其中包括他人插话，大家讨论提意见。

在博古 13 日检查之后，李维汉在 14 日，张闻天在 21 日，还有其他同志又相继作了整风检查。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检查后，还与博古一起在高干会上讲了四天。

任弼时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总结了在王明路线时期的经验教训，剖析了自己认识的发展过程。他说在率领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之前，已在上海听到对毛泽东右倾的非议，进入苏区后，在接触中感到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曾误认为毛“不重视理论”。他检讨自己在苏区时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案》，提出要“打击狭隘经验论”，就是不指名的指责毛泽东。他还说自己对“左”的东西后来并没有全部贯彻，是“被博、洛等人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省工作的”，中央对他主持的全省党代表大会“有严厉的批评，以及后来中央对我的处罚，其中不免抱有成见”。

任弼时还回顾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说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论著，认识

^①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53 页。

到毛泽东在理论上“提问题敏锐、明确，掌握统一战线有成绩”，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嘱咐，提高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回到陕北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及有关战略的著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他处理国共关系问题，思想领导（整风运动），各种政策之掌握，才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①

11月27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整风检查。周恩来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下了两万多字的检查提纲。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五天的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间，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他的发言分为历史回顾和自我反省两部分，以历史回顾为主。

周恩来的回顾，从他自欧洲回国讲起，有重点地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在回顾中，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他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的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他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

他着重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分析了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指出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的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对到中央苏区后的工作，周恩来说，他虽然对上海的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提出有困难，但最后还是执行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第419—511页。

了。他说第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但自己还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和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的错误。周恩来还分析了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李德的军事指挥的实质是“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迫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他认为,中央苏区和大量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在福建事变问题上,周恩来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撕毁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失去了与友军协同作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他在总结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时说:(一)路线错误为主要的,次之,长征计划的错误;(二)保卫苏区计划亦错误;(三)领导不健全;(四)“左”倾群众工作路线促成最后的失败。

对抗战以来的工作,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缺点是在抗战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的观念”,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这些,主要是在武汉时期出现的问题。周恩来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1935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回延安这四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在长达五天的检查中,周恩来严格地要求并检查自己,表示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一部党史报告,以史为纲,对重大

事件有深刻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绝不以偏概全。如对反对、抑制立三路线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可分五类：（一）在实际工作中的正确抑制和反对，如毛主席领导的许多苏区党组织和白区的实际工作者；（二）贯彻立三路线失败而认识立三路线错误的，如苏区的周以栗；（三）犯过立三路线错误而逐渐改正的，如关向应、罗登贤；（四）大批的投机者，以米夫集团为主要部分，还有罗章龙等分裂主义者；（五）中央领导层内对立三路线的不同意见者。他的分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关于宗派问题，周恩来认为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宗派观念的（有这样的观念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一类是有宗派行动的，这行动可能自觉，但是一时的，如继续下去，必会成为派别组织；一类是有小组织活动，即有政见、有组织的行动。像这样的分析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再如对王明路线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周恩来说：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这样的概括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能引人去深入思考。

周恩来的整风检查是深刻的，但在当时有些紧张的气氛下，他在检查中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据胡乔木回忆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

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当然，相对于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说，第二阶段会议既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像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11月29日，鉴于政治局会议已经就王明的错误性质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中央书记处指派李富春代表中央与王明谈话，告诉他即将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700人学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中央政治局也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他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

这时的王明仍在休养中。中央对王明很关心，指派李富春负责联系王明治病事宜。毛泽东对此也很关心。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谈王明、王稼祥等大小七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①

对于党中央的关心，王明却丝毫不领情。他在后来写的《中共五十年》中，说毛泽东于1941年10月10日强迫他住院，后通过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先后在1942年3月至5月、1943年2月间用含汞的药物毒害他。此即著名的“中毒

^①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7月。

事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苏联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主观推测说有人在给王明下毒,并说毛泽东、康生与此事有牵连。王明还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值得怀疑,因他是红十字会派来的,是英美派医生。但事实却非如此。王明所患之病主要是扁桃腺发炎引起心脏病,在治疗过程中因技术原因在1942年、1943年两次加重病情。在李富春的直接帮助和有关医生的治疗下,王明的病情逐渐好转。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1943年11月15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声明,我从来也未对中央对党不满,第二,我从来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地,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假使说我有时还有些牢骚,王明同志确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最后,我再一次地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爱获(护)之下,王明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①这封信也表明,党中央虽然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对王明的病情还是想方设法治疗,力争使其康复的。所谓“中毒事件”纯属无稽之谈。

王明此时还不完全明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在李富春同他谈话之后,尽管他并不服气,但由于共产国

^①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7月。

际已经解散,毛泽东已得到全党的拥护,自己已无法再与之抗衡。在势之所迫的情景下,1943年12月1日,由孟庆树代笔,王明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在这封信中,他承认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主席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机会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他还在信中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①

不久,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向全党披露了对王明的批判和对他的错误的定性。中央总学委于12月初发出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文件的通知。通知摘录了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专题论述,要求全党学习。通知强调说,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一面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一面也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那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怎样绝对背离了马列主义,怎样绝对背离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从而加以彻底的克服”。^②12月28日,中央书

^① 周国全等:《王明评传》,第414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第122—123页。

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 100 到 200 人的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和《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辑录,把整风引向深入的高级阶段,为将来七大讨论历史决议作准备。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说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自四中全会的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 1937 年十二月会议至 1938 年 9 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①中共中央的这些文件中对王明路线最严厉的指责是: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这种定性无疑是很严重但又很通俗、易于为当时广大干部所理解的。通知要求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内容,但应使党员和干部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这样,不管王明是否满意,关于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讨论,和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的批判,实际上已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逐

^①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第 124—125 页。

渐展开了。

就在中央对王明的错误基本定性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对王明的批判时,1943年12月22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也许是由于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发出的不实报道,致使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延安整风产生了疑虑。他在电报中请中共不要减少对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主张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①

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后,于1944年1月2日,通过中共中央的电台,回复了一份电报,说:

1. 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在1943年八路军在十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对日作战。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数达到了50万。1943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2. 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年7月出现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① 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中共党史通讯》1990年第15期。

3. 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4. 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

在党的高级干部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

5. 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我们对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6. 在我看来，王明是靠不住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是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①

这封电报对王明“反党”的指责是很重的。1月7日，毛泽东再次到伏拉基米洛夫处，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处理党内问题坚持的原则，通过他发给季米特洛夫另一封电报。电报说：

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

^① 《伏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161页。

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

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

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①

毛泽东没有再提王明“反党”问题。不久,毛泽东在1944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党内问题。

在此期间,2月26日,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谈了一次话。这时王明已经了解到中央的结论,他感到难以理解。他曾写信给周恩来,对为什么要根本否定四中全会,为什么把他算成是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代表问题,表示疑问。他认为自己并不总是那个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那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关于十二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他要求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3月2日,周恩来把王明的信转交给中央各领导。周恩来对此评价说: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②

① 《伏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1944年1月7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2页。

② 周国全等:《王明评传》,第408页。

政治局整风会议在 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暂停了一段。但在此期间,学习并没有停顿。

根据学习计划,安排 1000 多名干部到 1944 年 4 月底前集中学习七本书,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和《两条路线》上下两册。其中三分之一干部要读完七本,多数干部只读《两条路线》即可,文化理论水平低的以读党内的正面文件为主。在学习过程中,请中央领导人作辅导报告。

当时,中央要求每个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写一份“自传”。根据中央的要求,许多高级干部在学习中深入联系自己的实际,写下了带有剖析意味的历史记录。现今人们所能看到的中央领导人对自己的剖析、对历史的评价,有许多都是从那些笔记中得到的。比如,张闻天的笔记就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研究历史的材料。

张闻天经过一年的农村调查和学习,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于 1943 年 12 月 16 日完成了一篇近 4 万字的自传,名为“反省笔记”,后来被称为《1943 年延安整风笔记》。笔记分十个部分:1. 以前;2. 入党;3. 莫斯科学习时期;4. 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5. 从遵义会议到十二月会议前;6. 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7. 从六中全会到九月政治局会议;8. 出发一年;9. 1943 年;10. 最后的几句话。他在这十个部分中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几乎绝口不提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而对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 error,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揭发批判,毫不含糊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对于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他都负责任地一一说明事实的真相。

张闻天写完这篇笔记后,便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过目。毛泽东看后到张闻天的窑洞里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①以张闻天在王明路线时期所起的作用来看,能得到毛泽东这种评价,实属不易。

1944年开春后,中央的整风会议继续进行。此即中央领导层整风的第三阶段。

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关于七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对党的六大的看法出现了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②为了解答这些问题,3月3日至4日,周恩来到延安中央党校作了两次《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出了科学的评价。

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书记处会议精神,对几个问题作了阐释。(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49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革命年代
PDG

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发生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有在上海的“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法律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至于四中全会,经过“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的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有人曾怀疑不是这个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做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和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倒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

是实事求是。(五)对六大的估计。毛泽东说:在讨论中,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指出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十大纲领,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这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这是书记处会议上没提到的。毛泽东说,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还说,“经验宗派,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在党政军民的关系上,在新老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地与外来干部的关系上都有表现。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①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对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明确总结。与会同志对这个讲话都很赞成,犯过历史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传达了上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强调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

^① 上述1943年3月5日毛泽东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98、499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0、301页。

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根据上述精神，在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成员中，就包括有张闻天。5月19日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六届七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时，又决定增加博古为“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成员。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是经不起胜利，自以为了不得，趾高气扬；轻视敌人，必遭失败。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一个冷静的科学的分析。

在中央领导层整风期间，曾在过去各个根据地和红军中工作过的人员，也召开了各地区和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工作座谈会等等。通过座谈，解决了本地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1944年，在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从红一军团的来源说起，说这支部队来源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曾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以后和井冈山的部队会合编成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第

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决没有许多工人参加到红军的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懂得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朱德还重点谈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市郊大战那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硬干硬拼，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我们红一军团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

在总结历史经验阶段，比较著名而后来又又有不同看法的是华北工作座谈会。

华北工作座谈会是1945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当时所以提出召开这次会议，据薄一波说，是因为在华北特别是在晋冀鲁豫区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彭德怀为参加七大回到延安后，经与薄一波交换意见，某些大的不同意见已经得到共识，可以说基本解决。在此情况下，两人商议，是否可以开一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彭德怀把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同意，这样就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华北工作座谈会。参加人员只限于华北各解放区来延安的高级干部。

座谈会头一天，彭德怀首先发言。他回顾了七年半以来华北敌后斗争的胜利，指出华北几个根据地的工作都有巨大的成绩，并且对取得成绩的经验作了总结。随后又对自己在华北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他的检讨大意是说：我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的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是错误的；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抗战初期我们对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缺乏认识的意见，自己不但不冷静思考，反而借题发挥，批评大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错误的等等。彭德怀发言后，各根据地的同志先后发言，除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外，大都是讲各自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情况。3月2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关于“山西形式”问题的长篇发言。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会上的讨论是热烈的、健康的。

座谈会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发生了变化。约有十几位在中央和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如李富春、陈毅等，来参加会议。康生也来了，并首先放了一炮。从此把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把意见完全集中到彭德怀身上。讨论、批评的内容，也突破了华北的工作，变成对彭德怀历史问题的“清算”。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他还闪烁其辞地影射某某根据地某某人就是追随彭德怀的。在批判中，首先集中火力攻百团大战，几乎全场一致。薄一波、杨尚昆和安子文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成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薄一波后来说，他为此感到“不安和惭愧”。至于会议后来的情况，薄一波回忆说：

知

学

PDG

以后的大会发言，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就更离谱了。有同志说：你在大革命时期没有入党，直到1928年才带领几个营上井冈山。上井冈山来当然很好，但这能说你思想觉悟高？对党有感情？也许正如你自己所说，你是有大志，原名彭得华，就是志在“得中华”。不要把自己吹得过高。这样的无端指责，显然是很荒唐的。

有同志说：你上井冈山为创造和发展中央苏区建立了功勋，“朱毛彭黄”天下人皆知，我们都赞赏。但你执行的军事路线有偏差，也是人所共知的。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你也有一份吧？你偏听偏信，杀害对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有大功的王佐、袁文才，你是大错特错的。

有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一向朴素，我们赞成。但有些矫枉过正，见到人们吃得比较好些就横加批评，说是忘记了党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看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屋内壁上粘贴了油光纸，也到处作为批评的例子，这不太过分了一点吗？是否有些虚伪？

还有的同志批评彭德怀同志“闹独立性”，说有些问题本来应该由中央说，你却自己说了，而且说得有错误。有的甚至批评彭德怀同志在讲话和文章中不引用或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是“闹独立性”，等等。

我认为，对华北工作座谈会这一历史公案，应好好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为后人之鉴戒。我作为一个建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人，有责任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①

^①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70页。

华北工作座谈会对于彭德怀的批评，首先集中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上，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错误”，从而使华北根据地进入了困难时期。这种批评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百团大战振奋了华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对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也有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有力地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造的“游而不击”之类的谣言。我军也在对日大规模“破击战”中取得了攻坚经验，有利于以后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敌伪工作的迅速开展。会上对彭德怀革命动机等问题的许多批评，也是毫无道理的。彭德怀同朱德一起指挥八路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当然，彭德怀在工作中也说过一些错话，或做过一些错事，如薄一波曾当面向他提出不注意发动群众，关于发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有的观点不妥当，工作方式比较生硬简单等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这些批评，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彭德怀在会上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认真的自我批评。座谈会后不久，彭德怀找薄一波谈了一次话。他说：一波，我还欠你一笔账没还。你在太行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我的几个问题，我当时没有答复你，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你讲得有道理，批评是对的，我完全接受。

对于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不正确批评，彭德怀没有作违心的检查。他多次说过：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彭德怀耿直、坦荡的作风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充分显示出来。华北工作座谈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整风运动后来存在某些过火的现象。

尽管各个座谈会所涉及的具体史实、具体人不同，但都联

系了本地区、本部队的历史和现实,并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对各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有了明确的结论。全党对王明路线的错误已有了统一的认识,作一个明确的历史结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二、毛泽东七次修改“历史决议”,七中全会作出最终的结论

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议:七中全会设主席团,由原中央书记处成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任务是在全会期间负责处理中央的常务工作。原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履行职权。

这次会议是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而会议的主旨就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等。

在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并形成了正式的决议文字。其大意是:

1. 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2. 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

训。3.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 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 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 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 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 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 不要否认一切。5. 六大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 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 但自遵义会议以来, 经过各种变化, 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 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 克服此种倾向。

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八次会议中, 最重要的成果是 1945 年 4 月 20 日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从 1941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对党史问题大讨论的结果, 也是毛泽东从 1935 年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的整风成果。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着起草《决议》, 1944 年 5 月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 任弼时为召集人。《决议》是以毛泽东 1941 年所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而改写成的, 随后又经多人修改, 任弼时、张闻天都有比较重大的修改。毛泽东为此稿前后修改了七次, 花费了巨大心血。

1945 年 4 月 20 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会议开始时, 李富春宣读了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信中赞同中央所作的历史决议, 说: 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 而对

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他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的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阐明总结。他在此就不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他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王明还说之所以犯教条主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由于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钻研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的结果。他还对他的那本小册子，从革命性质和动力、策略方针、进攻防御、先锋队与群众关系、党内斗争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王明这封信很长，李富春只宣读了第一部分。不管王明是否真的忏悔自己的错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公开地承认自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初推行“左”的错误的人，全部（至少在形式上）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随后，任弼时向会议报告了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草案

的情况。根据各代表团的意见，历史决议草案已经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是无原则的修改。与会者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的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暂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

毛泽东最后发表讲话，主要内容一是关于会议的重要意义。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25年的历史，就对今后有益。二是对《决议》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毛泽东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他认为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来看，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的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误？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问题。他说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前年十二月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去年就加了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他还说：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四是关于好事挂账问题。毛泽东说：决议案把许多好事挂在

他的账上,他不反对这个划分。他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他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他。他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他即使到七十,相信也还会逾矩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五是关于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做,人家就利用。现在作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①

毛泽东讲话之后,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党的历史的科学总结。《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结论,其重点在于分析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

《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错误是: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九一八事变后,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和否认,形成了自己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后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第三次“左”倾路线,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

①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2—324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则通过后,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意见,经修改,于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在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结果不但使城市的工作遭到了失败，乡村的工作大部分也遭到了失败。第三次“左”倾路线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军事上，第二次“左”倾路线否认毛泽东一整套正确的作战原则，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退却逃跑主义”。总之，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撤出江西时又变为真正的逃跑主义。

组织上，第三次“左”倾路线把一切对错误路线采取怀疑、不同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人，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待敌人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提高威信，吓唬党员干部的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

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的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政策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而对新干部也不给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的工作，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经验又脱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干部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思想上，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列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由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

《决议》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指出：其社会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左”倾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上的错误，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实

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联系实际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地表现为经验主义。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的地位，因而对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由于各种情况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方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在党内，就造成错误的组织路线。

《决议》对产生错误的根源的分析，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24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的，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

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①

党的历史上历时最久、对革命危害最大的“左”的错误，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得到了彻底的清算。历史的结论就此划上了句号。

至此，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经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结论，历经三年八个月，圆满结束了。它也宣告了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酝酿、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经过整整四年，以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新的思想一致而告结束。

三、中共七大——整风运动逻辑发展的结果

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党的七大就要召开了。

党的七大的召开，固然在整风之前就在酝酿，但七大的各项成果，却是整风运动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大会代表，无论正式的、候补的，除有病、有事请假者外均出席了会议。大家把参加七大看作是非常崇高的荣誉。

七大代表总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共分中直（包括军直系统）、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八个代表团。

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1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任弼时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一一作了说明。

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我们党在24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

先后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肯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预祝七大成功。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这个报告的内容已为人们所熟知。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4月24日，毛泽东就大会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这个报告又叫做“政治报告”。报告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同时，毛泽东也讲了另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思

想观点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他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另一条是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就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去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泽东讲的这些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很大变化，因此七大讨论城市工作也是一项重要议程。而提及城市又不能不牵涉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问题的预见。

第三，关于党内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讲的方面很多。他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泽东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是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的。毛泽东还谈到干部问题。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

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对于干部团结问题，他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的团结，走向胜利。最后，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了教育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再次提议读五本马列著作。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可以看作是对《论联合政府》的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在作党章问题的报告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延安整风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

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5月2日，张闻天在全体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检讨了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以错误的教训说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对于党与中国革命，会起一种怎样的破坏作用”。他还说：遵义会议后（实际上他从长征开始，即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在中央内部反对当时中央的另一部分同志的军事路线），一般说来，他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故没有发生路线错误。他以自己整风中的切身体验，说明“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慢慢的在斗争中占了上风”。他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弱点，一是骄

傲,一是轻浮与急躁,其本质就是脱离群众。而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是“老老实实的思想作风,它无限深刻而同时又是无限浅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全部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向人民负最后和最大责任的精神。张闻天表示:“我以后必须以虚心的态度,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以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目的。”^①

5月3日,博古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己任党的总负责人期间“左”的错误的表现和发展。他认为这些错误表现在:一是轻视与忘掉了反帝,采取了完全拒绝统一战线的政策;二是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不正确;三是对于苏区的军事指导、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他还指出这条错误路线在三个方面得到了深入的贯彻。第一是打击中间党派,打倒一切,拒绝一切同盟者。第二是在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的方式,采取盲动的冒险的政策。第三是在苏区土地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工会政策等等问题上,全部都把“左”的错误深入贯彻到底。

他说:这个时期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因为这条路线已经取得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所以就把它推广出去,销售出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改造党,来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使教条主观主义的影响深入下去。同时,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这个时候更运用教条这个法宝来吓唬人。

他还检讨说:“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506页。

底 1936 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

在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时,博古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当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意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的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①

在“左”倾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同志所作的检查,得到与会者的谅解。毛泽东在 5 月 26 日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提到此事,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的同志都一致欢迎。

^① 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第 104—106 页。

大会在听取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开始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与提名方式进行了讨论,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和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在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首先,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选,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这十年,中央的主要成分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在25个中央委员里头,六大选到现在只剩下四个。但是,我们和这些同事一道共事,没有犯大的错误,工作还算有进步。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的身上,其实,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负有很重要责任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不仅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局面也不

会有这样大。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毛泽东说：这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三，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毛泽东说：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的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还解释了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所谓庞杂问题、落伍问题和不公平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澄清了大家原来不明确的问题，一致拥护毛泽东代表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

5月31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这是他在七大的第六个报告（包括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在内）。

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在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后，又讲了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在讲到领导和准备转变的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了预见的作用，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既要预见前途，也要预见偏向，要去掉盲目性。他还对党性与个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不仅承认个性、独立性、人格、自由，而且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还大大地发展了这些。《共产党宣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每个党员没有个性，而我们党有党性。不能把党员变成纸糊的人，没有一点个性、独立性，只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在这个大框子里尽量使大家能发挥能力，发展各人的长处。毛泽东还说，个性有两种，有创造性的个性，有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党性完全不矛盾，是统一的。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要创造性的个性，不要破坏性的个性。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七大主席团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继续听取各代表团对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候选人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述。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他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

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6月9日开始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这天选举中央委员，6月10日宣布选举结果。毛泽东、朱德等44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酝酿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他讲了这样几点意见：（一）关于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他说：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毛泽东认为王稼祥同志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说：他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这说明毛泽东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

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举行闭幕式。大会宣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会议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

题的决议(草案)》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闭幕会最后，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开了 50 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

6 月 19 日，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举行。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会议的临时主席。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 13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还选举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正、副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整风之后最终确立了。延安整风在组织上展现了它的成果。



最后的话

延安整风的岁月过去了。

延安整风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进行的。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用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学习文件、剖析自己，究竟意在何处？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时过60年，也许更多的人理解了整风运动的意义，也许这种理解并不完全是毛泽东所指的意义，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今天能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出整风运动的深远影响。

首先，整风运动把党内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全党学会了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没有这种思想解放，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整风运动开创了一种形式，即以大规模的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不管后人对“运动”的方式如何评价，但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方式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延安整风成为后来中国各种思想运动的源头。

第三，延安整风中，从中央高级领导人到普通党员，都以深刻的自我批评求得了党内的团结，这种精神成为整风中最令人感动的一景。这种自我批评精神使延安整风成为历次整风的典范。

延安整风的影响还没有完结。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 《毛泽东选集》第 1、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毛泽东文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
-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林伯渠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8、9、10、11、12、13、1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 《整风文献》,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1949 年版。
- 中央档案馆编:《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44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46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50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57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58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61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 8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 9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90 年第 3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 年第 3 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

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 1986 年版。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周国全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长治市委党史研究室：《邓小平在太行拾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地方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编写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俄共密档与中国革命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郭德宏、李玲玉主编：《中共重大党史事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房成祥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后 记

恐怕谁都无法否认，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那场延安整风运动，对后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正是基于此，我们一直在做搜集资料的工作，试图对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作一全景式的描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但困于资料的不足，这种想法多年没有变成现实。所幸的是，近年来公开的资料越来越多，尤其是《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权威著作，公布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得我们敢于啃一下这块“骨头”。

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是一本实录性质的书。我们尽可能地交代一些历史的过程，再加上一点分析。相信读者朋友会从中得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是初步的，又受到自身的和其他的种种因素的限制，因此，这本书中的缺点和不足还是不少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愿意把它拿出来，一来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教正，二来希望把它作为一块引出“玉石”的“砖头”。

借此机会，我们要感谢一些人，感谢他们的诸多帮助。这其中，尤其要感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其研究成果的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前辈们和朋友们；尤其要感谢为我们审阅了

全部书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研究员；尤其要感谢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

作者

1999年12月于北京

